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8

錢賓四先生全集

◆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聯經



A89015

兩漢經學今古義

錢穆

自序

本書共收文四篇：

一、劉向歆父子年譜

二、兩漢博士家法考

三、孔子與春秋

四、周官著作時代考

此四文皆爲兩漢經學之今、古文問題而發。其實此問題僅起於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脅學術界，幾乎不主楊，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在，而夷求之於兩漢經學之實況，則並無如此所云云也。

蓋清儒治學，始終未脫一門戶之見。其先則爭朱、王，其後則爭漢、宋。其於漢人，先則爭

代之學術焉。清儒晚出於兩千載之後，其所處時代，已與漢大異，清儒雖自號其學爲「漢學」，此亦一門戶之號召而已，其於漢學精神，實少發見。本書第三篇孔子與春秋，特於古今經學流變之大體，以及經學與儒家言之離合同，提挈綱領，窮竟源委，於學術與時代相配合相呼應之處，獨加注意，而漢儒與清學之辨，亦朗若列眉，更無遁形。讀者必於此有悟，乃可以見清學之所建立，乃所以獨自成其爲清學，而未必卽有當於漢儒之真相也。

清儒主張今文經學者，羣斥古文諸經爲僞書，尤要者則爲周官與左傳。左傳遠有淵源，其書大部分應屬春秋時代之真實史料，此無可疑者。惟周官之爲晚出僞書，則遠自漢、宋，已多疑辨。然其書果起何代，果與所謂古文經學者具何關係，此終不可以不論。本書第四篇周官著作時代考，卽爲此而發。然貌若辨僞，而旨切存真，而於後代經師，考禮紛綸，種種誤失，其癥結所在，亦藉此可見。此如大禹治水，先疏源而後可以治委，而門戶之見之無當於治學，亦由此而益顯。蓋不僅於經學中有門戶，卽經學本身，亦一門戶也。苟錮蔽於此門戶之內，則不僅將無由見此門戶之外，並亦將不知其門戶之所在，與夫其門戶之所由立矣。故知雖爲徵實之學，仍貴乎學者之能脫樊籠而翔寥廓也。

晚清經師，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張今文經師之所說，既多不可信。而主張古文諸

經師，其說亦同樣不可信，且更見其爲疲軟而無力。此何故？蓋今文古今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學者門戶之偏見，彼輩主張今文，遂爲今文諸經建立門戶，而排斥古文諸經於此門戶之外。而主張古文諸經者，亦卽以今文學家之門戶爲門戶，而不過入主出奴之意見之相異而已。此如盜憎主人，入室操戈，又如隨樂起舞，俯仰由人，則宜乎其所主張之終無以大勝乎今文諸師矣。

本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爲一家。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卽爲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以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而爲經學顯眞是。遂若有以超出於從來經學專家藩籬壁壘之外，而另闢途徑，別開戶牖，此則本書之所由異夫前人也。

夫治經終不能不通史，卽清儒主張今文經學，龔定菴、魏默深爲先起大師，此兩人亦既就史以論經矣。而康長素、廖季平，其所持論，益侵入歷史範圍。故旁通於史以治經，筆路藍縷啓山林者，其功績正當歸之晚清今文諸師。惟其先以經學上門戶之見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於顛倒史實而不顧。凡所不合於其所欲建立之門戶者，則胥以僞書僞說斥之。於是不僅羣經有僞，而諸史亦有僞。輒近世疑古辨僞之風，則胥自此啓之。夫史書亦何嘗無僞？然苟非通識達見，先有以廣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爲志，而輕追時尚，肆於疑古辨僞，專以蹈隙發覆、標新

立異爲自表襮之資，而又雜以門戶意氣之私，則又烏往而能定古書真僞之眞乎？

本書之所用心，則不在乎排擊清儒說經之非，而重在乎發見古人學術之眞相。亦惟眞相顯，而後僞說可以息，浮辨可以止。誠使此書能於學術界有貢獻，則實不盡於爲經學上之今古文問題持平論、作調人，而更要在其於古人之學術思想有其探原抉微、鈎沉闡晦之一得。讀吾書者，亦必先自破棄學術上一切門戶之成見，乃始有以體會於本書之所欲闡述也。

本書第一篇曾刊載於燕京學報及古史辨，又曾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單獨印行；第二篇曾刊載於中央大學出版之文史哲季刊；第三篇曾刊載於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之東方學報；第四篇曾刊載於燕京學報。①此次彙刊，各篇文字，均續有修訂，并此附識。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錢穆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① 編者按：劉向歆父子年譜初刊於民國十九年六月 燕京學報第七期；兩漢博士家法考原載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第二卷第一號；孔子與春秋原載民國四十三年一月 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 東方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周官著作時代考原載民國二十一年六月 燕京學報第十一期。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目次

自序·····	三
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
兩漢博士家法考·····	一八一
孔子與春秋·····	二六三
周官著作時代考·····	三一九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劉向歆父子年譜自序

主今文經學者，率謂六經傳自孔氏，歷秦火而不殘，西漢十四博士皆有師傳，道一風同，得聖人之旨。此三者，皆無以自堅其說。然治經學者，猶必信今文，疑古文，則以古文爭立自劉歆，推行自王莽，莽、歆爲人賤厭，謂歆僞諸經以媚莽助篡，人易信取，不復察也。南海康氏新學僞經考持其說最備，余詳按之皆虛。要而述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

劉向卒在成帝綏和元年，劉歆復領五經在二年，爭立古文經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踰二年，去其領校五經才數月。謂歆徧僞諸經，在向未死前乎？將向既卒後乎？

向未死前，歆已徧僞諸經，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

向死未二年，歆領校五經未數月，卽能徧僞諸經，不可通二也。

謂歆徧僞諸經，非一時事，建平以下，迄於爲莽國師，逐有所僞，隨僞隨佈，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不可通三也。

然則歆之徧僞諸經，果何時耶？

且歆徧僞諸經，將一手僞之乎？將借羣手僞之乎？一手僞之，古者竹簡繁重，殺青非易，不能不假手於人也。羣手僞之，何忠於僞者之多，絕不一洩其詐耶？不可通四也。

莽嘗徵天下通逸經、古記、小學諸生數千人記說廷中，謂此諸人盡歆預布以待徵，則此數千人者遍於國中四方，何無一人洩其詐？自此不二十年，光武中興，此數千人不能無一及於後，何當時未聞言歆之詐者？不可通五也。

與歆同校書者非一人。尹咸名父子，歆從受學，與歆父向先已同受校書之命，名位皆出歆上，何不能發歆之僞？班斡校書，亦與劉向同時，漢廷賜以祕書之副。歆僞中祕，不能並班家書而僞之也。蘇竟與歆同校書，至東漢尚在，其人正士，無一言及歆僞，且深推敬。不可通六也。

揚雄校書天祿閣，卽歆校書處，歆於諸經、史恣意妄竄，豈能盡滅故簡，徧爲更寫？僞迹之

昭，雄何不見？不可通七也。

東漢諸儒，班固、崔駰、張衡、蔡邕之倫，並校書東觀，入觀中祕，目驗僞迹，轉滋深信。不可通八也。

桓譚、杜林與歆同時，皆通博洽聞之士，湛靜自守，無所希於世。下逮東漢，顯名朝廷，何所忌憚，於歆之徧僞諸經絕不一言，又相尊守？不可通九也。

稍前如師丹、公孫祿，稍後如范升，皆深抑古文諸經，皆與歆同世，然皆不言歆僞，特謂非先帝所立而已。何以捨其重而論其輕？不可通十也。

然則歆之徧僞諸經，當時知之者誰耶？而言之者又誰耶？

且歆亦何爲而徧僞諸經哉？

歆之爭立古文諸經，王莽方退職，絕無篡漢之象，謂歆僞諸經，將以助莽篡乎？不可通十一也。

謂歆僞經媚莽，特指周官爲說。然周官後出，方爭立諸經時，周官不與。不可通十二也。

且莽據周官以立政，非歆據莽政造周官。謂歆以周官誤莽猶可，不得謂以周官媚莽也。不可通十三也。

且當時媚莽助篡者衆矣，不獨一歆；歆又非其魁率。甄豐爲莽校文書，六筦之議，蔽罪魯匡，此尤其彰著，何以謂僞經者之必歆？不可通二十四也。

蓋古文諸經，多有徵驗。謂左氏、周官僞，不得不謂他經盡僞。謂諸經皆僞，不得不謂僞經者乃歆。何者？歆在中秘，領校五經，非歆不得僞僞諸經也。則歆亦不幸焉爾！然史、漢所載，可爲古文徵驗者猶多，因謂史記多歆僞竄，漢書亦出歆手，輕據葛洪僞說，漢代史實，一切改觀。不可通二十五也。

且歆僞諸經，當有實例。謂今文五帝無少皞，歆古文有之；今文五帝前無三皇，歆古文有之；今文惟九州，無十二州，歆古文有之。如此類，所以爲聖統者僅矣；歆何爲必篡焉？不可通二十六也。

況五帝有少皞，與夫三皇、十二州之說，又斷斷不始於歆。因謂先秦舊籍及此者，盡歆所僞。此又不可通二十七也。

必以今文一說爲真，異於今文者皆歆說，皆僞；然今文自有十四博士，已自相異。此益不可通二十八也。

如此而必謂歆僞諸經，果何說耶？

此姑舉其可略論者，其他牽引既廣，不能盡辨。余讀康氏書，深疾其牴牾，欲爲疏通證明，因先編劉向歆父子年譜，著其實事。實事既列，虛說自消。元、咸、哀、平、新莽之際，學術風尚之趨變，政治法度之因革，其迹可以觀。凡近世經生紛紛爲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徧疑史實，皆可以返。循是而上溯之晚周先秦，知今古分家之不實，十四博士之無根，六籍之不盡傳於孔門而多殘於秦火，庶乎可以脫經學之樊籠，發古人之真態矣；而此書其嚆矢也。

至於整統舊史，歸之條貫，讀者自得之。

中華民國十八年歲盡前一日 錢穆識

此稿初刊於燕京學報第七期；嗣轉載於顧頡剛所編古史辨第六冊，略有增訂。二十六年冬，國難，避居南岳，又校讀一過。錢穆又識。

是年上距向辛正十三歲之後。錢氏誤推，不足據。」

按：向生實在元鳳二年，錢氏推不誤。自綏和元年後十三年爲孺子嬰居攝元年，莽稱假皇帝，漢書帝紀盡於平帝元始五年，無孺子嬰。王子侯表、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皆及孝平而止，無記孺子嬰者。此漢人以莽代漢在居攝元年之證也。又王莽班符命亦言：「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後漢杜篤傳謂：「創業於高祖，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均不數孺子嬰。或疑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當在地節四年德封陽城侯之歲。按：哀紀除任子令，應劭注引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德以元鳳三年卽爲宗正，本始三年賜爵關內侯，不必封陽城後乃得任子爲郎。德傳稱德封陽城侯，「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亦非謂其親子。又參其卒年及壽數，向生元鳳二年甚信。其卒年別有考，詳後。

元鳳三年，癸卯。（七八）

正月，睦孟言事伏誅。

孟傳：孟……從嬴公受春秋，……元鳳三年正月，泰山……大石自立，……又上林苑……大

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孟推春秋之意，以為……大石自立，僅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使友人……上此書，……大將軍霍光……惡之，……廷尉奏孟妄設祿言惑衆，大逆不道，伏誅。

補注：齊召南曰：「以漢為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之本。」又葉德輝曰：「退封百里如二王後，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說。」

按：後書賈逵傳：「逵具奏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後人多疑此為左氏學者偽撰。然班書高紀贊已引劉向高祖頌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則豈偽撰左氏者乃劉向乎？陸孟言漢為堯後，不述所本，以事屬當時共信，無煩引據也。其論禮讓，據公羊，尤明白。後莽自引為虞帝裔，以篡漢擬唐、虞，此已遠啓其先矣。

向父劉德為宗正。（見百官表）

元鳳四年，甲辰。（七七）

京房生。

元平元年，丁未。（七四）

昭帝崩。昌邑王以淫亂廢，皇太后遣宗正劉德迎立宣帝。

夏侯勝遷長信少府。

按：路溫舒傳：「溫舒受春秋通大義，宣帝初卽位，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均本左氏。又引「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四句，乃左氏載晉大夫伯宗辭。是溫舒曾治左氏也。

宣帝本始三年，庚戌。（七一）

韋賢相。

儒林傳：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

按：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公、穀皆不著，敞治春秋，及見左氏審矣。敞又名能識古文字，左氏多古字，與其學合。識世卿乃公羊義，敞引爲說，當時通學本不分今古也。
韋賢卒，年八十二。

地節四年，乙卯。（六六）

三月，封劉德爲陽城侯。（見恩澤侯表）

德傳：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

七月，霍氏謀反伏誅。

元康元年，丙辰。（六五）

以左馮翊蕭望之爲大鴻臚。

孔光生。

神爵元年，庚申。（六一）

三月，改元。

郊祀志：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制詔太常，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

康氏偽經考云：「古經傳皆言四嶽，其言五嶽者偽說，或竄入也。」又云：「劉歆既偽毛詩、周官，思以證成其說，故偽造爾雅，欲以訓詁代正統。考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為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原注：「王制：「五嶽視三公」，後人校改之文也。）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蓋歆既偏偽羣經，又欲以訓詁證之，而作爾雅，心思巧密，城壘堅嚴，此其所以欺給百世歟？」

按：爾雅有出孝武後者，昔人已論之。然據郊祀志，五嶽明見宣帝前，時周禮、毛詩皆未出，歆尚未生，必如康說，非漢書亦出歆偽，不足自圓。

郊祀志：「時美陽得鼎，有司以為宜薦見宗廟。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上議曰：『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此鼎殆周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不宜薦見於宗廟。』制從之。」又藝文志：「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詁。」

偽經考：當時識古文者惟有敞。敞古文二字大體從此撰出；其以左傳附於張敞亦以此。然恐張敞識古文字亦敞所杜撰。

按：康氏無可堅持其說，故曰「大體」，曰「恐」，輕輕作規避也。

神爵二年，辛酉。（六〇）

向年二十，擢為諫大夫。

向傳：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凡數十篇。

按：王褒卒應在前年，向年十九，郊祀志及本傳屢以王褒、張子僑與向連文，或向擢尚在前，或褒卒尚在後，不可確定矣。

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按：偽經考以明堂、月令及五帝有少皞之說，皆劉歆偽撰，以與今文家爲難。左傳、國語、史記曆書言及少皞，皆歆竄入。崔適史記探源則謂：「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乃造爲『終始五德』之說，託始於鄒衍。」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天文訓，凡言五帝有少皞分列五德，崔氏謂自歆爲莽典文章始。更推衍其說，謂「凡：史記、漢書所載張蒼、公孫臣、司馬遷等言及五德者，皆歆僞托，不足信。」又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因三正，不緣五德。王莽傳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服色配德尚黃，犧牲應正用白』，是則別服色於正朔之外，而屬之『終始五德』，亦自歆爲莽典文章始。於史記則竄入黃帝、秦始、漢高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張蒼傳也。」今按：魏相此奏，明引少皞五帝，其引高帝天子所服，亦明以月令配服色，不屬三正。如康、崔之論，此亦歆所僞撰矣。循此論之，凡莽、歆以前一切傳記，苟與莽、歆有關，無論其層見疊出，要之爲歆所僞竄，而後康、崔之讞，洵不可搖，其持論之悍有如此。又相奏主復古義和官，亦新政先聲。

四月，丙吉相。

按：漢武、宣用儒生，頗重文學，事粉飾。元、成以下，乃言禮制，追古昔。此爲漢儒學風一大變。莽、歆亦自王、貢來。必以巨諛大奸視之，此乃帝王萬世一統之所以詔其子民，未足爲知人論世之準也。

張敞卒。

敞傳：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名臣，宜傳皇太子。上問前將軍蕭望之，以爲敞能吏，非師傅器。天子使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按：據此，敞卒在今年望之下獄前也。張氏世擅古文學。杜鄴傳：「鄴母敞女，鄴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偽經考謂：杜林爲敞傳法，則所謂父鄴及外祖張敞，皆敞門附會之辭。惟敞所以徧僞羣經，不惜自誣其父者，特以佐莽。林既博洽多聞，又見稱卓行，彼固無所希於莽世，何以亦爲敞欺，又不惜自誣其父並及其外家，以與敞同串此騙局？此則康氏所無以爲說者。

又按：其時古文別自名學，與經說家派無關，後人乃專以文字古今流變爲當時經說分野，亦誤也。

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致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初更生……誣罔不道，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

初元三年，乙亥。（四六）

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向傳：蕭望之既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

翼奉上疏，請徙都成周。

疏云：「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諸離宮館，未央宮又無高門諸殿。……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

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

按奉傳：「奉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今考奉疏「王道亡常」云云，卽漢歷中衰之意也。其主循古節儉，亦與王、貢一轍。

奉疏又有云：「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補注：李慈銘曰：

「後王莽奏尊元帝廟爲高宗，蓋卽采奉議。」今按：莽議欲遷都，亦自奉此疏發之。

六月，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元帝紀，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緣陰陽，……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

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

補注：何焯曰：「陰陽、月令發於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

初元四年，丙子。（四五）

王莽生。（五行志）

京房以孝廉爲郎。

按：魏志文帝紀注引京房易傳有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

李尋傳：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以不敬論。

按：觀忠可之行偽以殺身，可見當時尊信陰陽律歷，終始五德之盛，亦由羣信漢家歷數當終，否則忠可雖愚妄，亦無從憑空造爲此等之見。其事未知在何年，向既爲中壘校尉，斷當在此後。

陽朔三年，己亥。（二二）

八月，王鳳卒。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

莽年二十四，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莽傳：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歆傳：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

按：莽、歆關係始見此。

正月，王音卒。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

十一月，翟方進爲相。

李尋傳：尋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齊召南曰：據儒林傳，乃小夏侯建。）寬中等守師法，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星曆，除尋爲吏。

永始三年，丁未。（一四）

向年六十六。

多十月，以劉向言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

郊祀志：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

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

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武、

宣之世，……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

歲矣。……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祖廟之禮，……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

尚書傳在民間。」

按：張霸獻百兩偽書，其事的在何年不可考。公卿表，平當以永始二年自長信少府爲大鴻臚，其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尚在爲長信少府前，推其事，當在陳農求遺書後十年間。可證是時確有左氏及書序，故霸資以爲偽。偽經考謂：「霸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者，實則歆采霸偽書而作書序，並竄入左氏耳。」張霸偽書，時人盡知，歆雖愚，其徧偽羣經，固已無微不至，何至重借霸偽以自襮己偽？康氏不如謂張霸百兩篇亦歆偽造，見歆前已有竊左氏傳、書序爲偽者，使人信其所僞左氏傳、書序之真，如此爲說，猶勝康氏今說之顯爲曲強也。又儒林傳：「賈誼爲左氏傳訓故」，觀論衡云云，則誼有訓詁之書亦信。

元延元年，己酉。（二）

七月，星孛東井。谷永言災異之意。

谷永傳：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

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卦氣理效，五微時序，……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馬同會。……隆德積善，懼不克濟。」

按：永傳，稱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甘忠可、夏賀良之徒方以推運數見誅，而永言又如此，此自元、成以來一時學者意見，鼓盪蘊積，遂召莽篡。歆、雄之徒，後世所譏爲「貳臣」、「莽大夫」者，彼固自有其見解。谷永之言，雖涉荒誕，而發明天意不私一姓，其義深切著明，固非後世拘儒所與知也。

又按：「三七」謂二百一十歲，自漢開國至是已近。无妄，按京房六月七分圖，爲九月卦，亦所謂「陽數之標季」也。故京氏易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見《周易集解》）「百六」者，律曆志：「初入元，百六，陽九」，蓋亦陽數已極，例有災厄之歲。自武帝太初改歷，至是已踰九十年，適近百六災歲也。九世當陽數標季，爲一難。自漢開國以來二百一十歲，適合三七，七亦陽數，其運三終，爲二難。又自漢武改歷紀元，

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愚案成帝紀，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據此傳下云：『其三月，將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獵』，不列年頭，則為一年以內之事。奏甘泉當在元延二年，與紀文方合。又曰：「文選注引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案帝紀，當在元延二年。」

按：永始二年王音卒，李善所見七略，自據漢書雄在音門下歲餘而奏羽獵，故以為永始三年。不悟漢書自誤，則李引七略，非真歆物矣。

元延三年，辛亥。（一〇）

正月，蜀郡岷山崩，雍江。

向年七十歲。上奏論災異事。

（荀悅漢紀，向上奏在元年四月，通鑑亦在元年。）

向傳：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復上奏，然終不能用。向每召見，自謂得信於上，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終不遷。

秋，校獵長楊射熊館，揚雄上長楊賦。

穀梁、世本、禮記相明，乃不得不謂穀梁亦劉歆造，遂竝不信儒林傳載武、宣兩世公、穀相爭事，謂直如捕風捉影。然河平三年始校書者乃劉向，非歆也。卽謂歆亦預聞，一時同校者多矣，歆豈得遽肆其僞？且其時歆豈逆知王莽後將篡漢，遂汲汲爲之僞造古文？此等盡可不辨，然世竟多信者，則亦不得不辨耳。

四月，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

何武傳：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卽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

按：朱博傳，其議發於何武，亦薄秦制、追古禮之一徵，爲莽、歆新政先聲。

十月，大司馬王根病免。

十一月，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

按：翟方進傳：淳于長陰事發，下獄，方進奏劾紅陽侯王立，並及其黨友，奏中有云：「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補注，周壽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爲左氏學。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此尙在前也。」今按：路溫舒、張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進之傳左氏，則有明證矣。必如康說，漢書全

成歆手，則此亦歆所僞造以欺後世耶？

莽年三十八，爲大司馬。

莽傳：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按：莽敢顯白淳于長之罪，與其後誅董賢，皆快人心，振綱紀，見風節，審審忠直，未必不爲同時所折服。異代爲史，則莽乃篡賊，必曰「陰求其罪過」，淳于長之罪，何俟陰求？又曰：「莽心害長寵」，（見長傳。）此何以知之？曰「莽以獲忠直」，何以知莽之白長罪必非眞忠直？及其位高益恭，克己守儉，則曰「欲令名譽過前人」，無所往而逃於貶，此自易世史臣之文則然耳。實事之與虛文，深心者分別觀之可也。

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何武傳：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

樂，隆雅頌之聲，威揖讓之容。……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赦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箎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不聞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海內畔之。

按：向傳云：「向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則向卒當在今年。成帝崩在明年三月。其二月，翟方進卒。孔光傳：「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是方進既卒，成帝未崩，其間未有丞相。禮樂志謂「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此丞相當為方進，而向卒在方進卒前也。禮樂志又云：「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夫下其議以及於病卒，向之卒以及於丞相大司空之請，又及於丞相之卒，其間皆需時。方進卒在明年二月，向卒定在今年矣。

安得但保斥逐之勳？」……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惟君登位……十年，災害並臻，……其咎安在？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親臨弔，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按：漢儒言災異，流弊所及至如是。天子殺大臣以應星變，學者亦能預言其禍以爲先見奇中，而無有知其非者。劉向論政，率本災異。初元二年冬地震，向上變事，遂以見劾，蕭望之自殺。永光元年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之徒皆言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堪、猛皆左遷。我以災異推之人，人亦得以災異歸之我，向言災異之效，亦可睹矣。方進好天文星曆，厚李尋，卒亦死於災異。災異進而爲符命，莽遂以篡漢。此自漢儒學風如此，豈亦劉歆一人所僞？

又方進傳：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爲議曹。

按：康氏謂翟方進傳左氏，皆出劉歆僞托。然方進子翟義，反莽見誅，莽發其父方進及先祖冢，夷滅三族，誅及種嗣。歆既僞經媚莽，假托傳授，何以托之當時所謂反虜逆賊耶？

此云「國師劉歆，長安令田終術」，「國師」之稱，莽朝乃有，班史何以據莽官稱之？此或襲新朝人語，非班自造。史稱司馬遷史記多有續撰，揚雄、史岑等皆仕新朝，豈此語本諸揚、史諸人書耶？田終術見莽傳，與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豐，同造居攝之萌；又見李尋傳贊，亦好推陰陽，言災異者。

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卽位。

莽舉歆爲侍中，遷光祿大夫，復領五經。

歆傳：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按：歆傳，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下接「哀帝初卽位」云云，歆爲中壘校尉，已在哀帝崩後，此特提先言之，非向死，歆卽爲中壘校尉也。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中壘校尉爲正二千石。倘歆先已爲中壘校尉，不俟莽薦再爲太中大夫矣。藝文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亦其時未爲中壘校尉之證。藝文志：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行。

王嘉傳：嘉以日食上封事，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按：此一事而敘述彼此有詳略也。其事疑實主於王莽，否則莽亦預聞其事者。莽以七月罷就第；此事在六月，莽猶未去，當國。莽傳：始建國元年下詔禁買賣田宅奴隸，有云：

「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事在元始二年。莽之創制立法，亦皆遠有端緒，當自元、成以下漢廷諸儒議論意態推述之，不得謂由歆偽諸經，乃有新莽一朝之制度也。」補

注，何焯曰：「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公田，蓋務以祈勝而致不便於民也。」

此則所謂以成敗好惡論人，皆不得史實之真相者。

七月，大司馬王莽病免，以師丹爲大司馬。莽時年三十九。

莽傳：莽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

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又遣丞相孔光等白太后。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

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左將軍師丹共劾宏。

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責內者令撤去，更設坐。

傅太后大怒，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

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聞也，然猶自持其毅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

儒林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及房鳳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

後書賈逵傳：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

按：歆移書未定在何時，師丹為大司空，至今年九月即免，則歆移書及求出補吏均在九月

前，其白哀帝請立左氏諸書，則猶在前。哀帝以問諸儒，歆又數見丞相，需時不暫，乃有移書太常之舉。向卒至今，纔踰一年。至莽之薦歆，得爲光祿大夫領校五經，殆不出數月事也。

偽經考：歆古文之學發端自左氏。左氏書藏祕府，人間不易見。自非史遷、劉向之倫，不可得而讀也。漢世重六經，以春秋爲孔子筆削，尤尊之。於時公羊盛行，穀梁亦賴宣帝得立。歆思借以立異，校書時發得左氏國語，乃引傳解經，自爲春秋之一家。劉歆校書，爲王莽所舉。尹咸校數術，殆黨附於莽、歆者。房鳳則王根所薦，王龔則外戚，非經師也。是四人者共校書，鳳、龔所校不知何書，尹咸校數術，其經術不如歆可知。歆又挾權寵，故房鳳、王龔、尹咸咸附之也。

按：莽薦歆爲侍中，後歆自得領校祕書，何以知歆之校書爲莽所舉？時莽以失職，漢廷亦絕無傾覆之象，豈莽、歆已預謀篡漢，乃舉歆校書，徧僞羣經以預爲莽篡地耶？尹咸爲更始子，更始治穀梁，先於劉向。尹咸校數術，遠在河平時，與劉向同膺校書之命。史稱其「治左氏，歆從受質問大義」，何以知其經術之不如？史又明云「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同校經傳」，何以謂其尙校數術？房鳳爲王根所薦，根非與莽同謀篡漢，何以鳳必黨於莽、

歆之僞局？王龔外戚，何以必非經師？馮野王亦外戚，必得謂其非經師耶？外戚非經師，宗室如向、歆父子，又且爲非經師乎？且歆古文之學，既爲借以立異，則初與王莽篡漢不涉，房鳳、王龔又何以逆知其助莽而先黨附之？歆在當時，寵或有之，權則微矣；舉朝怨訕，尹咸之徒又何爲而必附焉？康說逞臆無據，率如此。

偽經考又云：劉歆之僞古文，發源於左氏，成於周官，徧僞諸經爲之左證。又云：歆以其非博之學，欲奪孔子之經，而自立新說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學首在春秋，春秋之傳公、穀、公、穀之法與六經通。於是思所以奪公、穀者，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爲左氏傳。遭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證據符合，黨衆繁盛，雖有龔勝、師丹、公孫祿、范升之徒，無能搖撼。

按：左氏、國語明爲二書，歆之引傳解經，亦獲睹中祕左氏春秋，見其實事詳備，可以發明孔子春秋之簡略，勝於公、穀虛言，故乃分年比附，用相證切。必謂其欲奪孔子之統，又謂其徧僞諸經以相證，皆一往過甚之言也。雖當時五經諸儒，亦僅謂左氏不傳春秋，並不謂歆徧僞羣經也。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已與左氏同出，而周官尚在後。豈歆先僞其

證佐而後僞其本書者耶？且康氏又謂歆之僞經，首於周禮，以佐莽篡，此又謂源於春秋，以覲聖統，歆果何所爲而爲此千古未有之騙局，康氏未能自定其說，將何以喻人乎？

偽經考又云：劉歆僞撰古經，由於總校書之任，故得托名中書，恣其竄亂。

按：歆窺中祕，其父猶在，古人竹簡繁重，豈有積年作僞而其父不知之理？若謂在其父卒後，則歆之領校五經未逾數月，何得徧僞羣經？若其分繫左氏以解春秋，歆固自其父在時以之與父爭矣，歆不以自匿，向不以爲罪，所見有是非，不在僞不僞之間。

偽經考又云：歆以承父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故尤得恣其改亂，顛倒五經。

按：此明謂歆之僞撰羣經在向卒後矣。數月之間，欲僞撰左氏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固不可能。

偽經考又云：劉歆挾名父之傳，當新莽之變，前典校書之任，後總國師之權，加漢世書籍皆在竹帛，事體繁重，學者不從大師，無所受讀。不如後世刻本流行，挾巨金而之市，則細載萬卷，羣書咸備也。若中祕之藏，自非馬遷之為太史，則班嗣之有賜書，揚雄之能借讀，庶或見之。自餘學者，無由竊見。故歆總其事，得以恣其私意，處處竄入。當時諸儒雖不答，師丹、公孫祿雖奏劾，然天下後世則皆為所豐蔀而無由見日矣。

按：歆承父典校書不逾一年，無從徧僞諸經。至爲莽國師時，揚雄校書天祿閣，必謂歆恣私妄竄，雄何得勿知？雄著書多用古文，則雄亦親見中祕古籍矣。且當時與歆同校書者有蘇竟，其人正士，亦通儒，出仕光武朝，歆苟有僞，竟何絕不知？何忌何嫌，而絕不言？且歆之作僞，欲欺當時耶？欲欺後世耶？欲欺當時，一手之僞，豈能掩天下之目？欲欺後世，莽、歆皆未克盡其天年，事業及身而敗。漢之中興，西漢晚世學者及是尙存者不少，仕於朝而顯名後世者亦多矣。歆既不能欺當世，歆卒之後，騙局且暴露無遺，然僞古文諸經轉益見信，又何說耶？康氏既謂學者不從大師，無所受讀，則容有朝廷中祕爲外朝諸儒所未見矣。歆七略有云：「外則有太常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百年之間，書積如山」，豈得盡人見之？卽如晚世，尙多有此。清臣卽身列翰苑，亦不盡觀明永樂大典。諸儒之不對，正緣其不誦。師丹謂「非毀先帝所立」，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其意皆指朝廷政制，不謂書乃劉歆所僞。若當時諸儒必謂歆所主古經皆係僞物，則何不一請校驗，事可立決。歆亦自言之，曰：「古文諸經，皆今上所考視」，則明非不可驗矣。恣意妄竄，僞跡易白。何以其後如揚子雲及東漢諸儒，凡校書中祕者，率信古經不疑，疑者轉在外朝之博士，未睹中祕之藏者耶？桓譚新論稱「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

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桓親見二劉，言必可信。向爲五行志，多論及左氏事，漢志所謂「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然猶自持其穀梁義」者，父子之間雖有異同，固非如當時博士之不誦也。

又按：歆移書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左氏春秋，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此謂「古文」，猶云舊書也。歆又云：「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歆方欲爭立三書，故言其均爲古文舊書，明與朝廷博士諸書爲類。非謂此皆古文，與朝廷博士今文不同也。其時尚無今文、古文之別，歆所云云，正欲顯其同，非以別其異。史記常云「詩書古文」，其時謂「詩書」皆「古文」也。劉向傳：「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詩書」、「古文」同指六藝，皆謂戰國以前舊書，以別於諸子、傳記。劉歆屢云「古文舊書」，「古文」卽「舊書」也。漢武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家，正以五經皆前代王官舊書，而百家則起晚世民間故耳。康、崔輩妄以後世「今文」、「古文」之見說之，故謂劉歆爭立古文經，欲以篡今文聖統，又疑史記凡言古文，皆歆僞驛矣。

又按：龔勝傳：「勝以大司空何武薦，徵爲諫大夫」，其事至遲不後綏和二年十月。爲大

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據百官表在建平四年。時師丹已免大司空，亦四年矣。歆傳：「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師丹爲大司空時，勝應爲諫大夫，非光祿大夫也。且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歆自移書讓博士，勝爲大夫，雖亦掌論議，本不屬太常，無與此事，卽不直歆所爲，何不直論指斥，乃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何爲者？又其事不見於勝傳，儒林傳亦言師丹，不及勝，則事信否不可知。疑後人極言歆爲當時衆儒所非，故特舉龔勝名儒爲說，實非有其事。至謂班史向、歆二傳本出歆手，則尤無足辨。

偽經考又云：孔光爲孔子十四世孫，而安國兄子之孫，若古文爲孔子所作，安國所傳，安有求助不肯之事？

按：光持祿保位，事詳本傳。時朝議既不右，光豈肯違衆爲助？且此乃瑣節，不足以定古文之眞僞。

又按：華陽國志卷十下引春秋穀梁傳敘云：「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晉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此當時博士反對立左傳之姓名僅存者。然亦僅謂「左氏不祖聖人」，並

三月，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

博傳：博爲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病吏。……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又勅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襜，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及是爲大司空，遂奏罷之，復御史大夫。

按：博之持論，蓋近武宣、興元、成儒者不同。其折逆儒生，欲令持此道歸待堯舜君出，亦有激之言。後王莽竟決然而爲堯舜君，宜乎頌功德者遍天下矣。

四月，罷州牧，復刺史。

按：此亦朱博主之。

丞相孔光免，御大夫朱博爲丞相。

按：時揚子雲爲黃門侍郎。五行志：「朱博爲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鳴殿中，以問黃

門侍郎揚雄及李尋。」

王莽以新都侯遣就國。時年四十一。

莽傳：傳太后、丁姬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抑貶尊號，當顯戮，請免為庶人。」上曰：「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

八月，李尋以罪徙燉煌。

哀帝紀：六月，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補注：齊召南曰：「『讖』字始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尚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精子之說，亦起於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蘇輿曰：「據下詔書，施行月餘，仍從舊漏。至莽竊位，復遵行之。」

按：崔氏史記探源謂：「史記所載張蒼、公孫臣、賈誼、司馬遷之言，皆歆僞托，不足信。」則此夏賀良之言，赤精子之讖，亦歆僞撰，或者改元易號，乃本無其事耶？

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

按：佞幸傳，哀帝以董賢爲大司馬，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於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厥中。」蕭威私謂王閼曰：「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後上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此亦漢、新禪讓一前影也。

後書譚傳：賢聞譚名，欲與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
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而作解嘲。曰：「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客有難玄太深，雄解之，作解難。

元壽二年，庚申。（一）

五月，正三公官分職。

哀帝紀：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正司直、隸司、造司寇職。事未定。

按：三公官名，發於何武，廢於朱博，至是又復之。漢廷好古如此，不俟新朝矣。

尋、歆子荼、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

按：甄邯，孔光壻。哀帝崩，莽爲大司馬，引邯爲侍中奉車都尉。甄豐以元始元年封侯，稱其宿衛三世。平晏父當以哀帝建平二年爲相，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孫建，按西域烏孫傳及段會宗傳，會宗賜關內侯在元延二年，時孫建爲都護，至是踰十年。烏孫傳又云：「元始中，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補注：徐松曰：「孫建不應元始中尚在西域，或再任也。」證以此文「孫建爲爪牙」之說，則建往西域乃再任，信矣。段會宗傳：「孫建用威重顯」，亦一能臣。游俠傳：「莽居攝，名捕漕中叔，疑强弩將軍孫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重建，不竟問。」莽又欲以女平帝后改稱黃皇室主者嫁建之子，其寵任可知。餘見後。

平帝元始元年，辛酉。（紀元）

正月，王莽爲安漢公，時莽年四十六。

莽傳：羣臣咸陳莽功德，謂「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按：自前年六月哀帝崩，至是僅半歲，漢廷羣臣已頌莽比周公，豈必俟劉歆之僞羣經，先纂孔子之聖統哉？此半年中，歆亦萬不及僞羣經。若謂歆先已僞之，則既歷歷辨如前。若謂歆自後乃僞，當知卽以今文聖統之學，已足資以爲纂，心勞日拙，何苦爲此？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願獨條光等功賞。」……太后……以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封邯爲承陽侯。……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按：歆、莽關係初與諸人有別，不僅資歷已也，觀此可信。又後書：「朱浮語光武：『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彭寵傳）則豐在當時與莽尤密。

二月，劉歆爲義和官。

平帝紀：二月，置義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禁淫祀，放鄭聲。

應劭曰：周禮：「閭師掌四郊之民，時其徵賦也。」

補注：蘇與曰：「外史亦周官夏官外史，掌書外令。」

按：置義和官，魏相已言之。據周禮設官始見此。自歆召爲太中大夫，至此不出半歲，憑

空僞撰周官，卽已布用，疑不如此速。謂欽早已爲之，則欽出中祕已久，無藉而爲此。又欽非能先見，必知莽之當漢政，又何緣爲此？

欽傳：太后留欽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

按：興明堂、辟雍，欽父向已主之。僞經考謂莽一朝典禮皆欽學也，細按其非真。

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奉其祠。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按：據華陽國志卷十，此議發於楊宣君緯，時爲講學大夫，與劉欽共校書，居攝中卒。其人曾薦龔勝，亦端士也。

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九月，赦天下徒。

按：莽爲政重民生經濟，卽此一年措施觀之可見。

元始二年，壬戌。（二）

夏，郡國大旱蝗，莽等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莽時年四十七。

平帝紀：夏，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

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按：觀此，災情蓋甚重，政府之護視安集，亦甚周矣。莽傳謂：「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助白：『宜衣繒練，損膳，以視天下。』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殆卽此事。史必謂其「欲以虛名說太后」者，莽篡漢祚不終，漢史秉筆，宜爾。當時慕效者，則自有所感，未必盡虛也。

秋，賜公田宅。

補注：蘇典曰：「莽傳云：『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卽此時事。穀梁宣十五年傳：『古者公田為居』，此蓋放其制，使民卽公田為廬舍，故云賜宅。」

今按：「公田」卽「井田」也。觀後始建國元年詔可知。然其事在哀帝初卽位時已有意創行。莽朝一切新政莫非其時學風羣議所嚮，莽亦順此潮流，故爲一時所推戴耳。

元始三年，癸亥。（三）

春，聘王莽女爲后，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莽時年四十八。

莽傳：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膳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

偽經考云：是時周禮未成，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未出，故猶從今博士說。然莽之學周公自此始。後此事事效法，遂纂漢祚。歆周官、爾雅事事稱周公以揣合莽意，獎翼篡事也。

按：元年置外史、閭師，官名皆見周官，何以知是時周禮未成？且「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明見小戴昏義。廖平古今學考爲兩戴記分今古，以昏義入今學，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自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附會而來。偽經考必謂此乃歆之僞竄，謂「否則乃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命婦」，支離荒謬，一何至此！豈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

命婦，盡居天子六宮，爲之內官之理？遂使外有曠夫，內有怨婦，乖離陰陽，蕩析家室。今學乃孔子聖統，何復如是？至葬聘杜陵史氏女，備和人三、嬪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已在更始元年，是年葬，歆卽皆死，尙何閒情再作僞經？康氏必謂一切皆歆僞說媚葬，繩之史實，終見齟齬。蓋合者百不一，徒以其悍而肆，乃若見其說之或信也。

葬傳又云：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終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葬，滿百里。」

沈欽韓漢書疏證云：「公羊隱二年，紀見經稱『子』，桓二年稱『紀侯』。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穀梁解云：『時王所進。』按：左氏桓二年是紀侯，又桓六年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杜預云：『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然紀並無益封大國之事也。且逆王后在桓八年，而遙於二年褒后父。天子議昏，乃歷七年始取，甯有是理？此魏劉芳所云：『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魏書禮志四之三）特便漢人飾奸，事事脗合，宜其誦習四百年也。」

按：如沈說，當時漢廷諸臣引公羊曲說媚葬，傳至何休，尙復依用，而獨與左氏乖違。未

知康、崔諸人對此條又如何說？甯得謂公羊亦歆僞驛，而歆又忘之於左氏乎？

夏，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學官。

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

游俠傳：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陳遵常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顧不優耶？」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按：竦之爲人，靖深廉約，近似揚雄。其稱莽功德，文甚豐美，蓋非阿譽希寵者流。子雲劇秦美新，見譏千載，竦奏亦爾。後世徒以莽篡漢身死，遂共輕笑，觀並世學人之言，似有不盡然者。又奏文有「春秋晉悼用魏絳」一節，事見左襄十一年。「成王封魯」一節，見左定四年。又述包胥辭賞，皆本左氏。竦祖敞，外兄杜鄴，皆治左氏，故竦亦能言之也。

又按：費密弘道書：「揚雄世傳有劇秦美新之文，曾鞏、孫復、王安石、簡紹芳、胡直、焦竑皆力辨無其事。或以爲谷子雲之誤。馮時可以美新爲劉棻作。考揚雄，班彪父黨，彪

嘗造其門，聞見親切，故班固作傳，稱雄溫厚君子，恬於勢利。雄平生著書，傳皆載焉。又言諸儒罪雄非聖人而稱經，獨無所謂劇秦美新者。王莽時以符命封爵甚衆，而雄不侯。莽自言雄素不與事。史文如此，美新可不辨自彰，後儒未之深考耳。」今按：諸儒辨揚雄不作劇秦美新，皆無堅證，竊謂此事卽實，亦不足深病子雲也。

莽誅其子宇。

莽傳：莽……白太后：「前哀帝……貴外家丁、傳……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奉大宗……宜……戒前事。」……帝舅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莽因是誅滅衛氏。

班彪生。

元始四年，甲子。（四）

莽年四十九。

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按：此亦見莽尚無蓄志篡漢之心。

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五年，……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復甘泉、河東祠。（師古曰：當作「三年」。）綏和二年，……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復甘泉、汾陰祠。……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渭陽祠勿復修。……」奏可。後莽又奏言：「……臣前奏徙

奇字之學者也。劉歆工於作偽，故散於私人，假藉莽力，徵召貴顯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經傳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徵天下通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者詣公車，至者千數，皆其故智也。」又云：「莽、歆搜求佚書，絕無他學，皆歆所力爭於博士者，更增爾雅、史篇文字以徵驗之。」

按：歆在當時，名位尙非甚顯。同時在朝出歆右者多矣，謂莽尊信歆，推行其偽學，若其時惟歆與莽沆瀣一氣，同謀篡業，此非史實。又徵通知逸經者，本與搜求遺書不同。元壽二年歆重召，至是僅五年，謂其徧僞諸學，散之千百人，令分處四方，再得莽命召之，以愚天下，天下縱易欺，何至無一人識其詐者？揚雄、桓譚之流，皆當世魁儒，目睹其事，盡不一悟，彌可怪矣。且其時如京房、翼奉、李尋以及桓譚、張竦之徒，研精天文、鐘律、音聲、陰陽、月令以及古文奇字者，何可勝數？康氏謂漢書成於歆手，則歆既以欺當時，復造爲此數人之說以欺後世者耶？張衡曰：「圖讖虛妄，非聖人之法，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衡東漢大儒，所言如此。康氏謂圖讖亦歆僞，眞不知其說何據！又按：郊祀志建始二年，以丞相匡衡等言，「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游俠傳：「樓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其

事皆遠在成帝時。可徵當時實有本草書，故莽徵及之，他亦可推。且此明云「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先及博士今文章句之徒，乃云「及有逸禮、古書」云云，烏得謂被徵者皆欲私人？論衡効力篇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脈絕氣滅也。」此明爲今文章句，與古文何涉？省定章句，後漢以下，繼續爲之。莽之務此，豈爲纂孔統，抑以驛僞說乎？莽能驛僞說於今文，又何事別僞古文？今、古文亦何致成水火哉？

揚雄作訓纂，時年五十七。

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順蒼頡。

許氏說文敘云：孝平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以作訓纂篇。

按：藝文志又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凡將則頗有出。」此皆在揚雄訓纂前。

按：晉書律曆志：「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而志之。」又云：「元始中，王莽輔政，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音義，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其序論雖博，……所得與司馬遷正同，班固採以爲志。」補注：齊召南曰：「晉志引此志直云劉歆序論，風俗通義引劉歆鍾律書，當亦指此。若隋書牛弘傳引劉歆鍾律書云云，今志所無，是則班氏所刪去也。」錢塘律呂古誼云：「志載律法，雖本於歆，實爲前古定法。歆篤古，制作必依古法，觀其不用京房六十律可知。」

又著三統曆譜。

歆傳：歆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律曆志：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按杜征南長曆說云：「自古論春秋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諸曆。此卽家術之類也。或以爲王莽用三統曆，非是。」

今按：三統曆本以說春秋，取名「三統」，則采公羊，王莽有王光上戊曆，見下天鳳六年。

誣先聖以佐篡逆，而後人猶惑之，何哉？

按：周公踐天子位，最先見於荀子之儒效。藝文類聚卷六引尸子、韓子難二、禮記文王世子、淮南汜論訓、韓詩外傳卷三、卷七、說苑君道、尊賢均言之，豈盡歆之所僞？且其時言符命，頌功德，助篡逆者多矣，何獨蔽罪於歆？辨明堂位爲莽時僞書者，始姚際恆。其言曰：「諸儒以明堂位尊美周公，誇飾魯事，或云魯人爲之，或云三桓之徒爲之，皆非也。春秋時去周公已遠，猶爲此尊大之辭，恐無謂。此篇爲馬融所取入記，使爲周末人作，不應直待融始收之。故予以爲必新莽時人爲之，蓋借周公以諂莽。融無識而收之耳。」此謂「新莽時人」，猶未謂必歆。然姚氏謂「春秋去周公已遠，不應猶爲此尊大之辭」，則新莽去春秋更遠，何獨借周公以行僞？姚氏信此篇爲馬融所取入記，則當時羣臣之奏，明言「禮明堂記」矣。且此篇後半盛誇魯制，若新莽時人爲之，其無謂不尤甚於春秋時人之尊大周公者耶？稍後方望溪，陰襲姚說而言益肆，曰：「明堂位列載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予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

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或疑周公踐阼，負依以召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祕府而外，藏書甚稀。太史公書宣、咸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此乃確指僞於劉歆之手。蓋使他人僞之，則無說以解於羣書之互證。歆校祕書，必歸獄焉，乃可謂其徧僞羣書也。然就如方說，太史公書宣、咸間已少出，歆僞在後，未嘗效秦之收書，歆、莽未終其業而死，漢祚中興，天下之大，何無一人出而讎校，以明僞跡？劉向校書，遠在河平時，荀子亦向所校。漢儒傳經，大率推本荀子，荀子於漢世，顯學也。豈無他本流傳人間，而歆得恣其僞竄？光武中興去此不廿年，遂無一人識其僞耶？方氏謂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莽本據此自文飾，安得不相應？今轉據以定記之僞，不尤可笑之甚耶？夫明堂記不必爲信史，亦不必出於莽、歆之僞造，姚、方混并爲說，宜無當也。

居攝元年，丙寅。（六）

莽年五十一。

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按：通鑑胡注：「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下文劉歆爲少阿。

又按：許氏說文敘：「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桓譚典治河之議，亦言之甄豐。是爲莽典文學之任者不止歆，縱有所僞，豈得盡蔽獄於一人哉？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誅莽，敗死。

莽傳：紹，張竦之從兄。竦與宗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因為嘉作奏，……莽大說，……封嘉爲師禮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

闕，不如巧為奏。」

按：後書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二據前書王子侯表，謂「宣」或「寵」之誤。其人既抱經書避莽，中興復出，絕不聞言莽、歆驛僞事，何也？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十二月，封王匡等爲侯，益甄邯、孫建邑。

莽傳：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功德茂著。

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

按：莽、歆關係雖密，尚在此諸人後。歆子棻雖以才智見幸，不在同心、說德、合意、并力之伍。必謂莽之篡局，惟歆佐助之，是未考情實之言也。

居攝二年，丁卯。（七）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

補注：周壽昌曰：「據後書桓譚傳，譚為掌樂大夫。」

按：葬傳，譚時為諫大夫。後書云，「葬時為掌樂大夫」，乃新莽建國後矣。周說誤。後書桓譚傳：譚，字君山。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偽經考：桓譚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其受古學之淵源也。桓譚與杜林皆成學於西漢，受劉歆、張竦、揚雄之學，以通博為主。崔駰、班固、張衡、馬融、劉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實則章句皆今學，為古學者攻之，故不守也。從古學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學所以盛也。

按：康氏謂「章句皆今學，從古學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學所以盛」，是矣。然古學儼出劉歆偽造，何以博洽通儒多受其欺，惟章句之徒孤陋自守者乃始不信？豈有易欺博洽，難愚孤陋者乎？光武信識緯，桓譚力排其非，幾以見禍。若古經盡出劉歆，資莽篡漢，與識緯何異？譚親在莽朝，身與歆往還，豈不能洞燭其奸？光武中興，更何忌諱，奈何篤守，絕不詆斥耶？

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郝郝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

按：葬事事復古，至欲追封建，可謂迂闊不識時變矣。然封建之制，豈得謂亦出劉歆杜撰？近儒謂王制今學，周禮古學，二者冰炭不相容。今葬奏二書同引，又何說耶？

偽經考：周爵五等，地四等，劉歆周官說也。孔子之禮，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說則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按：公羊、王制已自不同，孰為真孔子之說？周官復異，何以見公羊、王制皆孔子說，而周官必偽？封地四等，封爵五等，何助於葬篡，而歆必偽之？即據王制，或依公羊，何礙篡事？顧必先偽周禮，然後發政施令，逆人心，駭耳目，而後為快耶？葬、歆自好古，發見周禮，中心欣悅，謂遠勝王制、公羊之習見熟聞，因不惜事事依仿，迂闊則有之，奸詐則未也。

九月，莽母卒。

莽傳：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

……昔……成湯既沒，……伊尹……居攝，以興殷道。……武王既沒，……周公……居攝，以成周道。……今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攝皇帝……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其私親。……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纁』，……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纁，……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

偽經考：凡莽措施，皆出於歆之偽周禮，莽蓋為歆所欺者。「發得周禮，以明因監」，為周禮大行之始，故特著焉。

按：謂歆偽造古文以佐莽篡，而以周禮為主，此康氏之說也。然莽所欲借辭者，在周公居攝踐祚一事，此諸子、今文均有之，不俟歆徧偽羣經也。至於周禮，莽雖依以發政，於篡業非所借口，康氏亦知之，乃又謂莽亦為歆所欺，流遁強說，則歆之偽周禮，將特以欺莽者耶？

又按：荀悅漢紀云：「歆以周官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

依經考：周官六篇，自西漢前未之見，其說與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偽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羣經乃以證周官。故歆之偽學，此書為首。

按：康氏既謂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何又謂莽受歆欺？且歆移書太常，爭立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尚未及周官；謂歆徧偽羣經乃以證周官，不合一矣。歆爭立四博士時，莽已去職，豈逆知其後之篡而預為之？謂歆欲附成莽業而偽此書，又偽羣經以證之，不合二矣。偽經考又云：「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偽作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爾雅，咸以輔翼之。」是必周官之成，遠在古文尚書、毛詩、逸禮諸偽書前。諸書已不得一日徧偽；周官尤詳密，非可急就。以年推之，必向尚未死，莽尚未貴，歆學尚未成，已先徧偽羣經，則一切不合矣。

偽經考又云：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然歆之偽左氏，在成、哀之世。偽逸禮、偽毛詩，次第為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久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偽經以迎媚之。歆既贊成莽之篡漢，莽推行歆學，又徵召為歆學者千餘人詣公車，立諸偽經於學官，莽又贊成歆之篡孔矣。

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補注：蘇輿曰：「引康誥『王若曰』云云，雖莽假借其文，蓋今文說實如此，故其仿大誥文直作『攝皇帝若曰』。王肅偽孔以大誥之『王』為『成王』。不知書凡言周公述王命者，上皆言周公以別之，如多方、多士篇是也。大誥、康誥不然，知『王』是周公。莽故特假引二篇文也。莽稱引多今文說，皆可徵驗。」

偽經考：莽之居攝名義亦由於歆。卽此（「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一言，歆之偽作左氏春秋書法以證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為偽經，復有何疑？

按：禮記文王世子：「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說苑尊賢：「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居攝之名，何必始於歆？歆請立左氏，尚在哀帝建平元年，豈預知十年後莽有居攝之局而先偽經文以為之地？否則歆之偽羣經，可以隨偽隨易，惟意所之，而天下終受其欺耶？甘忠可、夏賀良皆言漢運中衰，當再受命，故莽樂引以為說。然劉歆先曾以非經義折之，烏得謂凡

莽稱說盡出歆？且莽之卽眞，亦逐步推移而至，莽在當時，亦非所逆料也。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獻莽，莽自稱新皇帝。

莽傳：梓潼人哀章……見莽居攝，卽作銅匱，……書言王莽為眞天子。……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王莽始建國元年，己巳。（九）

莽年五十四。

正月，封孺子嬰為定安公。

者？』然否？」（按：方說見禮記折疑。）答曰：「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為劉歆所竄入，則未然。……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道，……弼……輔，……承，……』，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略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既備……』，杜鄴傳謂王音曰：『周、召……並為弼、疑……』，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然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為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為三公，後句四星為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其為七國時人說，固無疑。」按：王莽事事復古，尊信周官、禮記諸書，不知此多出戰國晚世，非真古也。姚立方、方望溪諸人因疑盡歆、莽之徒所僞，全氏辨之，亦所謂博而篤者矣。

策令羣司。

莽傳：莽策羣司：「歲星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愆，南獄太傅，典致時與，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

按：葬事事慕古，迂闊無當，卽此策文可見。然亦淵源西漢今文家言，特見諸實行，乃以召亂耳。

置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更諸官名。

定諸侯王號皆稱公。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

封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後皆爲公侯，使各奉其祭祀。

偽經考：易繫辭、大戴五帝德、帝繫姓、史記五帝本紀皆無少昊。惟逸周書嘗參解有少昊，則爲司馬者。歆變亂五帝名號，故竄之於左傳、國語、月令。此用歆說也。

按：古有異說，何必全出歆造？五帝之辨已見前，不復詳。

立九廟。

莽傳：莽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於下，流爲鳥，或黃氣薰蒸，昭耀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已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皆黃、虞苗裔，……其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

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禁民挾銅炭。

莽傳：莽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厄，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終不可強濟。……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乃更作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按：莽之拘忌可笑又如此。觀其多拘忌，知非徧偽羣經以行篡之人矣。

四月，禁買賣田宅奴婢。

莽傳：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子公田口井，……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

食貨志又謂：莽於長安及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官。……皆為五均司市師。工商能采金銀銅鐵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市。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不能出布者，宐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祝卜，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按：「自占」猶今云「呈報」。其制略似武帝時之「算緡」，而性質頗不同。蓋五均所徵乃一切地稅。凡采礦、畜牧、坐肆列里區謁舍，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征其貢。其自耕稼以外之據地為利者，胥五均主之。田不耕，宅不樹藝，民浮游無事，此雖不生利，亦不能無占地。征其稅，乃寓禁於征之意。舊注，臣瓚曰：「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故知五均有稅地義。古人惟以農為正業，他則目為姦利。又以為凡生利者必有賴於地，故於田租正稅外，又以五均徵一切地稅也。莽復師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之意，使「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及民用

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俞病。

按：此亦政制改革，一時所宜有。要其意則未可厚譏也。又莽此諸政，均起於漢武，而新朝君臣，多推本周官。方望溪周官辨僞則謂周官多有莽、歆竄入。其言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什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塵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卽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哲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方氏於莽詔所謂「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者，全不解其意旨，而謂「其意居可知」，眞可怪笑。六筭之制，皆有深意，非方所知。至方相、壺涿、哲族、庭氏之文，皆不合於方氏之所謂「聖人」者，而盡以爲歆之所竄，此尤迂癡不足辨。其後康氏遠承方氏之緒，而所見較深，要其立論淵源，實自方啓之。細讀方氏周官辨僞，可知其說之無根。

偽經考：荀子王制篇：「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孟子言：「澤梁無禁」，王制：「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託於周

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

按：莽徒慕古制，不通政理。其行龜、貝、布貨，惟以擾民。然自貢禹以來，存此想者非一人，莽特強志敢爲耳。

收捕甄豐子尋、劉歆子棻、棻弟泳、王邑弟奇、及歆門人丁隆等。豐自殺，死者數百人。

莽傳：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翼、長安令田終衡。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悅，故徙……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陟，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尋復

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歲餘捕得，解連國師公歆子……茶、茶弟……泳、大司空邑弟……奇，及歆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

按：此乃新朝君臣始終實錄。莽、歆關係如此，康氏諸人閉眼若無覩，豈以漢書真乃歆物，則莽傳亦歆為之以自逃後世之責，而掩其僞者耶？

揚雄校書天祿閣，畏罪自投閣下，幾死，詔勿問。雄時年六十四。

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而豐子尋、歆子茶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裔。……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恐不能自免，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其故，乃劉茶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按：揚雄校書天祿閣，未知已幾年。自此上推至綏和二年，劉歆典五經，亦校書天祿閣，前後僅十六年。歆果徧僞諸經，增竄羣籍，子雲不宜無知。今子雲諸書多言古文，康氏謂乃受學於歆，為歆所欺，皆強為之說也。

又按：後書蘇竟傳：竟，字伯況。平帝世，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

三
詩

夏侯始昌

后蒼

翼奉

蕭望之

匡衡

師丹

伏理

滿昌

張邯

皮容

莽傳講詩爲琅邪滿昌。

(四) 詩 (毛詩)

毛公
(河間獻王博士)

貫長卿

解延年

徐敖

陳俠

（王莽講學大夫）

(五) 春秋 (公羊)

胡母生

緒大

羸公

孟卿

段仲

娃

嚴彭祖

呂步舒

顏安樂（孟姊子）

泠豐

遇宮

左咸

溝洫志：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顏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竝字子陽，材智通達。」）……大司馬史長安張戎，（顏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澆灌事。」）……御史臨淮韓牧，（顏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大司空掾王橫，（顏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按：儒林傳作「王璜」，能傳費易，又傳古文尚書。）……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上繼禹功，下治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按：荀悅漢紀繫此事於今年，與莽傳合，今依之。前曾徵通知小學者，爰禮主之，通鐘律者，劉歆主之，此復踵其事。天鳳六年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事亦相類。

始建國四年，壬申。（二）

莽年五十七。

大司馬甄邯卒。孔永為大司馬。

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

莽傳：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於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於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布徧九州。……禹貢……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今已受茅土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此據通鑑易文。）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按：莽拘古紛更，最為致敗之端。前本堯典定十二州，此又本禹貢定九州，所謂「九年於茲，乃今定矣」。其拘泥可笑如此。若謂莽、歆偽造一切古典以肆改作，則豈先造堯典，又後造禹貢耶？

令民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傳：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秦順民之心，……滅廬井而置阡陌。……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

…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馬。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其號令變易，皆此類。

按：此亦莽拘古紛更之一端。王制、周禮、廖平以來，謂此二書，一為「今文」，一為「古文」，絕不相通。然莽朝改制，並依二書，知晚近今文家言，多張皇過甚之辭也。

復行金、銀、龜、貝之貨，罷大、小錢，改作貨布。

食貨志：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按：莽傳「罷大小錢更行貨布」在地皇元年，即自此「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時也。通鑑載此事亦在今年。又：莽作三萬六千歲曆，以六歲一改元，故以天鳳六年後改地皇元年。此亦以六年為限，由莽自以當土德也。

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又云：「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今考鄭興雖從歆受左氏，然先已通達，非本出於歆。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未審金子嚴所本爲歆抑賈護、陳欽也。

又後書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賈徽親受業於歆，又徧習古文諸經，爲古學一大師；其子以夏侯尚書教，又兼通穀梁，足徵當時古文家欲廣道術，非與今文分門戶，盜聖統矣。

又後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奮字）受道矣。』遭王莽亂，與母、弟避兵河西。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晚有子嘉，作左氏說。」偽經考：「孔奮爲光孫，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孫反從而受之事？歆每欲自附於孔氏，而不計其可否，安國、傳、奮皆其類也。」康氏此辨，全無理據。豈

東漢書亦歆所預僞，孔奇之春秋左氏刪、孔嘉左氏說，盡歆居中祕先爲僞撰者耶？劉向信穀梁，歆信左氏，安見孔光之孫必不從歆受左氏乎？又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據此，子春生年當元、成之間，光武中興，子春年五十餘也。鄭興既從歆受周官，其子衆又受之子春，則子春亦歆門高第矣。

王咸、伏黯使匈奴。

莽傳：莽選儒生能顯對者，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咸到單于廷，陳莽威德，……應敵縱橫，單于不能詘。……入塞，咸病死。封……伏黯等皆為子。

按：鮑宣傳：「哀帝時，宣下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數千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即此王咸也。

又後書伏恭傳：「伏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

儒林傳：許商受大夏侯尚書，善為算，著五行論曆。號其門人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缺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衆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又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雅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論衡超奇篇亦謂：「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宣言，劉向之切議。」

又儒林傳：張無故受小夏侯尚書，授沛唐尊，王莽太傅。

按：新朝儒臣亦多賢者，不僅揚子雲等數人。又兩唐皆治今文尚書，均見尊禮，莽、歆固非以古文易今文。

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

莽傳：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違戾，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莽年六十三。

收諸軍吏及邊吏大夫以上姦利致富者家產。

莽傳：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揚雄卒，年七十一。

雄傳：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又：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雄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

按：王邑、嚴尤皆新朝賢臣，亦儒雅士，故論及雄書傳否。

又按：雄作太玄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此猶王莽之學大誥、金縢，皆一時學風然也。

天鳳六年，己卯。（一九）

莽年六十四。

作三萬六千歲曆。

按：此莽令太史所推，六歲一改元，明年稱地皇元年；曆又稱王光上戊曆。

大司馬嚴尤免，以董忠爲大司馬。

大司空議曹史范升奏記王邑。（通鑑）

按：後書范升傳：「升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

空王邑辟爲議曹史。又建武四年，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

議。升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近有司請置京氏易

博士，……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

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

求立。……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

疑於此。……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子弟。詩書不講，禮樂不修，

奏立左、費，非政急務。』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

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今按：升仕新朝，親與劉歆同世。歆果徧僞羣經，豈能一

手掩天下目？升何無知？觀其疏爭左、費二家不可立，絕無一辭半語及於歆僞，又並不分今古派別，惟謂其學無本師，先帝所未立，恐後多援例爭立者，非急務而已。安有如晚近諸儒言今古文之張皇者耶？論史者不徵當世之實跡，而顧信千載後之臆測，何哉？僞經考云：「此等說出，劉歆之徒乃得以黨同妒真藉口，而人主亦漸疑之。蓋不得歆作僞之根原，故並遷怒史記，亦其短也。」是康氏亦知之，蔽於成見，遂悍而不返耳。

地皇元年，庚辰。(二〇)

莽年六十五。

九月，起九廟於長安。

莽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遂起九廟於長安城南。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張邯說莽：「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

按：後書杜林傳：「林，鄴子，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俱客河西。」今按莽傳，則林為新朝侍中矣。當時名儒達才仕莽者甚衆，今舉後書可考

者，如：

李憲：王莽時爲廬江屬令。（職如都尉。）莽末，爲偏將軍，廬江連率。莽敗，憲自立爲天子，敗死。

彭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後仕光武，叛誅。

隗囂：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爲士。歆死，囂歸鄉里。（莽傳謂：「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囂等既出，因逃亡」，事在王邑敗昆陽，劉歆自殺前，與後書異。

公孫述：哀帝時，以父任爲郎。後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天鳳中，爲導江卒正。（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

李守：李通父，初事劉歆，好星曆讖記，爲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後與光武兄弟起事。

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遂降漢。又按：寇恂亦學左氏春秋。

岑彭：王莽時，守本縣（南陽）長。又爲前隊大夫甄阜戰鬪甚力。阜死，彭亡歸宛，與前隊

貳嚴說共城守。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乃降。

耿況：耿弇父。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莽改止

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

李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

曰屬長。）光武時爲豫章太守，稱儒吏。

邳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

耿艾：耿純父，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曰濟平。）純學於長安，除爲納言士。（莽法古置納言之官，

卽尙書也。）

景丹：少學長安。王莽時學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遷朔調

連率副貳。（副貳，屬令也。）

竇融：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王俊）司馬。東擊翟義，以功封建武男。

馬況、馬余、馬良：馬援兄，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學校尉。

良，增山連率。）

馬援、原涉：王莽末，莽從弟衛將軍林辟援及同郡原涉爲掾，薦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

尹。（莽改天水爲鎮戎。）援爲新成大尹。（漢中爲新成。）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都尉。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名重當時。

伏湛：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也。父理，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前書儒林傳：「伏理字府君，受詩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也。」）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王莽改御史曰執法。）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內爲後隊。）光武時官至大司徒，封侯。

侯霸：成帝時爲太子舍人。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改縣令、長曰宰。）再遷爲執法刺姦。（莽傳：「置執法左右刺姦，

選罷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其事在天鳳元年。）後爲淮平大尹。（莽改臨淮郡爲淮平。）建武時，代伏湛爲大司徒，封侯。

宋弘：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莽改少府曰共工。）建武時爲大司空，封侯；薦桓譚

於朝。

張湛：矜嚴好禮，三輔以爲儀表。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時爲大司徒。

馮衍：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山東，辟衍爲掾。

蘇竟：見前。

郭伋：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莽改太守爲大尹。）遷并州牧。建武時官至太中大夫。

張純：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建武時，代杜林爲大司空。二十六年論禘、祫，引元始五年春祫祭爲說。又案七經、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與博士桓榮議同。

范升：見前。

陳欽：見前。

丁綝：鴻父。王莽末，守潁陽尉。建武時拜河南太守，封侯。

張宗：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鄉佐主佐鄉收稅賦。）後漢官至琅邪相。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後漢官至宗正。

趙孝：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爲郎。後漢官至長樂衛尉。

徐宣：防祖父，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

歐陽歙：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王莽時爲長社宰。

衛颯：家貧好學，隨師無糧，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

王隆：王莽時以父任爲郎，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史岑：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

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

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今按：此十五人並在班史前。班史，

彪、固、大家父子兄妹三人相續，又得馬融、馬續諸人，遂成今書。偽經考謂班史出歆

手，豈不妄甚！

又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在藝文志。師古曰：「七略云：商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

劉向，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又藝文志有待詔馮商賦九篇。晉馮、

地皇二年，辛巳。（二一）

莽年六十六。

正月，莽妻死，子臨自殺。

莽傳：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不知死命所在。」莽……見其書，大怒，……賜臨藥，臨……自刺死。

按：莽性嚴而執，三子皆見殺，其不近人情可知。凡其爲政，亦多以嚴性執意、不近人情致敗。

秋，關東大饑蝗。

莽傳：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

方苞周官辨僞二：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污吏，能布此為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

沒入為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甚也。

按：周官之書，有繩以後世之事而絕不可通者，如此所引媒氏會男女，及方相、萋族、庭氏諸職，轉見是古人真相，明其書實有據，非盡憑空杜撰，又決非出漢後也。方氏繩以後世之見，怪其不可通，因疑為歆之偽竄。凡莽批政類行，歆必一一羈其似於周官焉。然則又非以周官佐莽，竟以周官飾莽非矣。諸家辨歆偽者，率前後橫決，不成條理，特以言多邀人信，豈得為定讞哉？且歆既偽為周官，布行天下，據以發政改制，又豈得隨時妄竄？史所謂「易其夫婦」者，未必當時法令夫婦必相易，特詣獄者多，不能各獲其耦，而史家甚言之，豈有勒為政令之理？拘儒自抱萬世一姓之見，視莽、歆為非人，極惡大罪，將烏從得其政制之真哉？

又按：方氏周官集注論此事云：「世人多以此病周官，然聖人曲成萬物而使不納於邪，義即在此。單丁女戶，無主婚者，或因怨曠以致淫逸，或相爭奪以成獄訟，豈若天子之吏以王命會之而聽其奔，為正大而無弊乎？」據年譜，周官集注成於五十三歲，文目編年，周官辨偽入未詳文目，僅云多在五十以後。惟辨偽開首即云：「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

所以止佚淫而消鬪也。每見毗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此即集注之說。蓋方氏自引而自駁之也。其他如地官載師、廩人、夏秋二官方相、靈涿、哲族、庭氏，皆有以爲之說。尤於哲族氏深歎之，曰：「然則聖人設官以驅夭鳥，豈可謂不急之務哉？」嘗考方氏三十五歲丙子作讀周官文，時方深信周官乃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是時所見蓋與莽、歆同類；其爲集注，即本此意。逮後爲辨僞，乃致疑於歆之僞竄。鄭堂讀書記謂其「與明金德溫（嗜）周禮述注、本朝萬充宗（斯大）周官辨非，皆若親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厥後又作周官析疑暢發厥旨，何其與十餘年前著周官集注之心大相刺謬？至方氏疑戴禮，持論頗似姚立方。方氏晚年或有聞於姚氏之說而發此疑。「新學僞經」之論，則又自方氏啓之也。

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

莽傳：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數千人。……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微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為吉，亂

按：三皇、五帝固非信史，然謂五帝有少皞，及五帝前有三皇，皆歆偽竄，則大不然。少皞之辨已詳於前。三皇之說，呂氏孝行覽用衆貴公、莊子外篇天運已屢言之，揚子雲甘泉賦：「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又羽獵賦：「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時子雲初來京都，周禮未出，豈已從學於歆耶？將甘泉、羽獵復有歆所偽竄耶？今文家言亦非盡信，異於今文，非盡歆僞。康氏一往之論，胥可以是折之。

弛山澤禁。

莽傳：莽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薄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悉聽之，勿令出稅。……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勿蒙，非予意也。」

按：莽爲政初意，未嘗不欲利民，而固執拘泥，不達民情，轉以爲害。及其悔之，亦時有更張。莽傳又云：「莽知天下潰畔，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筭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光武兄弟起兵。」則莽亦頗悟其非矣。

王匡、廉丹討赤眉，廉丹戰死。

莽傳：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

按：新朝之覆，爲之殉者頗不乏人，而廉丹爲最先。丹孫范，名行著東漢，師事博士薛漢，坐楚事誅，故人門生莫敢哭視，范獨往收之。顯宗大怒召問，范對：「大父丹爲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怪范能若此！」因釋之。是丹猶見敬於後漢諸帝矣。

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

地皇四年，癸未。（二三）

莽年六十八。

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

莽傳：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

十月，戊申朔，外兵入長安。

莽傳：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行城門，見殺。……莽避火宣室前殿。……紺袍服，帶璽，執，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箠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三日庚戌，莽見殺。

莽傳：三日……晨，……莽就車，之漸臺。……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衆兵圍數百重。……王莽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王揖、趙博、苗、唐尊、王威……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軍人分裂莽身，……爭相殺者數十人。

按：羣書治要引桓譚新論言及莽敗有云：「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是以稀獲其功效。……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

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王翳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譚親仕莽朝，其論可據，故備錄之。

莽將李聖、孔仁、杜普、沈意、賈萌皆死。

莽傳：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都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

張竦卒。

游俠傳：及王莽敗，二人（張竦、陳遵），俱客於池陽。竦為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諷俱使匈奴。

按：莽傳，莽死在十月，更始到長安在明年二月，竦死在更始至長安前；則在十月後，二月前也。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王制正義云：「俗禁，若前漢張竦行避反支。」竦之避反支，與劉歆待太白星出

兩漢博士家法考

一 博士淵源·····	一八三
二 秦博士議政與焚書·····	一八五
三 坑儒·····	一八九
四 論秦博士與詩書六藝之關係·····	一九〇
五 自秦焚書後至漢文景時代之博士·····	一九二
六 漢武一朝之崇儒更化·····	一九四
七 武帝時代之五經博士·····	一九七
八 武帝時代經學轉盛之原因·····	一九九
九 史記中之古文·····	二〇二

一〇	宣元以下博士之增設與家法興起·····	二〇五
一一	齊學與魯學·····	二二〇
一二	家法與章句·····	二二三
一三	劉歆爭立古文諸經與東漢十四博士·····	二三一
一四	今學與古學·····	二三五
一五	白虎觀議奏與今古學爭議·····	二四〇
一六	圖讖內學·····	二四七
一七	東漢之所謂古文·····	二四九
一八	博士餘影·····	二五八

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沈欽韓疑「弟子」二字爲衍文，然亦無證。要之，戰國魯、魏皆有博士，公儀休當魯繆公時，賈祛應在後。魯繆尊養曾申、子思之徒，魏文侯則師事子夏而友田子方、段干木。儒術之盛自魯、魏，是則博士建官本於儒術也。說苑尊賢篇稱「博士淳于髡」，五經異義謂「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是也。然他書皆稱「稷下先生」，不稱「博士」，二者蓋異名同實。故漢祖拜叔孫通爲博士，而號「稷嗣君」，此謂其嗣風於稷下。鄭康成書贊，亦謂「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棘下」卽「稷下」也。安國爲漢廷博士，而鄭君稱之爲「稷下生」（「生」卽「先生」），故知「博士」與「稷下先生」異名同實，晚漢猶未墮此義。史稱稷下先生多至七十人，而秦、漢博士額亦七十。孔子弟子七十人，當時諸侯尊慕孔子，故養賢設官亦以七十爲準。然則博士設官原於儒術，更益信矣。惟魯、魏之制不能詳說；齊之稷下，固已不限於儒業。史記田齊世家謂「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漢書百官表謂「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夫「掌通古今」，卽「不治而議論」也。則秦之博士卽本戰國，亦居可知。又褚先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在宋元君時，故沈約宋書百官志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洵不虛矣。（按：本節所論，詳見拙著先秦諸子繫年第四十八、第七十五、第一百十八諸篇。）

二 秦博士議政與焚書

漢書百官公卿表：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續志：「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

問對。」「通古今」、「承問對」，此即「不治而議論」也。「教弟子」，此亦稷下已有之。如

荀卿年十五，游學於齊，即爲稷下弟子也。稷下有弟子，故其師稱「先生」。是則賈祛爲魏王

「博士弟子」，亦未必不信。秦博士掌承問對，如羣臣上尊號，稱「謹與博士議」。（二十六年）

始皇渡湘江，逢大風，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二十八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

（三十七年）及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皆是也。博士既承問對，則易涉於議政。秦博士

議政最著者，莫如其議封建。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

曰：「陛下神靈，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自上古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

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

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而焚

書大波軒然起。丞相李斯奏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

士官。史官自商、周以來已有之，此乃貴族封建宗法時代王官之舊傳，博士官則自戰國始有，蓋相應於平民社會自由學術之興起。諸子百家既盛，乃始有博士官之創建。博士官與史官分立，即古者「王官學」與後世「百家言」對峙一象徵也。漢書藝文志以六藝與諸子分類，六藝即古學，其先掌於史官，（此義章學誠文史、校讎兩通義已言之。）諸子則今學，所謂「家人言」是也。戰國博士立官源本儒術，然漢志儒家固儼然爲九流百家之冠冕，列諸子不列六藝，則明屬家言（即新興之平民學），非官學（即傳統之王官學）矣。詩書爲六藝統宗，雖於古屬之王官，然自王官之學流而爲百家，詩書亦已傳播於民間，故儒、墨皆道詩書，於是詩書遂不爲王官所專有，然百家之言亦不以詩書爲限。此即在儒術而已然矣。此古者官學與典籍之大體，必明於此，而後可以明瞭秦廷焚書之真相也。

李斯除請焚書外，尙擬辦法數項：

一、敢偶語詩書棄市。

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三、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諸子篇，逢行珪注諸子鉅等。）又謂秦焚書而詩書古文遂絕，（史記六國表序、太史公自序、揚雄劇秦美新，及論衡上舉諸篇。）蓋非無據而言也。

三 坑儒

坑儒事起焚書後一年，緣有侯、盧兩生，爲始皇求僊藥，謂始皇貪於權勢，未可爲求，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煉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詬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據此則諸生見坑，厥爲兩罪：

一曰誹謗上。

一曰詬言以亂黔首。

博士與六藝之關係。古代學術分野，莫大於王官與家言之別。鮑白令之有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言其公，「家」言其私。百家言者，不屬於王官而屬於私家，易辭言之，卽春秋以下平民社會新興之自由學術也。王官學掌於「史」，百家言主於諸子，諸子百家之勢盛而上浮，乃與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焉，於是有所謂「博士」。故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學而漸自踰於官學之尊之一職也。詩書六藝初掌於王官，而家學之興實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書皆原本詩書，故詩書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間而漸自泯於家言之間者。故詩、書既與官史有別，（如孔子春秋不同於魯春秋；儒門詩書既經孔子修訂，亦必與官史舊本有出入也。）亦復與新興百家言不同。

（詩書乃舊典，百家言乃新著，且百家亦不盡據詩書。）詩書之下流，正可與博士之上浮，交錯相映，而說明春秋、戰國間王官之學與百家私言之盛衰交替過接之姿態焉。後世不明於此，乃謂博士官專掌六藝，此無證臆說也。魯、魏博士，以及齊之稷下，皆不聞專掌六藝，秦博士掌通古今，若專掌六藝，是知古不知今，近于陸沈矣。博士卽家學之上映，若專掌六藝，又何以自別於王官之史哉？惟其博士不專掌六藝，故秦廷有占夢博士，有爲仙真人詩之博士。至漢初文帝時，亦尙有諸子傳記博士。今謂博士專掌六藝，是誤以武帝後事說秦、漢初年也。然博士不專掌六藝，亦非不掌六藝，此如百家非專據詩書，亦非全不據詩書也。秦博士自有掌六藝者，如伏生以治尚書而爲博士

者；其人似多在焚書後。

（說苑至公篇：「始皇召羣臣而議，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云云，說苑述其事再言

「令之」，知「鮑白」乃複姓，蓋係「鮑丘」字譌。新語資質篇言「鮑丘子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是也。「鮑丘」又作

「包丘」，鹽鐵論毀學篇言「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是也。然則此「包丘」、「鮑丘」，蓋卽漢初傳詩之浮丘伯矣。此吾友蒙

文通說。浮丘伯當與淳于越、伏生之徒同主以古非今而失職者。其爲博士則應在焚書前。）及漢興而叔孫通爲博士，然

其時學術未盛，博士之詳不可考。孔子世家：「鮒弟子襄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

此惠帝時博士之僅見者。歷高后至孝文，而學者益出；其時書亦漸多。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

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是也。前書楚元

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又云：「伏

生教濟南張生，張生爲博士。」不知在文帝抑景帝時。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同劉歆說。孝景時博士可考者：轅固，齊人，以治詩爲博

士。胡毋生，齊人；董仲舒，廣川人，均以治公羊春秋爲博士。然此所載皆出儒林傳，特本其後

博士限於五經而推溯言之。非謂文、景兩朝博士，限於儒生經師也。其他尙可考見者，如魯人

公孫臣，以言「五德終始」召拜博士，在文帝時。賈誼年二十餘，以頗通諸子百家之書，亦召爲

博士。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文帝時亦爲博士。轅固生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黃生無所

賢良對策，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議皆自仲舒發之。」此謂尊儒崇孔議始仲舒也。而考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此爲武帝卽位關頭第一聲。其一朝措施，卽已於此露其朕兆，定其準的矣。時武帝年十七也。衛綰爲人醇謹無他長，以敦厚見賞於文、景兩帝。何以少主初政，突發此驚人之議？且其事不著於綰之本傳，惟於武紀見之。又其年六月，綰卽以不任職罷免。（據百官公卿表）可知此議發動，實不在綰。蓋是年舉賢良，仲舒預焉。罷申、韓云云，其議實發自仲舒。卽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也。惟仲舒對策之年，昔人尙多異議。漢書武紀載於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通鑑則據史記「武帝卽位，爲江都相」之文，載於建元元年。蓋通鑑所定實是。本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案：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一也。（通鑑考異說）又武紀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對曰」云云，本傳在廢爲中大夫時，居家推說其意。是賢良對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二也。（沈欽韓說）史公學於董生，記事必確。史傳云：「今上卽位，爲江都相。」是爲相在建元元年，對策卽於其時審矣。遼東高廟災，仲舒且爲下獄。若其事在對策前，則名尙

未顯，主父偃何自嫉之？史、漢並云仲舒自是「不敢復言災異」，而對策推災異甚切。武帝冊中又有「敬聞高誼」語。若曾受拘繫，不合爲此言。劉向傳又言：「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下吏，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不云下吏後對策爲江都相。又其較然無疑者，三也。（蘇輿說）又仲舒對策詳論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其在建元元年，四也。（王楙野客叢書說，蘇引。）又按：公孫弘傳：「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考弘卒元狩二年，年八十，上推二十年，正值建元之歲，公孫與董並舉，武紀並不誤，特誤謂在元光耳，五也。（此及門錢生樹棠說）惟策中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一語。自漢初至建元三年始七十歲，則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餘歲」，（齊召南說）此若可疑，然此處實有衍文。原文當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淺人妄加數字耳。（蘇輿說）策中又云：「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通夜郎在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後。而張騫道康居，遠在其後十餘年，無從先有「歸誼」事。然則仲舒對策，不僅「臨政願治」一語，非當時之真矣。

抑猶有進者，推隆儒術，復古更化，此不僅仲舒策中言之，即武帝詔冊，辭旨昭彰，固已有隆儒更化之意矣。仲舒所對，特與朝旨所合，非果由仲舒始開是意也。時朝廷大臣，如丞相衛綰之徒，皆椎樸非學士。武帝以十七齡少主，初卽位，制詔賢良，已卓然有復古更化之意，此必有

紀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於學官者，惟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稱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按：胡毋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於景帝時爲博士。則武帝所增祇三經，非四經也。而稱置五經博士者，據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蓋申公之儔其前爲博士，乃以「通古今」，非以其「專經」。其時則諸子百家皆得爲博士。至武帝專隆儒術，乃特稱「五經博士」。而其他不以五經爲博士者，遂見罷黜；後世因名之曰「諸子傳記博士」。其先皆以通古今，則不別五經與諸子傳記也。故以專經爲博士自武帝始。儒林傳贊獨舉四經者，後此四經皆有增設，至宣帝時，增員至十二人。獨詩惟三家，一猶文、景之舊，博士不增，故亦不及。〔王莽立毛詩博士，漢人不以爲典要。〕非謂武帝時增此四經也。故自武帝建元五年，而後博士之性質與前迥異。翟酺謂「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當文帝時博士專經僅於一詩，此轉可證文帝時博士不限於經術，固不得謂武帝乃繼文帝之一經而增成五經也。其後十二年〔元朔五年〕，又爲博士置弟子員，其議始於公孫弘。其先博士自有弟子，如叔孫通拜博士，爲漢定朝儀，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畝野外習之是也。然此特弟子自從其師，與朝制無關。公孫弘之議，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謨、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此史公謂凡譜謨終始五德之傳言黃帝以來年數，皆與古文不同，又自見乖異，故寧法孔子，亦不論次其年月也。此正猶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所謂「謨譜終始之傳」者，皆後起百家言，非古文，不得與尚書及孔子所傳帝德、帝繫相提而並論也。此史公之意昭彰甚顯。其爲七十二弟子列傳，又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夫六籍傳於孔子，故凡其書出孔氏者，史公皆尊之曰「古文」而謂其「近是」，如五帝本紀贊所謂「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及此處弟子籍之類皆是也。故詩書六藝既古文，而凡書之出孔氏之傳者，史公亦謂之古文而近是，此史公之特尊孔子，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者也。然則以後世經生之見專謂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爲古文者固失之，即謂凡先秦舊籍在秦火以前者皆得稱古文，如班氏河間獻王傳之例，亦殊非史公意也。史記常以詩書古文連言，皆當如此說。古文卽詩書，卽六藝也。（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惟此處「古文」乃指古文字言。漢書特爲增一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是也。然尚未指如後世之所謂「古文學」。至後書乃曰：「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至是乃有「古文學」之稱；然亦僅謂尚書古文學，非可擺脫尚書範圍，而謂諸經共自有一古文學也。辨

詳後。）

一〇 宣元以下博士之增設與家法興起

漢自宣、元以後，儒術日盛，朝廷博士，遂多增設。儒林傳贊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沈欽韓云，「易楊」為「易田」之訛。）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佚，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考孝宣增立博士，在甘露三年。宣紀甘露三年：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此所謂「石渠議奏」也。時與議者，據儒林傳有：

易家博士沛施雠（從田王孫受業），黃門郎東萊梁丘臨（賀子。受業於施雠）。書家博士千乘歐陽地餘（高孫），博士濟南林尊（歐陽高弟子），諱官令齊周堪（事夏侯勝），博士扶風張山拊（事夏侯建），謁者陳留假倉（張山拊弟子）。詩家淮陽中尉魯韋玄成（父賢，受詩於取丘江公及許生），博士山陽張長安（事博士王式），沛薛廣德（亦事王式）。禮家梁戴聖（后蒼弟子），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亦后蒼弟子）。公羊家博士嚴彭祖（事陸王），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家議郎汝南尹更始（事蔡千秋），待詔劉向，梁周慶，丁姓，中郎王玄（後漢賈逵傳注作「王彥」）。

可考者凡二十二人。其議奏之見於藝文志者，有書四十二篇，禮三十八篇，春秋三十九篇，論語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凡一百五十五篇。（易、詩二經無議奏，疑因易家與議者惟施氏，詩家惟魯詩，並事王式，故無異同之對。殆散入雜議中。又石渠議今並無傳，惟杜佑通典稍存其二。）今考漢武立五經博士，一經初似不限於一人。如歐陽地餘爲歐陽高孫，林尊師事歐陽高，同爲博士議石渠，則歐陽尚書同時有兩博士也。又如博士張山拊，事小夏侯建。其與議石渠時，先已爲博士。然漢廷增立大、小夏侯博士在石渠議後，則山拊爲博士時，猶未稱小夏侯尚書博士，慮亦不當稱歐陽尚書博士。所以稱歐

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然仲舒見稱通五經。又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兒寬爲弟子。（見兒寬傳）此皆博士初不專治一經之證也。

夫既不以一家一博士爲限，而博士又不限於專治一經，則知所謂「某經博士」之稱，必屬後起。其先博士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七十人），經學、諸子百家、詩歌、藝術、雜伎皆有之，固未嘗以某經博士爲號。及武帝置五經博士，特罷黜以百家傳記爲博士者，而博士之選，專以通五經爲主。初亦未有某經博士之號也。如后蒼通詩、禮爲博士，而於詩、禮皆有著述。藝文志：

詩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禮曲臺后蒼九篇（又孝經后氏說一篇）。

又其詩、禮皆有傳人。蕭望之傳：「望之治齊詩，事同縣（疑當作「同郡」）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翼奉傳：「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此后蒼齊詩之傳也。其禮學授之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勝，沛慶普；此后蒼曲臺禮之傳也。然則謂后蒼通詩、禮爲博士者，其在當時，當稱「齊詩博士」歟？抑「禮博士」歟？固難說矣。

又考儒林傳：

博士。卽以后蒼言，其爲博士已在孝宣時。

〔百官公卿表：〕

「孝宣本始二年博士后蒼爲少府。」距武帝卒已十五

年；距始立五經博士，則六十四年也。

而儒林傳詳后蒼事於齊詩之系。是謂后蒼通禮，而以齊詩爲博士，

猶如江公雖通穀梁而以魯詩爲博士也。則自后蒼以前，無以禮經爲博士者。孝武時雖云立五經博士，而禮經顧闕。故知其時所謂五經博士，乃一總名，以別於前之博士。前博士掌通古今不限五經，此則限以五經爲博士也。而博士員數，不限於五。有一經數博士者，如魯詩，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有雖列五經而並無博士者，如禮；有一博士而兼通數經者，如上舉申公、董仲舒、瑕丘江公、韓嬰、褚大皆是也。又如：

史記儒林傳：

丞相御史言，謹與博士平等議。

〔武帝元朔五年。〕

史記三王世家：

博士臣將行等。〔元狩六年。〕

漢書武帝紀：

元鼎三年夏大水，秋九月，詔遣博士中等巡行。

史記酷吏傳：

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山爲博士在張湯爲御史大

夫時；湯以元狩三年爲御史大夫，元鼎二年自殺。〕

漢書霍光傳：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孔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蒼〔后蒼〕

議。（昭帝元平元年。）

以上所舉，皆不詳其業之授受，不知爲何經博士。殆自漢武以來，博士員數尙頗盛，雖無往者七十之數，然並不分經各立，限五經立五博士，或總五經諸家各立一博士也。

又武帝元朔五年，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謂：

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然則博士弟子亦不限通一藝矣。故知漢初以來，雖承秦人焚書之後，能通一經之士已不多遘，然初未有專經之限。惟自博士官既置弟子，則博士教授亦自漸趨分經專門之途，此則斷可知爾。

今考漢博士經學，分經分家而言「師法」，其事實起於昭宣之後。據儒林傳：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其事在田王孫後，田王孫爲漢武時博士，其先易未分也。劉歆移書太常：「往者博士，易則施、孟，孝宣廣立梁邱易」，似施、孟分家已在石渠議前。惟漢書儒林傳贊：「初易惟有楊（係「田」）

字謫，孝宣世復立施、孟、梁邱，以諸易分家盡歸孝宣後，最爲得之。石渠議奏易家出席者獨施雠，其時諸易家法尙未分，則施易卽田易也。僅有田易，則僅當稱「易博士」，決不稱「田易博士」矣。

由是施家有張（禹）、彭（宣）之學，孟家有翟（牧）、白（光）之學，梁丘有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之學。

是易三家各有分派，其事更在後。

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京房師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卽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肯認。而京氏易立博士，尙在京房後。

由是易有高氏學。

高、費皆未嘗立學官。費直傳王璜，高相傳毋將永，費、高二人同時，皆當在成帝後。是易學分

學晚起也。

由是魯詩有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氏之學。

三人皆王氏弟子。王氏爲博士在宣帝時，三人皆爲博士，遂分派別。

由是張家有許（晏）氏學。

其起更在後。此魯詩分派盡晚起之證也。

由是齊詩有翼（奉）、匡（衡）、師（丹）、伏（理）之學。

翼、匡皆后蒼弟子。師、伏則又匡之弟子矣。此齊詩分派更晚起之證也。

由是韓詩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

王吉、食子公爲博士，在宣帝時。長孫順受詩於王吉，皆晚起。此韓詩分派亦晚起之證也。

竊疑詩分齊、魯、韓三家，其說亦後起，故司馬遷爲史記，尙無齊詩、魯詩、韓詩之名。惟曰：

然諸經說雖有歧異，爲差不甚懸。其間惟公羊、穀梁兩家說春秋，則差別較大。石渠之議，本自平公、穀是非而起。儒林傳載其事甚詳，謂：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敏捷，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

蓋申公只有訓故，不別爲傳。「無傳」對上「爲訓」爲文，「闕不傳」對上「以教」爲文。漢儒傳經各守義法，故、訓、傳、說體裁不同。故、訓疏通文義，傳、說徵引事實。申公「獨以詩經爲訓無傳」，謂申公祇作詩故，不別作詩傳也。云「獨」者，以別齊、韓詩有故復有傳。此則魯學謹嚴之風然也。其弟子王臧、趙綰言之武帝，召申公。至，見天子。問治亂之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則申公爲人如其學，亦純謹一流。雖弟子受業者百餘人，爲博士者十餘人，然於朝廷大政殊不得志。史記封禪書：

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

偃、霸皆申公弟子，亦謹守舊聞，不事阿合，遂以見斥，則仍是申公純謹遺風矣。武帝以封禪事問兒寬，寬逆探上意爲對，遂稱旨得親幸，拜御史大夫。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又受業孔安國。其人有政治才，蓋齊學恢宏之風也。齊學言尚書自伏生，其傳爲晁錯，亦擅權用事。伏生尚書大傳，特重洪範五行，則爲後儒言五行災異之祖。齊學言詩自轅固生，韓嬰燕人，亦治詩，燕、齊學風較近似。故班氏論之曰：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藝文志）

是齊學恢奇駁雜，是魯學純謹不同之驗也。夏侯勝族父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然。勝從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諫昌邑王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其學亦擅陰陽災異，不失恢奇齊風。董仲舒對策引尚書太誓「白魚赤鳥」之論，以災異言公羊，亦與齊學相通。江公受魯詩、穀梁於申公，然訥於口，議不如仲舒。則大抵治魯學者，皆純謹篤守師說，不能馳騁見奇，趨時求合，故當見抑矣。至於治易者，施、孟、梁丘皆出於田何；何，齊人也，故諸家亦好言陰陽災變，推之人事。惟費氏易較不言陰陽，較為純謹。故漢之經學，自申公魯詩、穀梁而外，惟高堂生傳禮亦魯學。其他如伏生尚書，如齊、韓詩，如公羊春秋，及諸家言易，大抵皆出齊學，莫勿以陰陽災異推論時事，所謂「通經致用」是也。漢人通經本以致用，所謂「以儒術緣飾吏治」，而其議論則率本於陰陽及春秋。陰陽據天意，春秋本人事，一尊天以爭，一引古以爭。非此不足以折服人主而自伸其說，非此亦不足以居高位而自安。故夏侯勝言之，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漢制，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士通經術，爲三公如俯拾地芥，此乃漢宣以後儒術日隆之象，豈不以通經術，能推之吏治，上有以筭帝王之口，下有以折卿大夫之舌，而確乎有所持守乎？則天意之陰陽，與人事之褒貶，率於經術得之也。穀梁自瑕丘江公以下，迄於甘露石渠之議，爲時亦數十年，其所以勉自赴於致用之途以上邀天子之懽心者，其事亦略可推。故至於石渠一會而終亦得立博士，與公羊並峙。今觀其書於周天子特致尊崇。如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左氏、公羊皆以「戎」爲戎狄，而穀梁獨以「戎」爲衛國，謂衛討天子之使，故貶稱「戎」。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左氏、公羊皆無傳，穀梁獨謂聘諸侯非正。此穀梁特以創說尊王，蓋亦以媚漢帝而取顯。則公、穀異同之爭，仍是漢儒通經致用風氣。而穀梁之爲學，亦復與魯詩專謹於訓詁者異矣。慮其所謂「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積十餘歲」者，必有非盡於往日申公所傳之舊說也。

一二 家法與章句

且進而一論「家法」之所以爲家法者。直捷言之，則「家法」卽「章句」也。漢儒經傳有章

大較也。王式亦治魯詩，來師事者，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是王式仍守申公以來闕疑弗傳之旨，故所言簡略，不肯具文飾說也。其弟子

唐生（長賓）褚生（少孫）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

是唐、褚亦能守王式師法，遇疑不能明者則闕不說。而諸博士乃驚問何師，是當時博士學風，已漸以具文飾說相尚，故得唐、褚之對而驚矣。班氏謂：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蓋訓故通其大義，傳則比傳事實。申公說詩家法最純謹，班氏所祖，不為無故。然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外傳猶在。（或疑內傳即在外傳中。）其書亦舉大誼，不循章逐句為說，則傳與訓故，其體相去猶不遠，猶是漢初經師家法也。今考洪适隸釋漢武榮碑云：

榮字含和，治魯詩韋君章句。

亦無怪於當時博士之「專己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耳。

及平帝時，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皆置博士，又周官於王莽時亦置博士（見藝文志）；然至光武中興，則此諸經復廢，其時立官者凡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春秋有嚴、顏，其他如慶氏禮、左氏、穀梁春秋，皆立而旋罷。而左氏與公羊之爭獨盛。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爭之曰：

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

此後諸經竟不得立。蓋博士設官既爲利祿之途，朝廷苟不加以限斷，則經說新異，勢必日出而無窮，范升之爭非爲無見，固不得全以黨同門，妒道真責之。而據范升說，則當東漢初葉，諸經間亦僅有立官與不立官之分，仍未有所謂今文與古文之界劃也。稍後賈逵又爭立左氏，其言曰：

玄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冥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而卒。

蓋有章句家法，則為師者易以教，為弟子者亦易以學，又何為不憚煩而必兼通數家之說哉？論衡程材篇所謂「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是也。博士弟子一年輒課，毋怪其不願兼通。而光武亦至於不得不徇諸生之請，令玄還署，則章句俗學之盛，豈難想見？在當時則美而尊之曰「師法」。若師法洵可尊，則歐陽尚書之後，何來復有大、小夏侯？公羊有董氏矣，亦何來復有嚴、顏？劉歆譏之曰「末師」，良非過也。

其有不樂守章句師法者，當時稱之曰「古學」。古學必尚兼通，桓譚傳稱譚：

博學多通，徧習多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喜非毀俗儒。

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故好古學者，常治訓詁，不為章句，如謝曼卿為毛詩訓；衛宏為詩序，及從學杜林，又為尚書作訓旨；袁宏紀稱馬融「學不師受，皆為之訓詁」；此皆古學也。然則東京

所謂「古學」者，其實乃西漢初期經師之遺風，其視宣帝以後，乃若有古今之分；此僅在其治經之爲章句與訓詁，不謂其所治經文之有古今也。

前書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略從丞相史尹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後書鄭興傳：「興晚善左氏傳，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是劉歆、鄭興若已爲左氏作章句矣。然考鄭衆傳：「衆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隋經籍志有鄭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又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尤明左氏、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韋昭國語解序云：「鄭大司農爲國語訓詁，解疑釋滯，昭哲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數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瞭矣。」賈逵又作周官解詁，史稱「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然並不言其爲章句。是則至賈逵時，左氏尚未有章句，彰彰明矣。馬融傳亦曰：「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是馬季長所見鄭、賈兩家之於左氏，亦僅有訓詁，無章句也。卽季長於左氏，亦僅欲爲之作訓，未嘗云欲爲之作章句。豈有遠在劉歆、鄭興之世而左氏先已有章句

之理？章句具文飾說，必遠起於訓詁舉大義之後。又其時治古學者，相率鄙章句而不爲，故知史稱「章句義理備焉」，又曰「撰條例、章句、傳詁」，此必別有說。或即指引傳解經爲章句，此則仍與條例相近似，蓋決非今學之所謂「章句」也。

一五 白虎觀議奏與今古學爭議

東漢經師爲學，分野既別，風趣相異，而爭議亦時起，其最著者爲白虎觀之議奏。東漢之有白虎議奏，猶西漢之有石渠議奏也。其議起於楊終。終言：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異同，帝親稱旨臨決焉。是楊終之議，爲章句今學破壞大體而發也。帝詔曰：

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

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

此所謂「先師」者，蓋指宣、元以前，家法未興，章句未盛，即劉歆所謂「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者是也。博士章句成於「末師」，故治古學者必追本於「先師」焉。石渠之議爲先師、末師藩界之所由判。而章帝之意祖古學，則由其感染於賈逵。後書逵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云云，是章帝自善其師說，正猶如武帝之師王臧而嚮意儒術也。

昔宣帝議石渠，本欲抑經說之多歧，然石渠議後，而經說之多歧滋益甚。今章帝議白虎，爲嫌章句之煩黷，而白虎議後，章句俗學，積習如故，亦未見有以摧陷而廓清之。然要之其勢嚮衰，有不能自久之態，此則可徵之於和帝時徐防之疏。防請試博士弟子，一依師說家法，已有一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之歎，此證家法章句之將墜矣。稍後又有樊準上疏極論，謂：「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知其時博士官學日衰，蓋章句之業積重難返，在理在勢，皆不可久，而特一時無有以易之，遂至於頽疲而不可救

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是何休雖治公羊，然論其學派，實亦古學家也。故其書亦曰「解詁」，不曰「章句」。史稱其「不與守文同說」，此明其不拘拘一師家法，如今學之所爲爾。今觀何休公羊序謂：

傳春秋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此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此序可徵何休學術源流。其謂「守文持論敗績失據」者，即指嚴、顏博士家學而言也。賈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此出經典輯錄，范傳云「三十事」。）章帝至使自選公羊嚴、顏高才生習左氏，故何休痛心而云其「敗績失據」矣。當時章句家學，如何休之所譏笑，蓋非改弦易轍，實無以應敵而自存，何休即激於此而起者。其書自名「解詁」，又自述依於胡母生條例。其先如鄭、賈父子治左氏，乃著條例與解詁，休即師其意耳。休嘗譏鄭康成「入室

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竊幸萬一。」帝深非之，以此沈滯。桓譚上疏論識，帝不納，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得解。此皆當時古學家不治識之證也。桓譚曰：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斯知當時經學治識、不治識之界，即爲今學、古學之界矣。故孔昱亦以「章句內學」連稱也。

至賈逵乃始以古學家而兼言識。建初元年，逵奏：「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識，故令中道而廢。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宜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故范曄論之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惟賈逵之附會圖識，猶有可得而說者。張衡奏請禁絕圖識，其

疏曰：「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故知逵實不信圖識，其解諸經亦不援用，其護左氏云云，則一時之權也。袁宏紀引華嶠書郎顗論謂：「光武信識書，鄭興以忤意見疏，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緯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可證賈逵之固不信識矣。許叔重從逵學，說文亦不用識，此又一證也。

儒林李育傳：「育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今案：賈逵言左氏先師不曉圖識，故中道而廢，則此所謂「多引圖識」者，必范升引之以折陳元。賈逵懲於前軼，故附會圖識以自保；而李育悟其非堅，故決捨圖識而別求所以敗敵者。於是賈逵以古學大師轉引識書，李育爲今學張目而反棄識不道，一反一復之間，亦當時學術進展之一徵也。

一七 東漢之所謂古文

東漢今學、古學之分野，已具上論；請進而一述當時之所謂「古文」者。司馬遷言「古文」，

是也。班志何不曰「古文以爲潒水所出」耶？又「萊蕪，禹貢汝水出西南入沛。汝水，桑欽所言」，此眞舉所謂古文家言，明今學說禹貢不爾。舉此二例，知班志「古文以爲」者，非即指桑欽古文說，又斷斷明矣。惟段氏謂「漢謂尙書爲古文」，此亦微誤。當謂「古文」在漢時乃五經之通稱，至後乃惟尙書獨得有古文之稱，則較近矣。

試再證之於班氏之藝文志。班志列小學於六藝後，曰：

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複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是六藝羣字皆在蒼頡、訓纂中，無所謂今文、古文之別也。惟蒼頡原本秦篆，自有隸書以來，篆體已見爲古，俗師失讀，故張敞、杜林乃以小學名家耳。此羣經文字本不分今古之說也。

班志又曰：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即劉歆所謂「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是也。此其異同，已較易經爲甚。而尤要者，古文多得逸書十餘篇，爲博士尙書所無有，故在漢儒必鄭重其事，特標以示異，曰「古文尙書」焉。凡經籍之特以「古文」名者惟此爾。此在兩漢皆然，外此則諸經皆不聞特以「古文」稱也。

許叔重說文敘：「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然考說文注中所引尙書，皆在今二十八篇中。（朱彝尊經義考辨甚詳。）即經典釋文採馬融注甚多，

亦皆今文尙書，無一語及古文，而後書謂：「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

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儒林傳）許慎既從學於逵，則其所稱尙書古文，亦當與馬、鄭相

同，蓋同本之於杜林也。許君似未見中古文，其後敘作於永元十二年，云「文九千三百五十三，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是初定本亦如此；後二十二年，許沖表上字數相同，則許君書未經重定，

故疑其預校祕書而未見中古文也。夫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尙書，其脫簡、脫字必已補正，惟文

字異者則關訓詁，三家未必遽改以相從。東漢所謂古文尙書，特惟此數百異文與三家殊耳。馬融

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見孔氏正義。）知東漢諸儒治古文尙書，皆不涉此十六篇。然則當

時所謂「古文尙書」者，固並非孔安國本，而實同伏生三家之本；特自前漢以來，有此七百許異

字之師說，而遂仍稱之曰「古文」耳。（孔安國尚書，後漢殆未有見者。）故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亦七百餘事，（今官本作「三百」，此依北宋本。）而名曰「中文尚書」；此即劉向所校，亦即當時尚書今古文異同所在也。故知東漢古文尚書，其異於三家者，實亦僅止於此，苟非沿襲西京舊稱，則亦不當特名「古文」以示異也。

又如禮古經與十七篇文多相似，而多三十九篇，則劉歆以來相傳稱之曰逸禮，以此三十九篇爲今禮十七篇所無也。所以不如尚書之例特標「古文」以示異者，以就十七篇言，古本、今本既文多相似，則無關體要；其所重在存逸，不在古今，故舉其所重而曰「逸禮」也。藝文志獨曰「禮古經」，則因舉其全書言之，內有今禮十七篇，則不得以「逸禮」爲名耳。

又如古文春秋左氏傳，其書多古言古字，然漢儒大率僅稱左氏，不特標古文字，以左傳既別無今本，其所重亦不在文字之古今，而特重在其與公、穀之異同，故徑名之曰「左氏傳」而已足也。周官亦多古文，然亦無今本，則亦徑呼周官禮，亦不冠以古文字，以文字之古今，固無關宏旨也。故兩漢諸儒稱此諸書率曰費氏易，左氏春秋，周官，逸禮，皆不冠以古文字。知文之今古，本不爲當時所重，當時辨學術分野，則必曰「古學」、「今學」，不稱「古文」、「今文」，大略率如是。

惟今學博士諸經，各有章句，文字皆經隸定，而古學諸書章句未備，訓詁未全，故治古學者必自重古文，此亦相因而必然之勢也。後書儒林衛宏傳：

宏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而杜林傳云：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參合兩傳以觀，衛宏、徐巡先雖治古學，未必攻古文。其攻古文，則自從林受古文尚書始。推此言之，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二書雖多古字，究與古文尚書不同，是鄭興所治亦僅得謂

之爲「古學」，不得云是「古文學」也。猶如朝廷博士官學，在當時亦僅云「今學」，不謂之「今文學」。此雖一名之微，然後世言漢儒經學，流衍失真，皆由此起，是亦不可不辨也。

司馬遷言「古文」，統指詩書六藝，此乃古代王官之學，所以別於戰國晚起之家言者。此至劉歆時猶然，此可謂之指學派言。至東漢則家言已微，六藝特盛，故東漢之所謂「古文」，則僅指文字，不僅無關學派，亦非指經本。經本之特以古文稱者獨尚書耳。如後書杜林傳「於是古文遂行」，此專指古文尚書言也。賈逵傳「由是四經遂行」，則合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四經言之；「古文」不能並包左氏、毛詩諸經，故改稱曰「四經」也。蓋諸經率皆有古字，卽博士今學諸經亦然，故不得有今文經、古文經之別。經學之分古今，皆不指經籍與文字言。其專治文字者，則應隸小學，非經學也。盧植上疏：

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

此處「古文」，明指文字，不指經籍與學派。可證迄於東漢晚季子幹之世，尙猶然也。其下列舉毛詩、左氏、周官，因其書頗多古字，又均未立學官，治古學者尙之；而治古學者又必重小學，

故牽連言及，非謂僅此諸書有古字，而其他三家書、公羊、穀梁春秋、儀禮皆今字也。亦有博士諸經用古文正字，而毛詩、左氏、周禮轉用今字者，此皆經籍異文，不得以此分今文經與古文經也。前書河間獻王傳列舉所得古文舊書，毛詩不在其列；藝文志亦不以毛詩爲古文。後漢儒者常以毛詩與左氏、周官並舉，正以其未列學官；亦如舉及穀梁之例，非謂穀梁有古文本，更不當稱毛詩、穀梁爲「古文」也。故「古學」者，乃指兼通數經大義，不守博士一家章句；「古文」則指文字形制義訓之異於俗隸而言。此二者，在漢儒無勿知，其誤實起於後世，至晚清之經師而益甚也。

許冲上說文解字表：「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又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此在當時，學尙兼通，卽「古學」也。故今說文解字所引經說頗多博士今學家言，如其明引歐陽尙書、韓詩皆是。蓋古學尙兼通，本可包今說，非自與今說立異。其爲五經異義，亦調和今古而斟酌之，此卽古學也。「今學」則嚴守一家章句，更不相融，如張玄兼說數家，卽不得爲顏氏博士。晚清經師，乃謂十四博士道一風同，自成體系，以與古文經學相對立，此豈漢儒之真相哉！說文解字本小學書，許氏則爲一古學家，故其書兼采當時今學、古學，而特於文字分別今古，敘中凡言「古文」者十處，皆指文字言也。近儒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考乃謂九處皆指文字，獨敘末

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乃指學派言。是亦未明當時今學、古學分野之所在也。夫漢人僅言「古學」，不言「古文學」；僅言「古文」，不言有「今文」；更無論有所謂「今文學」。後世強造新名，謂古人如此，寧有是理！今說文中所載古文，實乃新莽時甄豐所定，此或據孔壁中書，而未必與真古文相同。許叙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謂鼎彝古文皆自相似，明與許書中所謂「古文」不相似。許氏未覩中古文，（說見上。）其謂「古文」者，自本甄豐、杜林之徒。其書引古文四百餘字，特備六書之一體；其字往往有出正文後者，此特文字異體，而許君則備引易孟氏、書孔氏，以及毛詩、周官、左氏諸書以證之。此在許書原本，或明繫「某氏某書」以爲別，而後人刊落之。故在許君本爲引經證文，而後世謂其據文說經，又謂其據經明學；不知許書自是包括六藝羣書之詰訓，又豈拘拘焉以後世之所謂「古文學」者自限耶？

一八 博士餘影

清代經師，盛尊漢學，高談師說家法，已失古人真態。又強別今文、古文，誤謂博士官學，

皆同源一本，自成條貫，而古學起與立異。分門別戶，橫增壁壘，掇拾叢碎，加以部勒，還視當時章句，曾不能千萬得一；而肆其穿鑿，強爲綴比，積非成是，言漢學者競引據焉。余茲所述，轉將爲非常可怪之論。顧博士家法，實不盡於兩漢。禮失則求諸野，不識前代，下視近世，先後同揆，事尙多有。姑拈北朝、隋世兩則，聊證吾言。

一、顏之推家訓謂：

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宋俗以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於經業。梁朝皇孫以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以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綽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

如是則我們研究孔子，至少不能不注意到春秋。

而且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論語則與爾雅、孝經並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而且當時人又說：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他們舉了孝經、春秋而獨不及論語，這又爲什麼呢？這因春秋乃孔子晚年的著作，孔子自己說：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可見要窺見孔子生平的心事和志向，自然應注意到春秋。若孔子平日言論行事，見之於論語的，如論仁、論智、論禮樂、論學、論君子，頭緒多，門類廣，在中小學階段的人，驟然不易把捉到要領。反不如孝經，專一講孝道，又簡易，又扼要，自天子至於庶人，都可學，都可行。所以就小學言，孝經更適合；爲大學言，爲要眞研究孔子平日之微言大義言，則非春秋而莫屬。（漢人自初卽有孝弟力田之獎勵，故漢人重孝經，亦與當時王官制度有關係。）

以上是兩漢人見解，此下魏晉南北朝以迄於隋唐，春秋列於經，仍非論語所得比。直要到宋代，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亦算是經了，那時的論語，始和春秋取得同等的地位。但宋學初興，其時如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後人推爲「北宋三先生」，這三人是宋學的開山，他們也多講春秋，仍像是看春秋更重於論語。下及二程和朱子，纔始提高論語地位超過了春秋。於是講孔學的，更要在研究論語了。

但這一觀點，到清代乾嘉以後又變了，似乎他們看春秋又復重過了論語。道光時，戴望作論語注，他想把公羊春秋來創通論語之義，這是一明證。晚清公羊今文學盛行，那時人講孔學，似乎董仲舒的地位更超過了朱晦菴。這是說，他們所認的孔子精神，還是在春秋，更高於在論語。

只有最近幾十年，一般人意見，似乎較接近兩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論語，而忽略了春秋。（戴望治、李學、顏、李主張由兩宋返先秦，戴氏以春秋釋論語，正可證明本文之闡述。關於顏、李思想，參讀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

二

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這是說孔子春秋只是遵着周公之遺制。下至清儒章學誠，乃有「六經皆史」之創論。但章氏之所謂「史」，並不即指所謂「歷史」言。章氏之意，乃謂古代六經皆即當時政府之「官書」，猶之後世衙門之「檔案」。章氏文史通義特有史釋篇，即是專釋他「六經皆史」的「史」字之特有的涵義。此刻我們若把章氏主張配合於杜預之所說，謂孔子春秋，乃遵周公遺制，用舊史之原文，遵周禮之成規，豈不正可說明了孔子春秋所以亦得儕於一經的理由？而杜預此說，實大背於西漢公羊學派的意見。（關於章氏「六經皆史」說大義，備見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一章，又見於近著論文經學與史學。）

若我們用現代人眼光看，孔子春秋，自然可說是一部歷史書，而且孔子也早已自己說過了。他說：「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可見春秋是一部史，而所載是當時齊桓、晉文一類的事。而且孔子又復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我們又那能說，春秋不是一部史，其所重不在其所載之事呢？

又且「經」、「史」之別，這是後代纔有的觀念。漢書藝文志，春秋屬六藝，而司馬遷太史公

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禽狝，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董仲舒也說：

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於大同。

所以說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其義與時事正相反。這是說，孔子春秋裏爲新王定制，最先是觀己國爲「內」，而視諸夏爲「外」的，這是「撥亂世」。稍後，則以諸夏爲「內」，而只以夷狄爲「外」了，這是「升平世」。最後，則諸夏、夷狄，進於一體，無分「內」、「外」了，這纔是「太平世」。如是則研究孔子春秋之所重，自不在其記事，而在其因事而見之「義法」了。公羊疏亦說：

當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於昭、定、哀也。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升平，但春秋之義，而見治之升平。

賈逵春秋序亦云：

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鄭玄六藝論亦云：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可見仲尼素王，春秋立法，不僅當時公羊家言之，即虛遂、賈逵、鄭玄諸人亦言之。既是素王立法，則決然是一種王官學，而非私家言。換言之，孔子春秋，應該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創制立法，定為一朝王官之學者有同類平等的地位，而不該下與墨翟、老聃那許多僅屬社會的私家言者為伍。故漢書藝文志終以孔子春秋上列六經，不下嬖諸子也。（關於西漢學者看輕家言的

證據，詳見拙著兩漢博士家法考，又略見拙著國學概論第四章。）

這裏遂產生了孔子春秋「為漢制法」之傳說。這一說雖先見於緯書，然我們縱說是當時漢儒推崇孔子春秋的公共意見，亦不為過。就當時人意見，遠從上古以來，一朝新王興起，則必有一聖王為之創法而定制。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皆其例。到了春秋、戰國，天下亂了，該

又有一新王興起了，却並不真有此新王。孔子則有其德，無其位。秦始皇混一了天下，他何嘗不自認爲是新聖王興起呢？然秦代二世而亡，漢儒不認秦代也得成爲一新王之傳統，只說如一年十二月之偶有閏月般，雖亦是一月，而非正常之一月。漢代則眞算是新聖人受命了，但又有其位，而無其聖。漢高、呂、惠，幾十年來，一切法制，都沿襲了秦之舊，這在漢初是無可諱言的。如是，則漢王室雖是一朝之新王，而實無一朝新王之制度與文物。這在文帝後，一輩學者早都明白提出此意見了。於是「孔子春秋爲漢制法」之說，正合時代之需要。因此漢武帝聽受了董仲舒意見，興太學，立博士，盡罷諸子百家，而專主五經。五經成爲漢代之王官學；而漢代的五經，又必以孔子春秋爲之主。此因詩、書、易、禮皆屬於前王，只有春秋，是一種新王法，不啻是孔子早爲漢廷安排了。因此又必然說成「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傳」如是，則那些前王之法，都經孔子手而和孔子自創的新王之法變成了一致。可見劉向歆七略，定六藝爲王官學，這不僅是說六藝乃是前王之官學，而且還是漢室昭代的官學呀！於是遂有漢儒所謂「通經致用」的說法。若非六藝經學與昭代王官之學相一致，試問通經豈不成爲「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的勾當嗎？這又如何能在漢王朝致用呢？（關於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的詳細經過，作歷史客觀的解釋與敘述，詳見拙著秦漢史，又參見拙著兩漢博士家法考，又略見拙著國學概論第四章。）

這裏讓我們再略述古代官學之轉變。在周代，官學則掌於史。章學誠《文史通義》所謂「六經皆史」之「史」字，並不指歷史言，而實指的官學言。古代政府掌管各衙門文件檔案者皆稱「史」，此所謂「史」者，實略當於後世之所謂「吏」。古代之六藝，即六經，皆掌於古代王室所特設之吏，故稱六藝爲「王官學」。而古代王官學中最主要者則應仍爲近於後代歷史之一類。故古代宗廟史官實爲職掌官學之總樞，而其他一切所謂「史」者，則似由史官之「史」而引伸。但當時宗廟史官之所掌，與其謂之重要在歷史，則實不如謂其重要在禮樂。周公制禮作樂，就傳後之著述言，則又毋寧說其主要更在詩；詩有禮樂意義，亦有歷史價值。故王官六藝，最主要者，實應爲詩書。而在古代，詩的禮樂意義和歷史價值，更應高於書。這一層，可惜在此處不能詳細發揮，只得約略一提就算了。

但有詩時尚未有春秋，春秋實當繼詩而代興，故孟子說：「詩亡然後春秋作。」但詩之主要部分，如雅、頌、二南，既由周公手創，而春秋則是周道既衰，由一輩史官隨便的記述了。故春秋實遠不能與詩比。至於孔子，他自身並不是史官，由他來作春秋，這是由私人而擅自來著作了官家的史，故曰「其文則史；春秋，天子之事也」。正惟春秋經了孔子手，纔得有大義微言，宏旨密意，其精美處，遂上媲周公之詩書，而亦成爲一王大法了。

如是說來，孔子作春秋在古代學術史上，其人其書，同時實具兩資格，亦涵兩意義。一則是由私家而擅自依倣著寫官書，於是孔子春秋，遂儼然像是當時一種經典，即是由私家所寫作的官書了。而孔子之第二資格，則爲此後戰國新興家學之開山。故孔子與春秋，一面是承接王官學之舊傳統，另一面則是開創了百家言之新風氣。論語雖非出於孔子親筆，但記載的多是孔子言行，後來家學著作則皆由此創其端；故我們也可說，孔子春秋尚是舊官學，而孔子論語，纔是新家言。因此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以儒家爲之首。但因孔子春秋既已立爲漢廷之官學，於是論語、孝經因其同屬於孔子之書，遂也附帶歸入於六藝，而不列入諸子了。

故由上之所述，我們又可說：古代之官學，創自在上之王者；而漢代之官學，則實創自社會之私人，其人即是孔子。但我們若再進一步深求之，則知家言之得列爲官學，其事實不始於漢而始於秦。

秦始皇并六國，他自然自居爲一新王了。他自然也想自創一王之新法。荀卿所謂「法後王」，秦始皇便想擔當這「後王」之地位。那時六國史記都給秦廷燒燬了，只留着秦史。秦史固然亦可稱爲秦代之官學，但只代表着原始的秦國，似乎尚不能代表秦人統一天下後之新王朝。此一新王朝之學官，照理又該是代表着天下，而不再專代表着秦國，於是秦廷遂始於「史官」之外，又創

爲後王取法者。可參讀拙著論文太史公考釋。）

漢代興起於田間，他們對這些制度文章，太不懂理會。因此漢興也有博士官，一切也仍襲秦舊，無所變革。直到文帝時，治孟子、老子之學的，都得立博士，當時也並非有意要確立漢代的王官學，只是秦代這樣，漢代也這樣，便算了。直到董仲舒，纔開始提出一番「改制更化」的大理論，說動了漢武帝，把沿襲秦廷的百家博士都廢了，而改立「五經博士」代表漢王一朝之新官學。因此漢廷五經博士，一面是革秦之舊，排除了百家，一面是復古之統，專尊了六藝，專尊了古王官學，而同時又是漢代新王之創法，與古王官學性質又不同。但實際則只有孔子春秋，是新創者，其書纔始不是舊官學，而是爲漢立制的新官學。因此漢廷五經博士，無形中便讓公羊春秋占了主腦與領袖的地位。

如是則董仲舒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其推尊孔子，雖說是「法後王」，而就其罷黜秦博士舊制言，可說已經是「法先王」了。換言之，上承唐虞三代那一種歷史傳統的新觀念，已顯然代替了秦人自我作古，爲一王立法的舊觀念了。這一演變之所趨，亦間接引起此後新莽之變法。（關於董仲舒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的尊重歷史傳統的意見，詳見拙著秦漢史，又參見拙著兩漢博士家法考，及拙著國學概論第四章。）

現在我想專拈一件事來作上述之實證。史稱：

昭帝始元五年春，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這在當時，真是一齣夠驚動人心的大事。衛太子忽然出現了，整個王室和朝廷，誰也想不出辦法來。一個京兆尹，他只要根據孔子春秋，便膽敢毅然拿太子來判罪。此一事，豈不可說明孔子春秋在當時的力量？可見爲漢制法，也決不是當時一派博士經生的空頭話。縱說孔子並非爲漢制法，但漢廷法制，有許多却是根據孔子春秋而建立。所以後來漢宣帝要在博士中增立穀梁春秋一家，却經過了絕大困難，絕大曲折，必須獲得了朝廷大臣多數之贊同，纔獲實現。正因爲博士所講，既是當代的王官學，博士說經，可以影響當時具體政情，故必得如此般鄭重。否則如近代般，

在國立大學中添設一講座，如何會形成這樣的大爭議？（關於宣帝增立穀梁博士之爭議，詳見拙著秦漢史，及

兩漢博士家法考，又劉向歆父子年譜。又公羊家謂「春秋是衛輒距刪」一節，正之論語述而篇「冉有夫子爲衛君乎」章，則公

羊似非孔子意。何休公羊解詁亦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蓋即本論語。然即此亦可爲當時漢人重春秋過於重論語一旁證。）

但孔子爲漢制法，固替漢廷建立了制度，引生了光榮，而同時也爲漢代帶來了麻煩，橫添了糾紛。縱是最忠心漢室的劉向也說過：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這便是孔子春秋的大義。孔子在周代，早已爲漢制法了。現在那些漢代的儒生，從漢武帝以下，他們早感得漢代的太平世已過，漢德已衰，依照孔子春秋義，也該又有新王出現了。蓋寬饒、眭弘都爲公開請求漢室求賢讓位，招致了殺身大禍。但禪國讓賢，新王受命的呼聲，依然不能絕，終於逼出了王莽。這是孔子春秋在當時的大影響。但問題又來了。新室受命，理該也有新室自己一套的王官學。孔子春秋既是爲漢制法，便不再是爲新制法了。而且春秋既所謂「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究竟在春秋一書的本質上，照漢儒看法，是「法」的意味重過了「禮」，「撥亂」的氣象重過了「升平」，唐代陳商有立春秋左氏學議，他說：

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

這也不能說他全是無見而妄說。西漢元帝時，王吉、貢禹之徒，也就對武、宣兩朝政治，發出不滿的批評。他們所不滿者，正爲是漢武以來之重法而輕禮。因此王莽一朝，終於要逼出「發得周禮」的呼聲來了。而左氏傳所載却有些處與周禮合，而與公羊春秋有不同。從此我們也可想見，漢、新之際的左氏與公羊之爭，後來所稱當時的「今文」、「古文」之爭，其間當然決不是僅爭的幾本古經典，更不是在幾本古經典裏僅爭些文字的今古之不同。周禮既是周公致太平的書，豈不與孔子春秋所謂一王大法者旗鼓相當嗎？王莽受禪，本是依公羊家言而出現，王莽自然並不想把尊周官來黜公羊。但莽朝新政，則顯然有些多根據着周禮，這些也是沿襲着王、貢以後的時代意見而來的。此即劉歆之所謂「廣道術」。若真要廣道術，則孔子僅是古代聖人中的一聖，於是由孔子上推至周公，一家言的重量，更會轉移到歷史的大傳統上去。在這一趨勢下，我們自可明白，後來的左傳家爲何定要說成孔子春秋沿襲了周公之舊典。可見上引杜預之說，也是遠有淵源，並非杜氏一人獨發的創說了。（關於蒯、陸、王、貢下及王莽一段史實之詳細演變，及莽政兼采周官、公羊之種種義證，均詳拙著劉向歆父子年譜。又周官實戰國晚出書，非周公之所作，證論詳見拙著周官著作時代考。）

這一問題，說到這裏，便從古代的「王官學」與「私家言」之分野，漸漸轉移接近到後世的所謂「經」、「史」之爭了。而且新朝短命，光武中興，不僅把新莽「發得周禮」的新聖典賤視了，即前漢聖典公羊春秋那些「存三統」、「作新王」一類的話，也漸漸變成當代之忌諱。所以即如公羊學大師何休，也要說公羊春秋裏有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了。那時則漢宣帝所謂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雜用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之說，也變成了光武以下之國是。於是博士官學僅成爲利祿之途，失却其從來王官學地位的眞尊嚴，而十四博士也終於要「倚席不講」了。這一變，却是中國歷史上絕大的大變，惜乎後來人漸漸忘失了這一大變之內涵的眞意義。於是所謂六藝王官之學，只說成是周代的王官學，這在章學誠，首闡此說，已成爲發明了千載未發之創見。其實他也還是沿襲杜預說法，把孔子來承續周公，把孔子春秋也僅當一部歷史書看了。我們也可說，章學誠仍不懂得孔子春秋在西漢人想法中，把來當作是作新王的一部大經大法，所謂「春秋天子之事」的那一套古代意見了。

上面這一番話，我們是根據劉向父子分別古代學術爲「六藝王官學」與「諸子百家言」之兩大類，配合上周代的史官和秦漢博士官之大轉變，來闡述西漢公羊學家那一套理論之內涵的眞意義，及其在歷史上、在當時實際政治上所發生之眞影響，而孔子與儒家在戰國到西漢這一段時間內之眞

實地位也就此指出了。（這裏另有一點該述及的，則爲史記、漢書所特立的儒林傳，當知這些該名爲「王官儒」，與戰國「百家儒」不同。若不分別出古代「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分野，則儒林傳之另成一流，便難明白其所以。宋史道學傳中人物，其實亦多是「百家儒」也。）

六

魏晉以下的中央政府更不成樣子，他們不再有創制立法，與民更始，以及創建王官學這一套想法。而社會私家言，亦不再有上撼政府，來取得創制立法的氣魄與能力。換言之，古代學術分野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對抗精神均已不存在，於是魏荀勗所創的「經史子集」四部分法，遂代替了西漢七略分類，而永遠爲後代所沿用。此後的所謂經籍，則只是幾部傳統的古書，而不再是所謂六藝王官學。而「子」與「史」則從此截然與「經」爲異類。他們更想不到新興的子與史，同樣可成爲一代的王官學，與所謂六藝經典，在古代則並無嚴格的區分。孔子春秋是一部子亦史的經。也可說是一部亦經亦史的子。那些見解，魏晉以後，很少再浮現到學術界。

南渡以後的東晉和南朝，更不成樣子，只有北方諸儒，掙扎在異族蹂躪下，他們却不忘情古

代的王官學，他們仍想憑孔子經典來在政治上爭地位，來爲北方社會謀轉機。北史儒林傳裏說：

何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

這句話透露了當時一個很關重要的消息。若我們細檢北史儒林傳，像是很少專以公羊名家的經生。但若通觀北方儒學，顯然在他們中間，存有一種共同的大趨勢，他們也如西漢儒生般，大家想通經致用，把經學來變成當代與王致治之學的那一種趨勢。這實爲南朝儒學所沒有。而這一種趨勢，則明是西漢公羊學精神。所以北史儒林傳所稱「何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這一句話，實不是違背實況，無端虛說了，這要我們用一番更深入的眼光來解釋。

除却崔浩、寇謙之一番波瀾外，似乎在北朝，也很少提到「通三統」、「作新王」的那一套。但「爲漢制法」、「撥亂返治」的精神，則在北朝諸儒間始終未消失。直從魏孝文下至北周蘇綽與盧辯，遂形成了新莽以後第二度的「以周禮與太平」。而北齊周禮大師熊安生，正當周師入鄴，他却安坐家中，靜待周主的來訪，而周主也果然來訪了。這是周武王訪商容閭的故事之真實化。這正因爲周禮已成爲當時北方顯學，爲一般君臣所重視。我們姑不論徐彥公羊疏是否即是北齊之徐遵明，當知尊周禮無異於尊公羊。我們只要不陷入於後代經學上古文、今文門戶的偏執，

而從歷史上學術遷變之大勢看，則西漢一朝公羊學大行之後，結果有王莽新朝之「發得周禮」，正猶如北朝經學，因於何休公羊之大行，而結果乃有北齊、北周之周官學；這兩事豈不是後先輝映，如同一轍嗎？既在同一軌轍下，便該有同一的意義。這一種意義，我已在上面指述過，一則尚禮的要求更勝於尚法，一則私家尊嚴仍回到歷史大傳統，如是則周公的周禮必會繼孔子春秋而招惹學者的注意。（關於北朝儒學傳統，及崔浩事蹟背景等，可參讀拙著國史大綱第十七章。）

如我上文所提示，則王通河汾之學，我們也可賦以一新觀點。王通之續詩、續書、模擬孔經，顯然還是當時北方儒學之真傳統。換言之，王通還不失是西漢公羊家精神。在他思想中，他却真想以一人之家言，將來成爲新王之官學的。這在中國學術史上，王通也可謂具此觀念的最後唯一人物了。所以文中子一書，無論其有不少後人僞釋之痕迹，而其書之大體精神與其主要觀點，則決然是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的，而其人則無疑當即是王通。王通也只是當時北學傳統中之殿軍與結穴，也可說在他當時是北學之集大成，而非平地拔起，無端而忽出呀！（關於王通學說及文中子真僞，詳見拙著縱論南北朝隋唐的儒學及文中子中說考兩論文。）

現在我試再綜括而扼要地來重新敘述上面之所說。所謂西漢公羊學精神，應該包括兩要點：一是戰國新興百家言精神，二是古代相傳王官學精神。而把此兩要點聯結起，尊奉一家言，把來

懸爲王官學，這樣便成了孔子春秋爲新王創制立法的公羊學。而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這許多話，也不過想把一切古經籍都歸并到孔子一家言的系統下，來益發增高其地位。若把上述之第一觀點放鬆了，不一定要看重一家言，而重於廣道術，換言之，即是要把歷史大傳統來代替一家之尊嚴，則六經皆是王官學，孔子以上還復有周公，春秋之外儘可有周禮；此則成爲王莽與劉歆新朝一代之所主。此即所謂「廣道術」。就儒學史之演變言，北朝諸儒近莽、歆，而王通則似董仲舒。惟董仲舒尊奉孔子春秋爲一家言，而王通則要模擬孔子自己成爲新起的一家，此爲兩人之所異。

若既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學，把西漢公羊家此兩種精神都放鬆了，此即成爲後起之經學。其實這樣來研究古經籍，則「經學」也只成爲一種「史學」了。這在東漢古文家，已有此趨向，大抵南朝諸儒大體便沿襲這一路。下到唐代，此一派占了經學的上風，於是遂有孔穎達五經正義之編造。孔穎達五經正義中，春秋使用的是左氏傳。當時人眼光中的孔子春秋，殆是一部歷史書。惟其以研究古代歷史的立場看，遂若左傳不僅遠勝於公羊，而且也可說已勝過了春秋。所以劉知幾史通，有感經與申左兩篇，便是站在史學觀點，把左丘明地位超越了孔子之一明顯例證了。

惟其西漢經學，到東漢以後漸漸變成像史學，所以當時人說孔子，便聯想到周公，南北朝儒家，更常見是「周孔」並稱了。到唐代的學校裏，也尊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這正告訴我們，唐代人心中，已不懂古代所謂家學的精神。六經不復是孔子一家言，詩書禮樂都傳自周公，春秋僅占六經之一部，亦屬周公之舊典，而且其書價值可以遠遜於左傳。漢、唐儒意見相異，關鍵正在這上面。再明言之，漢人推崇家言而尊奉一家來定爲王官學，所以特別提高了孔子的地位。唐人用史學眼光來看古經籍，則孔子還是淵源於周公，而且周公德位俱尊，孔子則有德而無位，於是周公爲先聖，而孔子似乎僅該爲先師了。

正因唐代學者不再有古代家學的精神，因此唐人著作，也絕少能列入子部的。章學誠文史通義也看到了這一點，於是他說後代詩文集部便是古代子學變相之遺傳。其實應該說是古代的家學精神衰微了，社會私家不再有自創一家之言來改革當代政教的氣魄與力量，自然會把聰明氣力轉移到詩文集部上面去。古代家言的精神失却了，於是亦遂不見有王官學的理想之要求。若說唐代也有王官學，則仍只如漢宣帝所云，「漢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雜用之」。這一種趨勢，又形成了將來學術界的新觀念。他們常把古六藝稱「經學」，來代表理想的「王道」，把此後的歷史與時變，盡歸成「史學」，而史學則往往只代表着「霸道」。即在貞觀政要裏所載唐太宗與當時與唐

諸賢所討論，已有此種消息之透露。我們也可說，如貞觀政要及唐律、唐六典之類，那是唐代的王官學，而由唐後人觀之，這些書也只是史學，也多臚雜了霸道，不夠得上婉六藝，成爲一種純王之學了！

所以單從學術史立場論，唐代也是古今一大變，所變便在更沒有「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大分野，而代替以「經」、「史」分類的觀點。若我們只用唐後人觀點來推論唐以前學術，則總會搔不着眞痛癢之苦。

七

而且南北朝迄隋唐，中國學術史上又有一新波瀾，此即印度佛學之傳入。佛學只重「教」，不重「治」，若用中國古代道家言來說，佛學只重「內聖」而絕不理「外王」。孔子在漢人觀念中，是內聖而兼外王的，更毋寧是因其具備了外王之道而益證成其內聖之德的。所以孔子在漢代，要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古帝明王並列了。但唐以後的孔子，在人心目中，時時把來和佛陀與老聃並列了。換言之，這是漸漸看重了他的「教」，而看輕了他的「治」。那時的

武、周公各代表着一代之禮樂與制度，而教化則包括在禮樂制度之內了。若孟子則僅是一儒家，不能獨自立一統。但韓愈則在堯、舜以下一線相承之道統中有孔子，而接着有孟子。「六藝」與「儒家」之辨，「王官學」與「百家言」之辨，在韓愈觀念下，此種分別都泯滅了。此因韓愈重「教」不重「治」，他把治道包括於教道，所以在他的一線相承的道統裏，特地舉出孔子來和老聃、佛陀相比論，而在孔子之後又增出一孟子。韓愈此一種道統觀之重要點，其實尙不是重要在開啓他後面的，而更要在轉變了他前面的。（關於韓愈以後之道統觀，詳見拙著宋明理學概說。）

與韓愈同時前後，同樣可以透露出此種對孔子看法轉變的消息的，便有啖助、趙匡與陸淳，他們開始提倡「廢傳解經」的風氣。韓愈贈盧仝詩有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這正即是他們當時對春秋的態度了。

他們爲何要廢傳解經呢？因現在的孔子，逐漸將轉成爲「教主」了。無論如杜預以下，以左傳解經，春秋僅成爲一部歷史，乃至自董仲舒以下，以公羊、穀梁解經，春秋變成了當代的一部政典，到此都不合了時代要求，於是纔要在孔子春秋裏重找新意義，而廢傳解經之風遂爲當時所重視了。但孔子春秋，究竟是一部針對着他當時時代的書，究竟是一部極大涵有政治意味的書，所以說「見之行事，深切而著明」，又說「春秋王者之事」。現在是年逾千禩，時代的變化太大

們也可說他是有意來創寫北宋需要的一部新公羊。晁公武讀書志引常秩說：「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這話也有理由，因說孔子春秋總該說到孔子之褒貶，但若不真明瞭孔子春秋裏面的實事而來空辨孔子之褒貶，其弊必流於深文而鍛鍊。而且春秋既是一部撥亂的書，若在王朝統一、政權奠定之後來講春秋，又總不免會偏重了法而輕了禮。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其時所爭在六藝與諸子，所爭在秦制與古典，但稍後便會引起王吉、貢禹一輩人爭議。孫明復的春秋尊王發微，其書用意本在針對唐末五代藩鎮之割據，與中央政府地位之低落，而有意作糾正。但中央尊嚴既立，則孫氏此等意見也便滋流弊，無怪有如常秩之譏評。所以王荆公三經新義，即不采春秋，而加進了周官。當時人又說，荆公對春秋有「斷爛朝報」之說，此語不論其信否，但依傳講經，既不切時代要求，而要人棄傳窮經，則一千幾百年以前的孔子春秋，實使人看了真不免有「斷爛朝報」之感呀！我們也可說：從孫明復到王荆公，正猶如從漢武帝到新莽，也猶如北朝儒學先由公羊而轉入北周、北齊之周官學，還是同一塗轍，只是轉變得更促更快而已。

荆公新政失敗，於是又轉出伊洛理學來。伊洛興起，那時的學術風氣又變了。他們看重「教」更過於看重「治」。因此他們特別提出小戴記中大學這一篇，也正爲大學明白地主張把

來，這是宋學遞轉遞進之三部曲。這裏告訴我們，經學內容依隨於時代思潮而轉移的具體一例證。再簡單顯白言之，漢儒講經學，是偏重於針對着周、秦以來之王朝政制而講的，現在則是偏重於針對釋、老教義而講經學了。（關於「治統」與「教統」之辨，可參讀拙著政學私言第六篇道統與治統。）

這以後，朱子四書懸為元、明、清三代政府功令取士之標準，但我們却不能說朱子四書即是元、明、清三代之王官學。這裏有一個極大的分辨。因古代所謂之王官學，重在當代之禮樂制度、政府規模上，而四書義則重在「格、致、誠、正」私人修養上。直從程伊川、朱晦翁到明末的劉戡山，他們對當代皇帝進言，都把當朝的一切禮樂制度且攔在一邊，而先談格、致與誠、正。他們且先教皇帝做聖人，暫不想教皇帝當明王。他們認為只有成了聖人纔能當明王，這正如由本以達末，這是宋學與漢學精神上的大差異。那時的孔子，則僅是「至聖先師」而再不是「新王」與「素王」了。周、程、張、朱、陸、王，成為一代大師的，他們都是以新教主姿態，高舉孔子來和老聃、佛陀爭長短，於是董仲舒、王通，終於要在聖學傳統中剔出。而漢、唐以來一切禮樂制度則僅成為「霸道」。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與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代替了西漢公羊學家之「張三世」，而成為宋、明儒理想上達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一條唯一大道。換言之，這都是一種「以教統治」的精神。他們重在發明人類普遍的教義，更重於建立王朝一代的政制了。（關於

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

這是他根據後代人觀念，把創制與立教來分別周、孔之異功，孔子只是一先師，不是一明王。他顯然是韓愈以下人的見解。他又說：

孟子所謂「集大成」，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周公集義、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孔子集伯夷、尹、惠之大成。

章氏也未嘗不知他的說法，實有異於孟子，遂把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謂是集伊尹、夷、惠之大成。其實這一分辨，却決非孟子之本意。即據漢書藝文志，也明明說：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可見漢以前人看孔子，決不把孔子專與伊尹、夷、惠爲比伍，而多把來與堯、舜、文、周作衡量。孔子集伊尹、夷、惠之大成，此一意見，自王荊公三聖人論始。這裏顯可看出古今人意見一絕大不同點。

章氏書又說：

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為說也。表章六藝，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微不信」也。

這裏却露出了章氏書中一個更大的破綻。孔子明明作春秋，如何說孔子有「述」無「作」呢？所以文史通義開首即有易教、書教、詩教、禮教各篇，而獨缺了春秋教。章氏治學，重史又過於重經，春秋教一篇，萬不該不作。大抵章氏遇到這題目，實苦於無從著筆呀！

因此我們可以說：章氏文史通義所論古代學術分野之大體，最多也只得得了一半。而且是辨其細而遺其大，他只知六藝為王官學，但他誤認王官學為必出於在位之王者。他不明白在古人觀念中，聖人著作論「德」不論「位」。故說「春秋天子之事」，那說是無位即不能制作呢？而且孔子之教，又何嘗只是明周公之道以為教呢？我們細讀章氏書，却使我們不能不深進一層來承認古代公羊學之在當時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他們懂得尊進社會新興的私家言，來代替古代傳統

的王官學。他們推尊孔子，正爲孔子能和古聖王一樣地制作。因此他的制作一樣可奉爲後代新王之法度。如是則家言與官學，雖分而不分。這是漢儒論聖學王道之特見精卓處。若章氏也明白得此意，他不會說：

君子苟有志於學，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非空言。

這一番話了。當知經術精微，正可用來改革當代的典章，正可用來滌蕩官司的掌故。而章氏了解這一點，遂說：

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

這就成爲一種顛倒之說了。在西漢董仲舒以前，一切因襲秦舊，那時一樣有典章，一樣有掌故，這些也都是當時的王官學，難道也一切「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嗎？推章氏意，嚴格言之，正會走上秦代「以吏爲師」之一途。所以章氏的「六經皆史」論，好像說中了古代學術的大分野，其實章氏僅知有「王官學」而不知有「百家言」。若就後代學術觀念言，章氏僅僅得史學實事，而

不懂得經學之大義。朱子和陳龍川辨論「王」、「霸」，正爲預防有像章氏這些意見的流弊呀！但朱子却又把漢唐諸儒盡擯於孔門儒學傳統之外了。陳龍川對朱子的辨難，却是防着另一種流弊。章氏學術源本浙東，本接近於陳龍川，但又遠離了朱晦翁。其中得失，則非總攬中國古今全部儒學史，不易得一明白而持平的定論呀！（關於章實齋文史通義之思想，詳見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關於朱子與陳龍川辨論，詳見拙著宋明理學概述。）

10

其次要說到龔定菴。章實齋想把史學來代替當時正盛的經學，但他的史學，也只從尚書直講到左邱明與司馬遷，把孔子春秋放棄了。這是章氏講史學絕大漏洞。龔定菴則承接當時經學家傳統，而且號稱爲是道、咸以後公羊今文學之先驅者，但他的見解，實仍和章實齋一鼻孔出氣。大體說來，龔定菴之持論，實是鈔襲依傍於章實齋。他在乙丙之際著議第六那篇文裏說：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佐王者謂之

以成其爲孔子，則只爲他有此一套哲學或思想，却不問他這一套哲學和思想之在其以前的實際淵源，和在其以後的實際影響。另有人則只是站在世界史和世界哲學史，實際則是站在西洋史和西洋哲學史的立場，來求了解和衡量。如是，我們毋寧可以說：近代中國學術界的態度，與其說較近於漢唐，不如說較近於宋明；而在近代人心中，却又看不起宋明，這就自相違反，不成條貫了。正因近代中國人對孔子評價之意態與途徑有不同，因此研討孔子思想的，也專重了論語，偏忽了春秋。

而且近代中國學術界，又有與康氏另一種相像的想法。似乎他們認爲一切禮樂文物、政法制度之改革，可以全不理會到現實的情況，與夫歷史之傳統。有了「經」，可以沒有「史」。其實章、龔兩氏所看重者，爲其當身之本朝。而康氏以來，及於近代一輩學人之所看重者，則爲我們所接觸之西方。所以我在本文要特地提出章、龔、康三人來特別加以論列，一面我們可以借來和戰國、西漢的學術思想作比較，他們三人都喜歡講戰國與西漢，而實際與戰國、西漢甚不同。一面也可把他們三人來作爲近代我們學術界的一面鏡子看，我們縱不欣賞此三人，但近代我們的學術界，實際則是從此三人移步換影而來，其先後間有一段極親密而緊湊的線索聯繫着，所憾只在我們之不自知而已。

一二

以上我們對於自孟子以下直至近代，就其關於孔子學術思想之了解和衡量，因其對於論語與春秋兩書之偏輕偏重而指陳其轉移遞變之所以然。在上文所提供，使我們對於全部經學史與全部儒學史可以獲得一更高綜合的觀點。現在我們則另有一問題，必然得討論。究竟孔子春秋是不是誠如西漢公羊學家的看法呢？這一層，牽涉到孔子春秋之本身，已不是本篇所應有的內容，但我們不妨即就論語所記孔子平日的說話來作一廣泛而大體的推說。

首先，我們當知這，孔子思想，確是極注重於歷史的。所以說：「好古，敏以求之。」又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而孔子言歷史，似乎有些處注重「王道」更甚於其注重「人道」處。所以孔子常好言三代。他曾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若我們勉強分別孔子論「仁」，爲其論人道之中心，孔子論「禮」，爲其論王道之主腦。則孔子言禮，多半沿襲自周公，而孔子言仁，則爲孔子之獨創。這裏並言夏禮、殷禮，而致惜於杞、宋文獻之不足徵，大概卽爲將來公羊家「存三統」之說之所由。孔子又曾說：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可見孔子對歷史傳統，實富於一種比較觀。夏、殷、周三代的禮樂政教，其本身必有種種之不同，雖論語所記未詳，然孔子於此必時時言之。如是，則孔子所抱的歷史觀，毋寧是與西漢公羊家所說的「三王異統」說較近，而唐韓愈以下至於宋儒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下至孔子的一線相承的「道統」論，却好像轉於論語之明徵。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這一條，實可想像孔子心中，該有繼周之新王，而新王定制，必於前朝有損益。他又說：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所謂「文章」，正指詩書禮樂，正指歷史制度，正與文王之「文」，「郁郁乎文哉」之「文」，「文不在茲乎」之「文」，同一義蘊。而朱子注此條，則說成「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這就不免爲是宋人的見解了。這可證漢以前儒者尊孔子，重王道；唐、宋以下儒者尊孔子，重聖德。於是「性」與「天道」遂爲宋儒所喜言，而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反而在後代成爲不可得而聞。

以上專就論語言，也就可見西漢公羊家言，縱非一是孔子當時口述相傳眞如此，但亦並不能說是全無踪影，都由漢儒憑空所捏造。「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孔子與門弟子當時所講論，決不能一一盡見於論語，而所見於論語中者，如上所引之諸條，即足證西漢公羊家言也自有他們的來歷。如是，則捨棄了春秋，專治論語，決不足以見孔子之學之全，與其所志之眞，也就可以想見了。

耶穌說：「凱撒的事凱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孔子則似乎不太喜歡管上帝的事，所以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孔子偏愛管凱撒的事，所以說：「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我們此刻，並不要如戴望般，專據春秋來講論語，但我們若以論語、孟子來講春秋，則春秋顯然並不盡如杜預、章學誠諸人的想法。春秋還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而儒學傳統，自然也不能盡如宋儒程、朱之所說。漢、唐諸儒，從事實際政治的，自然也是儒學之一支。天下永遠是無道，若我們真要議天下，似乎孔子春秋精神，所謂其深切而著明處，我們還得繼續講。我們必須上承周公，下接孟子，會通漢、宋，纔始能瞭解得孔子論學全部的精神呀！（本文牽涉甚廣，語焉不詳，其中有與以前拙著詳略互見，可資參讀者，隨事略舉如上引。惟鄙文此所陳述，實有爲以前拙著所未盡闡發者。故詳列舊文，亦資讀者之比觀。自謂若循本文所指推尋之，庶可於中國經學史與儒學史之演變，獲得一更高之綜合。至篇中所引故實，其出處來歷，除隨文就見者外，因省篇幅，不再一一詳列之。而獨於作者之私人著作，不厭屢次提及者，此亦古人一家著述，自具一家系統之微意。極知僭妄，亦盼讀者之諒宥。又按：本文宗旨，僅爲闡述孔子作春秋之精神，至於孔子春秋本書之研討，則其事既甚難，亦非本文之所重。有時作學術史研究，其重要不亞於學術著作本身之研究，此亦其一例。《大易》、《春秋》、昔之學者，已有「塵山霧海」之歎。若誤謂本文作者有意提倡何休、杜預、范寧與啖助、趙匡、陸淳諸人奉爲治孔學之宗師，則非作者所敢承。）

周官著作時代考

一 關於祀典……………三二三

第一 論五帝祀之來歷……………三二三

第二 論五帝分祀……………三二八

第三 論帝、昊天上帝和五帝的分異……………三三〇

第四 論郊丘異同……………三三三

第五 論冬至祭及立春祭……………三三七

第六 附論漢以後郊……………三四五

第七 論方澤祭地……………三四九

第八 論朝日夕月……………三五四

第九 論救日食月食……………三五九

第十 論陰陽男女……………三六六

二 關於刑法……………三六九

第一 論法的觀念之成立……………三七〇

第二 論法律公布之制……………三七四

第三 論五刑……………三七八

第四 論五刑以外之流放……………三八七

第五 論什伍相收司連坐之法……………三九一

第六 論作內政寄軍令……………三九七

第七 論入矢金贖罪……………四〇一

三 關於田制……………四〇五

第一 論公田制……………四〇七

第二	論爰田制·····	四二六
第三	論封疆溝洫·····	四三五

四	其他·····	四六二
---	---------	-----

第一	論周官裏的封建·····	四六二
第二	論周官裏的軍制·····	四六六
一	論車乘及卒伍·····	四六六
二	論輿司馬及行司馬·····	四六九
三	論國子與庶子·····	四七一
四	論餘子·····	四七五
五	論軍門稱和·····	四七八
第三	論周官裏的外族·····	四七九
第四	論周官裏的喪葬·····	四八一
第五	論周官裏的音樂·····	四八四

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郊，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

才始會合呂紀與周官而作成一種精密的規定。後人書言古代禮制，多出冥構，愈講愈細，而愈不可據，卽此可舉以爲例矣。

第三 論帝、昊天上帝和五帝的分異

周官言「天」者凡三處：

1. 天官司裘
2. 春官大宗伯
3. 典瑞

言「昊天上帝」者凡兩處：

1. 春官大宗伯
2. 司服

言「上帝」者凡六處：

此一段疏說，包含幾個應分別解決的問題。1「郊」、「丘」之異同。2「受命帝」與「南郊」之區別。此二問題均俟下面再論。惟周官明明說祀五帝亦服大裘，而孫氏爲之說曰：冬祀黑帝，春祀蒼帝，皆服大裘，而夏、秋及中央祀赤、白、黃三帝則被龍袞。其間破綻，只用「經云五帝，渾舉之辭耳」一語掩過。孫氏不悟周官本非史實記載，書中自有衝突，自有破綻。而定要爲之彌縫掩飾，遂至於此。且五帝分祀四時，周官全書中並未提及。周官只說五帝分兆四郊。照理推想，既將五帝兆位分列東西南北四郊，自應於春夏秋冬四時分祀。否則同時兼祀四郊五帝，於情理似欠合。而細玩周官原書，實無五帝四時分祀之跡象可求。無寧謂在周官作者之心意中，五帝實是同時兼祀，轉較近情。如天官冢宰云：

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如秋官大司寇云：

謹祀五帝，則戒之日，蒞誓百官，戒於百族。

此均不似四時分祀也。且春官大宗伯云：

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以天地四方分六色，而黃色屬地。又云：

以六器禮天地四方。

也並不曾把「中央」插入「四方」裏面去。若只就周官原書看，似乎「季夏祀中央黃帝」的說法，在周官成書時，其說尚未完成，因此周官作者亦未及採用。直要到呂不韋著春秋，纔始於四時四郊分祀五帝有一番精詳的規定。周官作者則只說了一句分祀五帝於四郊，而未及把五帝與四郊的方位顏色配列清楚。此僅可謂是周官作者精神有所不及，而一時疎忽了。亦正因其書並非史實記錄，故於兼羅各種素材而加以組織時，終不免有漏洞與裂痕也。

第四 論郊丘異同

其次論「郊」、「丘」異同，此乃引起後來諸儒在禮制上紛然爭論一極複雜的問題。孫詒讓正義卷十一謂：

「相勝」爲轉移，「受命帝」之說，卽源於此。而封禪書又云：「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主運」之說在鄒子四十九篇中。史記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索隱亦云：「主運是鄒子書篇名。」此乃五帝分祀說之來歷，其詳見於呂氏春秋與月令。大體爲在一年內遍祀五帝。春祭蒼帝，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秋祭白帝，冬祭黑帝，還用方色和時景與相配合。東方青色，而春天亦屬青色，因此在春天祀青帝於東郊。南方赤色，而夏天亦屬赤色，因此在夏天祀赤帝於南郊。不問其以何德王，其受命帝係何色帝，均應隨時令而兼祀五帝。亦均應隨時令而逐一分祀五帝，如上云云，周而復始。而且其五行編排的次序，乃主「相生」，不主「相剋」，明不與五德轉移說相同。大概主運這一路說法，或出鄒衍當時手創。故封禪書既謂：「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孟荀列傳又云：「鄒子作主運」也。至於五德終始說五十六篇，或出鄒衍後學之手。故封禪書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而漢書藝文志分列兩書，亦以鄒子四十九篇（內包主運者）在前，而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則列在後。至於謂秦始皇時而齊人奏之者，乃屬終始五十六篇五德轉移之說。故始皇採用之，自以水德代周火德王，而於雍四時分祀青黃赤白四帝，獨缺黑帝。此種祀典，顯與呂覽、月令一年遍祀五帝者絕不同。而且封禪書又明說：

……惟雍四時上帝為尊，……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若月祠。……木禺龍樂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

可見雍四時實乃同時祭祀，並不以春祀青帝、夏祀赤帝為別。又曰：

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可見秦人郊禮也只一次，並不以昊天上帝和受命帝分別為兩祭也。

今周官書雖有五帝祀，但並未說明要四時分祀，一年而遍，即不得認周官所言為與呂覽、月令相同。而周官書亦並未採及五德轉移及受命帝的說法，此一層尤為顯著。則何得妄為附會，強分「昊天」和「上帝」之不同，而謂一是「天」而一是「受命帝」乎？而況秦廷雖採齊人受命帝之說，亦並不見有以天與受命帝劃分為二之迹象和證據。只因鄭玄到孫詒讓此一輩人，誤認周官之書，乃古代一部典禮之實錄，又誤把周官與呂覽、月令及鄒衍後學一派所主張之五德轉移受命而王之終始說，統混為一，認為是同一事之多面，又誤認為其自古已然，在周公時而早已勒為定

而同時又說：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

州長之職說：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此處之所謂「正月」，便是周王正月，以十一月爲歲首的建子之正。此處之所謂「歲終」，便是夏曆十二月，和幽詩裏以十二月爲卒歲之月者正同。故「正歲」便是夏正建寅之月，在周曆已是三月，而在夏曆則爲正月。周官書裏以歲時序事，均先言「正月」，次言「歲終」，再言「正歲」。是在一個朝廷上，而同時行用了兩個正朔，這正和上舉祭天了還祭五帝同樣的滑稽。此豈周公所制？又豈春秋前所有乎？

尚書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歲二月，東巡守」，亦分「正月」、「正歲」，正和周官一例，足見此兩書實是相同時代之作品也。（洪範「五紀」則徑稱「歲、月、日」。）而冬至的圜丘和立春의 南郊祭，則正從「正月」、「正歲」兩種曆法的轉變上引生出歧異來。因冬至恰相當於周曆之

正月，而立春則當夏曆正月也。周人祭天當用冬至，此事儘無可疑。故郊特牲云：

周之始郊日以至。

又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但到戰國晚年，另有一輩學者起來主張用夏曆了。正歲既變，則一歲更始之祭天大禮，自然也會隨而變。這便是立春南郊祭的來源。呂氏十二紀即是主張採用夏曆者，（呂不韋亦曆人，而他的賓客，亦以三晉爲多。）在正月裏便說：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而在仲冬十一月冬至，却別無祭天之禮。此即是把冬至祭移爲立春祭之確證也。此一分歧和轉變，早在春秋時已見其端倪。

左傳襄公七年，魯國孟獻子有云：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而郊特牲却云：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兩處講郊祭用意，顯然不同。馬端臨文獻通考郊社一疏說之云：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其實此種分疏，並非古代之真相。穀梁哀元年記魯郊事云：

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小戴記明堂位亦云：

魯君孟春祀帝於郊。

孟春乃周正子月。可見魯郊本在周正月。而且小戴記雜記篇中又明記孟獻子之說，謂：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更可見魯郊本在正月日至。但因卜牲卜日或有不吉，種種麻煩，而當時的君卿大夫，又常不免嫌了，所以正月日至的郊天大禮，往往展緩移後。孟獻子所謂「啓蟄而郊」，此乃一時有感而發，決不當據爲當時之定制。蓋魯人在是年（襄公七年）以夏四月卜郊，三卜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孟獻子乃本魯人當時習慣，郊祭常在正月至三月。而魯人之懶益甚，這一次又遲遲拖延至四月始卜郊。恰巧三卜不從，孟獻子乃由此會悟到卜筮之有靈，與古人郊天之用意。他說：「郊天本是爲民祈農的，所以至遲也應在耕作之前。四月農作已興，始事卜郊，宜其不從。」這是孟獻子偶然有感而發之言。他說郊祭至遲應在耕作前，而後來却變爲常然的，郊祭恰定在農耕的開始了。

此真所謂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正因周官乃是一部學者理想中之冥構，本非歷史實錄。周官作者，兼採了各種素材，集合拼湊，不免有漏洞，有破綻。一面既改用夏曆，一面又沿襲周正。遂使後來注家，橫生許多猜疑曲解，而郊天大禮，遂爲從此以下一大爭案。此豈周公所制，又豈春秋前所有？然其決非西漢後人偽造，亦可從此而見矣。

第六 附論漢以後郊

漢文帝十五年，有司禮官皆說：「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文帝遂於夏四月幸雍，郊見五時。劉歆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時據十月爲歲首，故言夏郊。」其實漢未改月，（此層王引之有詳辨。）劉說全誤。今考春秋，載魯以四月郊者，有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又十一年、哀公元年，凡五見。故春秋載魯郊，以四月爲最多。（正月郊有宣三、成七，五月郊有定十五，九月郊有成十七，則爲報饗，非祭天。）文帝時諸儒，或竟據此而謂古天子夏郊上帝，則僅見其時稽古之疏而已。至武帝元光二年，始以冬十月幸雍祠五時，此爲歲首行郊禮。其時稽古之業，確比文帝時爲進步。其後元符元年、二年，元鼎四年、五年，皆以冬十月幸雍祠五時。而元

鼎四年十一月冬至立泰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期日夕月，是爲漢人以冬至郊天之始。而其時冬至郊天（泰），轉在歲首郊天（雍五時）之後。其後直至太初元年，一路仍以冬十月祠雍五時，十一月冬至郊泰時。是年（太初元年）改曆，以正月爲歲首。此後天漢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便以歲首，不以冬至。後元元年亦以正月郊泰時。自此以後，甘泉泰一祠常在歲首正月，便似搶代了雍五時的地位。此後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便是循行武帝天漢後故事。五鳳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二年春三月，幸雍，祠五時。三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甘露元年、三年、黃龍元年，皆以春正月幸甘泉，郊泰時。元帝初元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五年三月，幸雍，祠五時。永光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四年三月，幸雍，祠五時。五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建昭元年三月，幸雍，祠五時。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亦仍沿武帝天漢以來故事，於歲首正月郊泰時，而雍五時則與汾陰后土並祠三月也。至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始罷甘泉、汾陰祠，作長安南北郊。明年正月，罷雍五時，以正月郊祠長安南郊，三月祠后土北郊。其議出於匡衡。以下至永始二年冬十一月，又幸雍，祠五時。三年冬十月，盡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四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元延元年三月，幸雍，祠五時。二年正月，幸

周易書中，有「分陰分陽」、「后不省方」諸語，而牽強說成冬、夏兩至，天子不親祭。又謂孟春正月，則爲陰陽會合之期，天子乃親合祀天地於南郊。其爲附會不通，誠屬可笑。然亦從周官書中「冬至郊天」一語上生歧也。故西漢自文帝以來，雖稽古未密，然因循隨俗，轉走上了古人歲首祀天之老路。至王莽、劉歆，考古工深，較諸前人，遙爲精密，而轉覺於事情欠合，乃不得不造出此種種勉強之說耳。今若謂莽、歆僞造周禮，則試問對於以上之種種演變，又將如何解說乎？

歲首郊天，秦、漢既仍沿襲周人舊制，而祈穀一祭，又苦於無著落，重增後人之念惜。秦蕙田五禮通考說之曰：

祈穀之祭，三代以後，不行久矣。西漢五時、秦時，天帝莫分，正祭尚未舉行，何有於祈祭？成帝雖作長安南北郊，旋廢旋復，卒改合祭。後漢正月祭南郊，時用孟春，却是正祭。魏氏相沿。晉武帝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齊王儉所云：「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則究爲祀天之正祭。特以其用正月，故曰「事兼祈穀」耳，實非祈穀也。梁武帝云：「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

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郊社十五引胡氏（宏）說：

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

二氏之論，本極明白。然而周官之書，則實有令人入迷處。春官大司樂云：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原來周官著者，正在陰陽的對偶上玩把戲。一面是「天神」，一面爲「地示」；一在冬至，一

在夏日至；一在地上之圜丘，一在澤中之方丘；一樂六變，一樂八變。如此安排，何等整齊？何等勻稱？然若細究此等思想之來歷，其實乃從莊周齊物論是非生死一切對稱互辨之後，經過後來道家引伸發揮，形成自然哲學之陰陽二元論，然後此種對稱的禮制，才得發生。當其先，上帝乃獨一至尊者，詩書惟稱「天」、「帝」，不見有「天地」對偶相稱之說。後人「天地」並列，則天之尊嚴已失，即此便是自然哲學、唯物主義的論調，即此便是陰陽學派的聲口。陰陽學家正起於戰國晚年，殆自道家哲學成立以後而始有。而周官制禮，顯已採用此等見解，因而來玩此一套天地方圓、陰陽寒暑兩兩相對成偶的把戲。試問此等禮制，何嘗爲周公所定，又何嘗是春秋前所有？

而且周官書中又明說：「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澤祭地」，顯與原來郊社舊規不合。逸周書作雒解有云：「乃建大社于國中」，此所謂「國中」，則決非方澤可知。可見周官書中所謂「夏日方澤祭地」，較之原來社祭，時間和地位，早都變了，而周官著者，却並未在其書中說明方澤之祭之並非社祭，又並未將圜丘方澤的地位分說清楚。此等處又只是周官作者的一時疏失，精神不周到，而因此又引起了後來學者很多的爭執。照理推斷，祭天在南郊，則方澤自應在北郊。於是又生出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之分別。其實則社祭和北郊，北郊和方澤，凡此異同，

本只是紙上空言，無中生有，而後儒偏要據此力爭，辨成北郊之決非方澤，社祭之決非北郊，此正如謂南郊非園丘，祈穀非南郊，同一無聊，同一入迷。其誤正在不知周官一書，乃學者一時理想上之冥構，而並非史實記錄。故其書中，亦終不免有破綻，有罅縫。卽如方澤之祭，周官固並未指明其在北郊，而後人却硬推定其在北郊了。然而北郊之祭服，又該是怎樣的呢？周官書中又忘却規定。春官大司服云：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此處並未說明五帝之爲分祀抑合祀。而後人因周官有分兆五帝於四郊之說，便硬推定爲五帝是分祀四時了。然而夏秋之際，又如何能「服大裘」呢？這豈不成爲笑話嗎？至於祭地之服，周官書中也無明文。鄭玄作注，仍未提到。待賈公彥作疏始說：

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

以理而論，周官書中之「天」、「地」，既居恰相對等的地位，賈疏謂「亦服大裘」，不能說他不合。無奈在實際上，五月夏至，而服大裘，到底不成事體。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始

裘」，可見古禮並不強人所難，定要在夏至叫主祭者亦服大裘。然而依照周官書推斷，則成爲五月也該服大裘了。這一層，又成爲後來諸儒爭論難決之點。結果則使歷代爲主祭人的天子，遂以北郊爲畏途，不願躬親了。（宋代爲祭北郊要否服大裘的爭議，見文獻通考郊社九，此不具引。）古今禮制上的許多糾紛，頗都是這樣地發生著。藉論周禮此一端，亦可推概其餘也。

今若就上舉天地祀典，兩兩對比，却有幾點極相像：

1. 郊祭的變遷，是在天帝下又別增出了五帝。

地祭的變遷，是在社祭上又別增出了地祭。

此一層雖若相反，實是相似。

2. 郊祭有圜丘祭昊天上帝，和南郊祭感生帝之說。

地祭亦有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之說。

此一層，鄭玄把「神州之神」、「崑崙之神」來分別地祭，正和用「感生帝」、「昊天上帝」來解釋天祭一樣。其實禹「九州」外有「大九州」，同爲鄭衍一派學者所主張，而周官書中則似未探及，更何論於周公之定制乎？

3. 上帝和五帝的分別，社和地的分別，同樣有後人爲之造爲深穩之說明。禮記郊特牲疏云：「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則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

這是說明了「上帝」和「五帝」之不同。秦蕙田五禮通考云：

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於地之中，別而爲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達乎上下也。

這是說明了「地」和「社」之不同。此等說法，皆不得謂其無理趣。然若究其實，則周官既非史錄，而後人強自爲之分說，終不免愈說愈歧，而到底無著落處，此亦所謂郢書而燕說也。

第八 論朝日夕月

相當於「天地」者有「日月」。然觀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可見古人對日之尊禮，實遠出尊月之上。而郊祭亦可謂卽是崇祀太

陽了。自從莊周齊物論出世，一輩信仰自然主義的道家後起，到處向自然界尋覓那些相反相成、對等並立的事物，來玩成一套配偶哲學的把戲。然後「地」和「天」偶，「月」與「日」配。那些向來被壓迫的、低級的事物，都昂起頭來向他們尊嚴的上級討求平等的地位。然而古人觀念，則並不如此。有「南郊祭天」，並不會同時即有「北郊祭地」。同樣有「東郊朝日」，亦不一定即有「西郊夕月」。即觀周官書，雖已用了「方澤祭地」來配搭「圜丘祭天」，却也還沒有把「秋分夕月」來配搭「春分朝日」。此亦只可算是周官著者一時疏忽，精神有顧不到處，還待後人之增添了。

天官掌次云：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

春官典瑞云：

王晉大圭，執鎮圭，繹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此均特地說到「朝日」，而無所謂「夕月」也。雖周官書中亦有幾處「日」、「月」並舉者，如

魯語亦云：

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

禮記玉藻篇云：

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而別處的逸禮保傳篇中却云：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管子輕重己篇亦云：

立春祭日，秋分祭月。

而蔡邕獨斷則云：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

一段奏議云：

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夕東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

同時淳于審駁之云：

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按：祭月於坎，祭日於壇，正和方澤祭地，圓丘祭天一例。）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官猶北向朝拜，寧得背實為疑？（文獻通考鄭社十二引）

說禮滑稽至此，真堪令人捧腹噴飯也。

第九 論救日食月食

最可證明古人對日月觀念之變遷者，當推日月食一例。春秋日食三十六，而絕不提及月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魯昭公十七年日食，左氏云：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樂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鼈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一年又日食，左氏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禍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其他月則為災。」

上引三傳論日食各有異同。據左氏，日食並不月月爲災。如莊二十五年、昭十七年所說，則：

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月似無救理。（周官地官鼓人疏）

如昭二十一年所說，則：

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分二至，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尚書古文疏證一）

故在建巳一月，獨有伐鼓救日之禮也。若依照公穀二傳，却不見日食有爲災、不爲災之辨。穀梁只說用牲非禮，鼓社並不算非禮。公羊則認用牲、伐鼓二者均是禮。今於三傳異同，既無從辨其是非。惟春秋日食三十六，而記載鼓、用牲於社者僅三次。（一次在莊公三十年九月，兩次如上舉。）

則似乎伐鼓、用牲，確是非常之事，並不每逢日食，卽照例舉行。至於左氏之所解說，則實有不可信者。蓋左氏之說，專從陰陽消長的理論上，來判斷日食之爲災與否，似已深染戰國晚年陰陽家氣味。此種說法，似乎太學理化了，絕不像春秋時一般人見解。而且春秋所載三次伐鼓、用

牲，兩次在六月，一次在九月。另有幾次在六月日食，而亦並不見伐鼓、用牲者，即左氏亦不譏其爲失禮。（宣十七、咸十六、昭十五、又十七，均六月日食，除昭十七年外，均無傳。）至於用牲一節，何休左氏膏肓曾據春秋感精符及公羊駁左氏。謂「左氏用牲非禮，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鄭氏箴膏肓又加以答辨。（見禮記祭法疏）由今論之，雙方義據，其實都欠精密。三傳對救日食禮之主張不一，正見在當時，本無一種確定的法制儀文，爲一輩諸侯所當普遍奉行。而亦並無一致的社會習俗，到處如此，所以學者乃各以其意爲說耳。亦可於春秋前，對於日食，實竟無有所謂救法也。王充論衡自然篇有云：

上世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惑，不知相繩責也。

抑且日食有久有暫，有甚有不甚。故或有奔走相告，驚詫爲災異譴告者；亦有忽然而過，漫然不加重視者。其須伐鼓、用牲而救與否，亦胥視當時現象而定。古人推曆粗疏，又豈能一一預測臨食之爲況乎？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記日食，亦僅三十六次，亦非一一伐鼓、用牲而救也。下至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劉歆諸人說，乃始一一爲此加上了一種上天譴告的說明。此正時代意見之不同，未可一概而論也。故春秋不載月食，而周官書中又不同。如云：

救日月，則詔王鼓。（地官鼓人）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夏官大僕）

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秋官庭氏）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春官大司樂）

是周官對日食、月食，一樣重視，一樣要救，顯與春秋有歧。賈公彥鼓人疏云：

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

其實在春秋時，當是本無救月食之禮，賈疏亦僅是後人曲說耳。周禮著者，顯然存有一套在他當時流行的陰陽配偶的哲學觀念，日食要救，月食也要救。正如祭天了，定必要祭地，此都是那陰陽兩兩相對的一套玩意兒在作祟。此等全出莊生齊物論之後，又何嘗是春秋時所有？更何嘗是周公之所定乎？

孫詒讓以周禮爲周初之制，左氏所說乃後王所改。（正義卷二十三）此乃拘信舊說，誤認周官眞屬周公制作。而日人林泰輔據此點，證周官應在春秋前，（見林氏周公與其時代一書後附錄周官制作時代考。）

又引詩小雅十月之交一篇爲說，謂周官應在小雅、春秋之間。今按：詩小雅十月之交，乃詩書中記春秋以前日食僅有之一處。（古文尙書胤征不可信。）詩云：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是詩中明說月食維常，不足爲異，日食始是災異之兆，必有所不臧而引起。故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乃謂月應有虧蔽（微），日又如何亦有虧蔽呢？此仍與春秋記日食、不記月食抱同一之見解者。林氏謂十月之交一詩，初以日食而次及月食之俱爲可哀，是誤解詩意也。至於「日月告凶」一語，以「日月」二字連文，正如左氏傳莊二十五年云：「非日月之眚不鼓」，亦「日月」連舉，然不能卽認爲古人亦救月食也。林氏乃謂十月之交是日月雙方並舉的，周官始附以輕重，而至春秋則把月食全除外了，足徵春秋思想最在後，而周官爲其中間之過渡。其實則春秋還與小雅相近，周官明屬最後。小戴禮昏義篇云：

陽，德惠有陰陽，一切政事法令莫不有陰陽。事事物物，均屬陰陽之兩面。故日名「太陽」，月呼「太陰」，餘可類推。於是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此等思想，自當發生在戰國晚年陰陽學盛行之後，此殊無可疑者。

周官書中，除掉顯見的「陰陽」字面外，其運用陰陽配偶化的論調和色彩，又處處可見。尤著者，如：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徒）

此與天官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云云，竟是中庸、樂記一路文字，是又豈春秋以前之所能有乎？

周官著者，正爲處處要採用當時最時髦的陰陽配偶化的一套哲學來表現在他理想的政制中，所以三百六十官中，乃居然有好許的女官。如天官裏的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春官裏的世婦、內宗、外宗，再如地官膳人下的女膳，稟人下的女稟，春官守祧下的女祧之類，此誠不可不說是一種嶄新的禮制。依此見解，未始不可爲近代婦女參政開先聲。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和農、圃、虞、牧、工、賈並列，也是特地提高了女子地位，可說是提倡女子職業

的前驅。而周官書中，涉及一般夫婦關係，也頗帶一些新鮮的活氣。如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都主張男女相親。較之春秋時代男女有別的禮教，鼓吹像魯敬姜、宋伯姬之謹嚴拘閼者，確有不同。林泰輔氏又據此，以爲亦周官出春秋以前之一證。據今論之，亦無寧謂是周官著者，染受了當時陰陽學派的思想，把宇宙事物都看成一對一對地，涵有莊生「齊物」精神。所以對男女關係的觀念，也比較看得平等些，而連帶也看得親和些。與其說之爲在春秋之前，不如說之爲在戰國之晚世之尤爲允愜也。

根據上述，證周官書出戰國晚世，當在道家思想轉成陰陽學派之後；而或者尚在呂不韋賓客著書之前，故周官書中並未採及五帝四時分祀之說。及秦帝而齊人始奏鄒子之徒所爲五德終始之說，周官著者似亦不及見，故「受命帝」等諸說，書中亦未有。此可以定周官成書之準確年代矣。

二 關於刑法

周官乃一部講政制的書，然其書中一切制度，是否爲西周初年周公所訂，昔人早多懷疑。上

爲是「法」也。今據叔向諫書，卽知當時政治意識中尙未有「法」的觀念之存在。若謂叔向諫書係出後人僞撰，則更足證明「法」的觀念，直到後人僞撰叔向諫書時還未成熟也。

自子產鑄刑書後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九年，晉國又鑄刑鼎。左傳云：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此下載有仲尼、蔡墨兩人之批評，却都提到「法」字。仲尼云：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蔡墨云：

……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

此之所記，是否保存仲尼、蔡墨兩人當時說話真象，已有可疑。試檢論語，孔子僅云：「爲政以

喜。然而平民之在當時，早已逐漸昂起頭來，使貴族階級感到制裁他們之不易。因使一輩明白有識見之貴族，雖不願給他們以一種地位，而到底不得不針對形勢，制定出一種制裁他們的刑律。此乃在時代轉換中一種帶有強迫性的形勢要求，而刑書、刑鼎遂接踵地在鄭國、晉國出現。而周官所謂「縣法使萬民觀」之制度，則其事斷當尚在後。大抵此等事態，其興起應尚在魏國李悝之後也。

呂氏春秋云：

吳起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置表於南門外。令曰：「有債南門外表者仕長大夫。」莫有債表者，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債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

韓非子書中亦有「吳起令民徙車轅、赤菽」事，與此大同。不久而遂有商鞅徙木立信之故事。吳起、商鞅皆屬有名之法家。彼兩人均在魏國，應皆得聞李悝之遺教者。至於周官之「縣法象魏，使萬民觀」，此正近似吳起、商鞅城門置令之辦法，而特重加以學者間之一番理想化。此豈周公之所制，又豈春秋前之所有乎？

周官除上舉諸條外，說及聚官吏、民衆讀法者，有如下之諸官：

- | | | | |
|----------------|-----------------|---------------|--------------|
| 1. <u>天官小宰</u> | 2. <u>地官小司徒</u> | 3. <u>鄉大夫</u> | 4. <u>州長</u> |
| 5. <u>黨正</u> | 6. <u>族師</u> | 7. <u>閭胥</u> | |

說及布憲刑禁者，有如下之諸官：

- | | | | | |
|----------------|-----------------|----------------|----------------|-----------------|
| 1. <u>天官小宰</u> | 2. <u>宰夫</u> | 3. <u>宮正</u> | 4. <u>內宰</u> | 5. <u>地官鄉師</u> |
| 6. <u>鄉大夫</u> | 7. <u>司市</u> | 8. <u>胥師</u> | 9. <u>司競</u> | 10. <u>夏官大僕</u> |
| 11. <u>牧師</u> | 12. <u>職方氏</u> | 13. <u>訓方氏</u> | 14. <u>山師</u> | 15. <u>川師</u> |
| 16. <u>擇人</u> | 17. <u>秋官士師</u> | 18. <u>布憲</u> | 19. <u>司烜氏</u> | |

此外雖無明文，而可以例推者，尙不在少數。大抵通觀周官全書，三百六十官，殆無一官無法制，亦殆無一官無禁令。而此等法制禁令，又惟恐其在下者之不知。於是必逐時逐年，竭力用意於向下宣布與申述。此等情況，則正合於老子之所謂「法令滋彰」之一語。然而法令雖所以制裁其下，而亦無異於在法令上即給與其在下者以一種顯明和堅定的地位，法令以外，變詐多端，將

文面之重要部分有二。一爲額。後漢書朱穆傳注云：

黥首，謂鑿額涅墨也。

國策秦策高誘注云：

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

刻額又稱「雕題」。禮記王制篇云：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其實東南兩方民族，其風尚則有文身、雕題，而文身之與雕題，此兩事殆難嚴格劃分。中原諸夏呼南方民族爲黎，恐亦取義於「務面」之「務」。務者，務割。老人稱「黎老」，面皮繃裂，亦如務割也。

文面除額外，其重要部分尚有鼻。廉稽云：「越俗剡墨」，此所謂「剡」，正是繡鼻，乃文面中一種重要工作也。文面又常連帶着剪髮。劉向列女傳云：

此皆倒因爲果，甚不足信。又考逸周書伊尹朝獻有云：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叔巳，闢耳，貫胸，雕題，離身，漆齒。

此所謂「正西崑崙」云云，其實亦與南方民族有關。史記五帝紀：「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尚書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則古人所謂西南兩域，亦常混近。「崑崙」兩字，後人習用，亦以指南方民族。舊唐書南蠻傳：「林邑以南，卷髮黑身，通號崑崙。」是也。則周官鄭注所謂「東西夷」，實亦指南方熱帶水地民族而言可知。

至於黥墨之風，傳至中國，而變成爲一種刑罰，其事當在南方越民族與中原交通頻繁之後。最早應在春秋之末期。越民族最先來中原，應多至齊、魯諸邦。其人於文化經濟皆較落後，故於諸夏間多操賤役。周官大司寇之司隸，「掌帥四翟之隸」，殆即是此等外夷民族留在諸夏之榜樣也。鄭司農司厲注云：

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

故當時諸夏間因犯罪而罰爲奴婢服賤役者，亦令其模倣外夷，施以黥髡之罪，是卽所謂墨刑也。

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見魏志毛玠傳引）

史記載趙王張敖賓客，皆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之長安。可證漢初家奴，仍都髡黥，此實承襲戰國風習也。而春秋時人則並不然。呂氏春秋開春論有云：

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黥。

高誘注，「腰，繫也。」左傳襄二十三年有云：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則似其時爲奴隸者，僅是收繫而登其名於奴籍，並不施以黥髡也。故其實尙無所謂墨罪。黥墨罪之開始，當在春秋末期，或尙在春秋以後。魯國墨子及其墨徒，所以稱爲「墨」者，正取黥墨之義。（「墨」非姓，乃刑徒之號，論詳證余諸子繫年卷二。）可證其時中夏社會間已有「墨」稱，而此等稱

呼尚仍新鮮，惹人興趣，故以名一學派也。漢書刑法志云：「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其時秦刑中始有鑿顛，此乃商鞅從東方攜入之一種新鮮的刑名也。秦孝公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均曾受黥劓之罰。此乃商鞅自我作古，遂以招致秦人極端之厭惡與反抗。而今周官「五刑」，墨爲第一，此豈誠周公之所制？又豈爲春秋前之所常有乎？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漢書五行志云：「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則其事亦決非自古皆然。而今周官掌戮乃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若定爲一制度。大概以刑人爲奴隸，其事至戰國時而更普遍，故周官著者遂無意中作爲一種制度寫出之。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以此較之周官，殆遠爲近古矣。今考五刑種類，亦有異說。國語魯語中亦有所謂「五刑」。其言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竿。薄刑用鞭朴。」此與周官「五刑」不同。周官書中，又另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之別，亦稱爲「五刑」。則五刑之說，即在周官書中，其內容亦尚未固定。大概五行學說既起，乃始有五刑之編配。所謂「墨、劓、剕、宮、大辟」，則僅是當時人有意編成五刑之說中之一種耳。後來此說獨佔優勢，而五刑之解說遂臻固定。五行大義引逸周

書逸文云：「因五行相剋而作五刑」，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並引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此雖後起之說，然不失爲古代五刑說之真確來源也。既五行學說盛起於孟子之後，則周官中之五刑說，其年代亦自可推定耳。

第四 論五刑以外之流放

五刑中之墨刑，本非春秋前所有，上文已論過。亦有春秋前極通行之刑名，而五刑中轉不再見者。輕刑如割耳，重刑如流放皆是。尙書康誥云：「劓刵人」，呂刑亦言：「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刵」是割耳之刑。詩泂水：「在泂獻馘」，左傳：「師緡示之俘馘。」（僖二十二年。）「馘」同是割耳。戰勝獲敵，截其左耳爲馘。刑罰之起源，其中一部分，本屬對付敵人俘虜。古者「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劓刵之刑，大抵亦僅施行於小民。至於卿大夫貴族犯罪，則別有一種懲戒之法，最著者爲幽囚和流放。周官大司馬有云：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暴內陵外則壇之。

下至戰國便不然。當時僅知「法自貴者始」，更不言「刑不上大夫」。大夫既可用刑，（以後竟至具五刑。）自無需再流放。且其時貴族階級已次崩潰，遊仕得勢，朝秦暮楚。「言不聽，諫不從，則去。」國君亦只能「極之於其所往」而止，若加以流放，豈非正使得其所？故周官天官大宰所掌「建邦六典」：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又曰：

以八法治官府，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又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祿、予、置、生、奪、廢、誅。

春官內史亦云：

掌王之八柄，曰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階級，亦非一起始便知所謂革命，便能作種種大規模之反抗者。當春秋世，社會不安，常見有所謂盜賊之記載。而其事已起於春秋之中晚。鄭子產死，子太叔爲政，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事在魯昭公二十年，此爲鄭國之盜患。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使晉，亦云晉國盜賊公行，此乃晉國之盜患。襄公二十一年，左傳載魯多盜；論語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孔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曰：「子爲政，焉用殺？」此乃魯國之盜患。循至戰國初年，大概盜賊已確然成爲政治家一種注意之對象。李悝著法經，其主要對象便爲盜賊。其網捕兩篇，用意專在盜賊之効捕。故曰：「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此誠戰國時代人理論也。一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實不見有所謂「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之景況。其後商鞅入秦變法，大體承李悝法經。史記商鞅傳云：

衛執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此處之所謂「姦」，大體即相當於李悝法經之所謂「盜賊」也。盜賊即作姦之人，姦行乃盜賊所作爲之事。「收司」者，索隱本作「牧司」，乃相監察之謂。（詳王氏讀書雜誌。）「令民爲什伍，相牧

司連坐」，大概亦是李悝遺法。用此種方法捕盜，正如用網捕禽獸般，可使無脫漏。故史記又云商鞅變法後：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足證商鞅新法，正是李悝「網捕」精神也。「網捕」之主要對象爲盜賊。其最著之成效，便爲「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其後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故知李悝「網捕」精神，眞可使盜賊無處躲藏也。

管子禁藏篇有對此制度一種最好之陳述，其言曰：

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此卽稱頌「網捕」精神也。李悝「網捕」法之發明及其應用，其主要對象，起於盜賊之難治。盜

賊難治，起於平民階級漸漸活動，對於貴族統治階級，試行反抗和搗亂。遷徙奔亡，則是當時反抗和搗亂之最普通的手段也。此種情形，大概起於春秋之中晚，下及戰國初年而大盛。而今周官書中，却載有和李悝「網捕」、商鞅連相坐同性質之制度。地官大司徒云：

令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族師下云：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

比長下云：

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則相及。

鄰長下云：

掌相糾相受。

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此數項乃與上文「相保」、「相受」精神絕然不同。此乃周官作者又兼採了孟子書中「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語，而配搭成此條文也。彼不悟前兩項「相保」、「相受」，乃人民對政府所負一種必然性的聯帶的責任。後四項，「相葬」、「相救」、「相調」、「相賓」，乃人民相互間在經濟上一種可能而偶有之自由，如何可并為一談？此又是周官作者湊合兩種不同性質之素材，加以組織，而一時疏忽，發生罅漏。正在此等罅漏中，即是周官成書時代之一種正確報告。至於前引管子禁藏篇語，自然也當在戰國之晚年。其實到此時，李悝「網捕」、商鞅什伍之制度，亦復失其效用。盜賊之多，遷徙奔亡之盛，平民社會之活動，仍是有增無減。故老子乃慨然而歎，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盜賊既無法網捕，於是老子乃遊神於其「小國寡民，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老死不相往來」之幻想中。老子之與周官，蓋同是戰國晚年作品，而老子誠「深遠」矣。後人誤信周官乃周公之制作，則老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洵為確切有據矣。

幼、癘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此一節，把一國之財政、軍事、教育、刑法一切政令，全在一個精神下統一起來。全國凝結成一個有機體，於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後面，再為補上一種為民制產、修其孝弟的儒家精神。則無怪後人要樂於承認周官為真是周公致太平之書矣。其實只專就寄軍令於內政之一節而論之，便知

今試據姚氏說再爲疏說，竊謂這裏有首先當分別者，一是土地制度，另一則是賦稅制度。若專就土地制度言，則只有「貢」與「助」兩種，其主要有公田與無公田。若兼就賦稅制度言，則可有「貢」、「助」、「徹」三種。魯自宣公時，履畝而稅，便已廢公田了，只就各家私田而徹取其十一之稅，那就是「徹法」了。如此說之，則有若「盍徹乎」一語，涵義便十分顯明了。如此說之，則「貢法」之起應猶在後。因當時貴族地主，既不願逐年麻煩，按照田畝實際收穫來徹取十一，於是規定出一常數，不管年歲豐歉，只照此常數徵收，這便成爲「貢法」了。若如此說之，則孟子文義與歷史事實皆說得通。所剩下者，只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此一番話，把兩種土地制度與三種賦稅制度硬分派到夏、殷、周三代，又分別出五十畝、七十畝與百畝之異，則似乎斷非歷史事實。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正當如此看法。若我們因一時講不清孟子話，遂謂孟子當時只是信口開河，隨意造謠，則實斷斷無此理也。

今再進一步看龍子、孟子意見，則兩人顯有不同。龍子似乎只看到當時貴族們之重斂倍克，痛心疾首，想要恢復古代已廢公田爲助之舊制。而並未顧及古制之所以廢，在當時已因具有了流弊而乃至於不能維持了。孟子雖贊成龍子，他却提出一種較爲折衷的辦法來。他說：

家只把來賞給卿大夫貴人們，讓其自去徵收他們什一之稅，作爲國家支給的俸祿。將來受田的人換了，那有田的農人還是不換。正和野人之「受一廛而爲氓」者恰相反。因爲野人受田，儘可逐年換，而田主却依舊。此其在土地之權位，大是不同。因此孟子並不想把「莫善於」的助法來一致地推行。

以上講述孟子書中所載兩種田制和三種稅法，他話雖不能說全可信，然也不能因此疑他所說全是造謊，全在託古改制。若必先存了一疑心，謂古人全在造謠假託，則一切古書，也就無從再研究。以上從孟子話，來推論古代田制之大概，可謂雖不中亦不遠。

若上引孟子一節話，誠可作如是之解釋，試再來看周官，則似乎周官書中，已全沒有保留公田之舊制。

江永周禮疑義舉要論此事有云：

小司徒惟言「九夫爲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爲公爲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欽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欽法。如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

知此處所謂「興」，正當於李悝之所謂「發」與「糶」。周官旅師下又云：

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

此亦與上引同意。孟子亦曾言之，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似乎孟子亦知李悝當時理論，但並未爲之詳細發揮。孟子只鼓吹他自己的「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想法。周官既採李悝歛散之法，則於孟子所謂「莫善於」之「助」，「莫不善」之「貢」，以及所謂周人之「徹」，自均可置放一邊，不成問題。故周官書中則只有「貢」有「賦」而並無「助」與「徹」也。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三十一有云：

歛法謂賦歛之正供，卽周之徹法也。

孫氏此說，與上引姚文田說同。其他清儒如江永輩，似乎均取此同一之意見。然此意見，實不可信。管子大匡篇有云：

素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

孟子公孫丑篇：「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又滕文公篇：「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廛而爲氓。』」呂氏春秋高義篇：「墨子願至越，自比寶萌。」凡新阡皆在野受田，其地位自和國中百姓不同。旅師治新阡，雖云「使無征役」以爲招徠，而待遇實遠不如國中之百姓。鄭注却謂：

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

此乃未能細密劃清歷史上之時代演變，而空推聖人用意以爲說，則宜其多誤矣。

第二 論爰田制

田制初興，應屬附有「公田」之「助法」。每一組耕戶各有他們應該擔負的一塊公田。家數可以有多少，公田可以有大小；不一定全是「八家同井，井九百畝，公田百畝」那麼樣呆板。所謂「八家同井，井九百畝，公田百畝」者，只是公田制裏一個理想上最整齊的模式，實際不必全如此。此種田制之主要精神，則在公田之與助。此一層上面已討論過。故公田助法廢，即無異於

徙遠去，投奔新主人。孟子亦云：

死徙無出鄉。

趙岐注：

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此為耕戶三年一易居，僅求其不致為對他們故主之痛心疾首而遷移遠去。如是則使地主對其治下耕戶所施種種政教易於收功也。

然而三年爰土易居，總是件麻煩事。無論田廬改易，紛擾已甚，而且也不一定真能有嚴密的分配。先耕上地者，未必定易到下田；先耕次地者，未必定換到上田。然而地主們肯給農民三年一易居換土之機會，總算是好意。若改行爰田制，受上田者百畝，受中田者二百畝，受下田者三百畝。苦樂既均，又免易居紛擾，自然更受耕戶之歡迎矣。晉國在當時，國君被虜，國中無主，一輩朝臣纔想出此法，討好國民。那時晉國國民感激圖報，不憚征繕的心理，自不必說。商鞅將此制推行於秦。其後秦人招徠三晉墾民，遂以東雄諸侯，此亦事所應有。惟此制推行，則八家同

抑又有疑者，爰田制殆非晉國所首創。當其國破君虜，子金自秦脫歸，臨時推行爰田，結懽國人，實在不像是精心創設了一個新制度。或當時別國早有推行，而晉人特臨時模倣爲之。考齊風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田甫田，維莠桀桀。

舊說其詩刺襄公。若其說而信，此詩年代，應在晉行爰田前四十多年。而其時在齊似乎已有多授大田之制，惟當時人尙未懂得歲休更種之法，故詩人以「維莠騶騶」、「維莠桀桀」爲戒。或者遇次田則多授，其制已先有。而晉人之行爰田，亦非卽是開始指導農民以一種新的歲休更種的輪耕法。在當時之所謂爰田，則僅是一種更寬大的授田制度而已。本來授田百畝者，現在可以因地之高下而增授至二百畝或三百畝。如此，則得上地者無奪，得中地、下地者有與。本來三年一易地者，現在可以永不紛更。如此則耕者皆得有其永業，故爲國人所喜。至於歲休更種，此是耕墾技術之進步，與土地制度無涉。惟自爰田制推行，此種歲休輪耕法，自然易於爲人發現，爲人傳播。而此種歲休輪耕法，究起何時，則不可考。今若專以歲休輪耕法說爰田，恐未是也。

要之均等授地，公田爲助，乃一種較先的制度；而分等授地，自爰其處，爲一種較後的制

此亦是一種爰田制也。大概爰田制亦並不定分百畝、二百畝、三百畝三等，在數字上亦容有出入。竊疑此制或亦與李悝有關。晉人本行爰田，戰國初魏國亦行爰田，蓋是採取晉國舊制。商鞅變法，多承李悝遺教，遂又移行此法於秦。鞅之制轅田，實卽是廢井田也。惜乎後人不能把此兩種制度之異同，詳爲剖悉，遂使商鞅變法之來源及其真相，茫昧莫明。至於周官著者，講刑制，多採李悝、商鞅，上節已述及，而講田制又如此。故在周官書中，乃惟見有後起之爰田制，更不見先行的公田制。則周官之爲戰國晚出書，更復何疑乎？

然而周官之小司徒又云：

九夫爲井。

不悟既行爰田制，則一夫不一定是百畝，一井又不一定是九夫。周官小司徒又云：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大司馬又云：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王制亦同此說。此與呂氏春秋上農之言相似，惟分說之益細耳。周官著者，似乎誤會了此種意思，却把經濟上一種自然的現象，來寫定在政治上成爲一種必然的制度，於是又引起後儒許多爭辨。至於地官小司徒之「三年大比」，又顯然保存舊制，與商君制轅田，「令民有常制」，與夫「靜生民之業」者復不同，此皆其牴牾之痕迹之不可掩者也。

第三 論封疆溝洫

公田之廢，爰田之推行，固是井田制崩壞之原因，然而尙不止此。井田制之主要精神，本維繫在封建制度上。西周王室之初行封建，其懿親功臣，隨其天子之勢力，而封殖到東方來。一如棋枰布子般，先是東一子，西一子，稀疏歷落，依着局面之緊要處，而絡繹地散開。本不曾如孟子、周官、王制許多書中所說，有那樣像方格塊般的嚴密、緊湊和整齊。那些分封出去的諸侯，初到他們分地，首先是要劃疆自保。一部分隨從而去的宗族黨徒，緊簇在侯國之四圍。而本地一

些服從歸化之土著，則屏在較遠之郊野。故每一侯國則建立起一城郭。待其漸次擴張，一如周室之分封，來封殖他們的子弟宗親。一樣地稀疏歷落，散布在侯國之境內或伸展到新闢的領土去，仍然是築城郭，起封疆，來保護他們一份世襲罔替的產業。其治下子民，則在其封疆之內各爲其主盡他們耕墾貢賦的責任，而生息着。亦還各自有其「邑」、「里」、「鄉」、「社」。此等邑、里、鄉、社，亦復各有封疆，各自分散，不必東阡西陌，緊相湊簇。正如一盤棋子，初下時，東一子，西一子，並不怎樣地鬬湊。以後便不然了，棋愈下愈密，糾紛便起。侯國與侯國間，壤地接觸，并兼繁興。卿大夫之采邑，同樣因互相鄰接而發生交涉。列國之間之所謂正疆界，列卿之間之所謂爭田地，屢見於春秋之記載。以前是劃疆自保，以後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封疆之削，何國蔑有？」封建局面，展衍在數百年之間，實有其極大之變動。

井田本是一種圍在格子眼裏的東西，亦復稀疏歷落，一區區地分隔存在。以後人口愈增，土地愈闢，所謂格子線，根本不能存在，那格子眼裏的東西，如何能保持原態？此乃井田制崩壞之最大原因，同樣隨着數百年來之自然衍變而改動。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介子推事，有云：

稿，則恐不可信。

封疆既爲井田與封建之同一要徵，因此，廢井田，開封疆，亦如等於廢封建。所以商君入秦變法，在其「爲田開阡陌封疆」之前，先「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此卽是把國內封君采地，一并收爲國有，是卽廢封建也。廢封建之代替物，便是所謂「二十級爵」。馬端臨文獻通考封建六論之曰：

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祿邑。若秦法，則惟徹侯有地，關內侯則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始皇遣王翦擊楚，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然則秦雖有徹侯之爵，而受封者蓋少。考之於史，惟商鞅封商於，魏冉封穰侯，范雎封應侯，呂不韋封文信侯，嫪毐封長信侯，……然鞅、冉、不韋、毐皆身坐誅廢。范雎雖幸善終，而亦未聞傳世。……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其實秦之廢封建，行郡縣，大體亦是商鞅先創之。史記所謂「賦稅平」，朱子釋還未盡。在封建時，各區封略中之人民，受各個封君之支配，則賦稅如何得平？今改行縣制，縣令直接朝廷，受

同一制度之支配，則賦稅自然平。農民在同一國內，受同一待遇，自然也不想遷徙。（除非要出國。）

故蔡澤云：「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也。」此乃商君變法之大概。

孟子云：「世祿，滕固行之矣。」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惟世祿之家，既有權自賦其民，試問又如何能命其必賦什一乎？此乃孟子不如商鞅處。然孟子對於封疆，似亦不主保留。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蓋是時東方諸侯，田畝日闢，人烟相望，早已無所謂封疆，所以孟子亦復如此說之。而當時各國仍都努力建造他們國境上的長城，如齊、趙、韓、魏多有，此仍是古代封疆之變相也。直至秦始皇造萬里長城，亦仍是沿襲着封疆的古觀念。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十一「長城」條有云：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為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

祿秩。

淮南子亦云：

吳起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

呂氏春秋曰：

吳起令楚貴人往實廣虛之地。

合三說而觀之，吳起亦承李悝遺教，主張破封建，盡地力。商鞅則又承李悝、吳起遺法而推行之於秦國。結果，吳起、商鞅均遭秦、楚封君貴族之怒，而致殺身。殆以封建餘勢，在中原諸侯間，早已崩潰，而在秦、楚邊國，比較保留尚多。所以李悝並不爲人注意，而吳起、商鞅却轟動一時，既得名，又得禍。然後世治史者，却連他們當時事業也全模糊了，因後世更無古代封建遺迹可見也。

上述井田、封建關係，以及當時封疆之大概，再試轉讀周官，則有甚可怪者。蓋周官作者，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若有山川，則因之。（同上）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司險）

……（掌疆）（缺）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形方氏）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原師）

此皆地官、夏官兩篇所載，從此還可推見古代封疆之面影，證明如上文所謂之格子線之大概。在那一帶土封格子線之上，還栽種許多樹木，好讓隄封堅固。竊疑此與「社樹」或有關。一國之四封，比較宜栽某種樹，其封域內之居民，亦奉某種樹為社神，而特地崇敬之。封建「建」字，本訓樹立。楚屈建即令尹子木，（左襄二十五年傳）楚太子建亦字子木，（左哀十六年傳）則古人言「建」，正訓立木。在高的堤封上，種立一排樹木，即以表明此封內田地之有所屬，是即所謂「封建」也。游牧部落分隊之標幟用旗，故名「族」。族，从於，从矢。農耕部落分土之標幟用樹，故名「社」。社，古文从土，从木。封建制度是農耕部落之事。農耕部落之有社，正如游牧部落之有

族。族相當於近人之所謂「圖騰」，而社則是圖騰之變相和進化。墨子曰：

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位。

「叢位」即是社。社又是封建時代計地之一個單位。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有云：「齊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仲尼篇作「書社三百」。管子小稱篇有云：「衛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呂覽知接篇作「書社四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哀公十五年有云：「齊與衛書社五百。」史記孔子世家有云：「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此恐當作「書社七百」，其下冉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可知當時自以「社」計，不以「里」計也。呂氏春秋高義篇亦云：「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下至戰國，郡縣之名漸盛，書社之稱却絕。可見「社」正是封建時代特有之名稱。擴而大之，至於建邦國，建都邑，亦如建社般，一樣是封土圈地，只是工程和規模則比較大了。此種情形，只在遼闊的大地上，如弈棋似的，疏疏落落下子，才有可能。一到人口稠密，壤地促狹，便無需乎封建，亦不容其封建。今周官書中，既已全是後世繁密景象，而仍還裝上古代荒疏規模，此又不得不謂是其書一大罅漏也。

左傳子產云：

滄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這是何等寬大整齊、平正通達的景象？試問照此景象，又那裏裝上許多地域溝池封疆之界？溝樹封疆，乃是早期小國寡民之所有。而千夫、萬夫，則是後來地闢民稠之景象。待到千夫、萬夫時，那些溝樹封疆，早已消失。而周官作者，却硬要把小國寡民時代的溝樹封疆，裝點到後世「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之情況中來，這又如何裝點得上？而且「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乃是孟子時齊國氣象。所以孟子還說：「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可見齊以外未必盡如此。若不加一番闢草萊、徠遠氓的工夫，便不能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又那裏有周官遂人所記那種千夫、萬夫平正通達、整齊寬大的規模？可見周官作者究竟是生得晚了，所見早是「開阡陌封疆」後之狀態。乃又從而加上一番想像中阡陌封疆之描寫，把疏的規模，來裝在密的現實上，遂成這樣大塊整齊的田制。此何嘗是周公所制，亦何嘗是春秋前所有？而且餘夫受田，又在何處？不成遠遠的隔在千夫、萬夫之外？周官作者，只圖在文字上寫得整齊好看，不問事實牴牾，往往如此。

周官中尚有和遂人五溝五涂之描寫相似者，厥爲考工記匠人溝洫之制。其文曰：

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照此算法，方百里之地九萬井，除開溝洫，所占面積只贖四千九十六井實田，可出租稅。今試回看漢書食貨志所引李悝盡地力之教有云：

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

刑法志亦云：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此所除者乃是山澤邑居，而鄭氏周官注所除，則是田之溝洫。依李法三分去一，僅餘六百萬畝，而方百里已是一公侯之國；即依周官說之，也已是一個男國。無論如何，一男國中，決不能沒有園囿術路，決不能沒有山川沈斥，更不能沒有城池邑居。而且那些又不能集在一處，定會不規則地分佔各處的地面。則試問在此上又如何再容考工匠人之「溝洫」？若照鄭氏算法，一同萬井。那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的，他們的里、廛、邑、屋，又在何處安放？他們的君子卿大夫統治者的城、郭、都、國，又在何處建立？其勢不能沒有了耕種者及其社會，而只有所耕種的田畝之理。若說鄭氏所除亦係山澤城邑等，則據孫詒讓正義卷八十五所計算，謂：

凡五溝積數，每井有一溝、三遂；每成有一洫、八溝、百九十二遂；每同有一澮、八洫、四千九十六溝、九萬八千三百四遂。其五涂則徑與遂同，畛與溝同，涂與洫同，道與澮同。

試問那些名目，要不要佔去面積？而且徑、畛以通車徒，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溝洫之廣與之相稱。則鄭氏算法所除，又確爲溝洫明甚。這又何法可通？

黃以周禮書通故第三十五駁鄭說，謂：

如鄭義，經宜曰「井間謂之溝，甸間謂之洫」矣。司馬法云：「通十為成，成百井；十成為終，終千井；十終為同，同萬井」；漢志文同。如鄭義，成實六十四井，無百井；同實四都，無萬井矣。竊謂一成百井，內容甸六十四井，其沿邊十里為隰臯，所謂牧也。

如黃說，鄭氏除溝洫為算，實是錯了；然黃氏亦未得其是。因黃氏定一成百井，沿邊十里為隰臯，則內容仍是六十四井，仍與鄭氏如二五之為一十，仍不合司馬法與漢志。而且溝洫所佔面積之廣，若統統圈在丘、甸、縣、都之外圍，也決不止方百里而止。今羅列衆儒之說，互相矛盾，而周官本書之不可信自顯。正為周官作者，在其下筆時，却沒有像後儒般彼此照顧，精密計算。實僅搬弄字面，做一種竹簡上的數字遊戲，本不會認真。而另一面，則由周官考工的作者，也把古代井田制裏荒棄隔絕的封疆，盡變成他理想上墾闢通達的溝涂，所以有此規模。而朱子却重把商君之「開阡陌封疆」來證成周官考工裏的「溝洫」，這又是朱子的誤解了。

溝洫本以通水利，而考古代諸夏水患，惟晉為烈。智伯決晉水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又曰：「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孟門、呂梁之險，以及玄冥、臺駘、鯀、禹治水之故事，流傳皆始於晉。其次則河南，於六國為魏。蘇代有言：「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

之口，魏無虛、頓丘。」信陵君亦云：「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其後秦將王賁攻魏，果引河溝灌大梁，城壞而降。當時山西、河南沿河兩岸，水患最盛。因此亦出了許多水利專家。魏文侯時，與李悝同朝者，有西門豹。梁惠王時有白圭，梁襄王時有史起。著名的水工鄭國，乃韓人，亦籍河南。竊疑周官作者，當爲晉人，一面是承襲了李悝、吳起、商鞅，講究法制、農事、軍政；一面則注意水利，盛言溝洫之制，是西門豹、白圭、史起之遺教。

三晉地狹民稠，早不存古代封疆遺跡。周官書中，又把封疆轉換爲溝洫，而一面還保存著古封疆之遺制，按實排來，更見無地以容。地官載師云：

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疆地有任，便如商君之開封疆。遂人又云：

以疆予任毗。

「疆」，釋文作「疆」，宋建陽本同。此亦是把田外疆土授給新毗，使之墾治，則同樣是開封疆也。周官書中，應該早已沒有了廢地曠土，荒的盡墾了，封疆全變成溝涂，如何又有疆地可任

呢？總之一切是理想，決無此現實。

上文三節，第一論公田之廢棄，第二論爰田制之推行，第三論封疆之破壞。都是古代井田制度消失之最大現象。周官一書，論其大體，都已是跟着時代，採用了當時新興的局面。後人只說周官講井田，甚至謂劉歆、王莽爲要推行井田，而偽造周官作根據，是何不考之甚也！依據上書，周官還只是像戰國三晉人作品。遠承李悝、吳起、商鞅，參以孟子，而爲晚周時代的一部書。

四 其 他

上陳三章，證周官乃戰國晚年書，已可無疑。此下乃幾條零星的討論。

第一 論周官裏的封建

周官所記封建，決非古制真相，前人辨難已多。茲姑舉一點言之。井田本隨封建而來，第三

只是大小不同。故都、邑，散文則通，並無區別。今周官謂「四井爲邑」，於古於後，全無可證。左傳隱元年有「大都」、「中都」、「小都」，決非全是四縣方四十里之稱。

且考左傳記載，「縣」與「都邑」不同。縣可以包都邑，但不卽是都邑。都邑可以爲縣，也儘可不隸於縣。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六年，韓獻子云：「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有絳縣人。昭三年，州縣爲欒豹之邑。五年，遠啓彊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一年，叔向云：「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田爲七縣，分羊舌氏田爲三縣。哀二年，趙簡子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十七年，縣申、息。凡此諸條，無一與「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說相合。且考之左傳，亦僅晉、楚有縣，秦至孝公，商鞅變法，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全國分四十一縣。縣的制度，亦是絡繹而散亂地在諸國間成立。

至於丘、甸，「甸」乃郊外田野，或以田獵，或以耕種，統可稱甸。「丘」是民居村落，莊子曰「丘里」，孟子曰「丘民」，齊太公封營丘。是丘者尚未成邑，甸者尚未成縣。丘民所集，

其屬五千先擊楚，此已似用大隊步卒作戰，而並不與車乘相配。哀公元年，越以甲楯五千保會稽。八年，魯微虎欲宵攻吳王舍，私屬徒七百人。十一年，魯、齊戰於郊，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哀十三年，越伐吳，吳彌庸屬徒五千。黃池之會，吳帶甲三萬，其布陣也不像是車制，或已步騎兼用。又命王孫雒率徒師過宋。此皆春秋晚期步戰漸漸從南方諸國推行之證。至北方羣狄亦用步戰。晉人禦狄，改車爲行，語詳下條。左傳桓五年，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此三條皆是車制。杜注以車徒兼說，遂致糾紛。說詳江氏羣經補義。司馬法亦戰國中晚之作，諸儒據司馬法講左傳，終難通，此不詳辨。

總之一車附步卒二十五人或七十二人之說，並非春秋時事實。而周官大司馬乃謂：

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

在其軍隊編制中，僅見有人，不見有車，顯是春秋以後人語。而後人偏要以一車二十五人爲解。孔廣森說已見上引，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十四又申孔說，謂：

賈疏：「左氏傳二十八年傳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軍』為『行』，取於此『行司馬』之名也。」易被云：「左傳：魯會晉師於上鄆，與帥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於蒲圃，與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與』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於太原，毀車為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為主，易野車為主，於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黃度亦云：「與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詒讓案：易氏據左成二年、昭元年傳，證「與」為車，「行」為徒，左傳杜注亦謂「與帥主兵車」，其說可通。蔣載康、林喬蔭說亦同。竊疑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公行」，「公路」即與之長帥，「公行」即行之長帥，與此「與」、「行」兩司馬義同，惜諸職並亡，無可質證。

今考春秋時諸夏用車戰，而戎狄則以步卒。故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人患之，曰：「彼徒我軍，懼其侵軼我。」晉居山西，與羣狄為隣。僖公二十八年已作三行禦狄，至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與羣狄戰，始決意毀車為行。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當時以五乘改三伍，可證乘車者一車三人，並無二十五步卒附後。否則不勞毀車為行，只須捨其車而單用每車附後之二十五步卒即可。今必毀車為行，便知一車二十五步卒，定為後人偽造。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情事實與中行穆子毀車為行相仿。周官軍制有「輿司馬」、「行司馬」，卽證其書出晉人，在春秋後矣。

三 論國子與庶子

地官師氏有「國子」，天官宮伯有「庶子」。庶子又見於外饗、酒正、司士、大僕、象胥、掌客諸職。惠士奇禮說有云：

秦爵有公士，越軍有教士，楚師有都君子。說者謂公士乃有爵之步卒；教士乃教練之精兵，近乎周之士庶子；都君子乃都邑之士，君所子養而有復除，近乎周之國子。

四 論餘子

地官小司徒：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又說：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司農曰：

餘子，謂羨也。

今按：「餘子」之名亦起戰國。秦策：「范雎爲梁餘子。」趙策：「燕、趙久相攻，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呂覽離俗：「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莊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此皆戰國

追其貉」一見。春秋以後書，用「蠻、夷」字漸多於「戎、狄」，而「貉」字亦漸見。論語有「蠻、貉之邦」，孟子有「貉道」，又有「大貉、小貉」，荀子勸學篇有「干、越、夷、貉」，疆國篇有「秦與胡、貉爲鄰」，墨子非攻篇有「燕、代、胡、貉」，兼愛中有「干、越南夷」，又稱「蠻、夷、醜貉」，管子小匡及齊語言「胡貉」、「卑耳之貉」，管子又稱「穢貉」、「荊夷」，中庸云：「施及蠻、貉。」今周官書亦以「貉」字代替了「戎、狄」地位。大司馬「九畿」、職方氏「九服」，有「蠻、夷」，無「戎、狄」。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戎、狄」列最後。其書爲戰國晚出甚顯。近人多疑尚書堯典「蠻、夷、猾夏」一語，謂其時不應已有「夏」稱，此是也。其實猾夏者在當時應是戎、狄，不應是蠻、夷，用「蠻、夷」字更可疑。禹貢「五服」有蠻、夷，無戎、狄，又有島夷、嶠夷、萊夷、淮夷、和夷，有三苗，而西戎只一見，狄則無，正與周官、堯典大致相同。蓋自春秋晚期以後，東南外族，漸占重要地位，而戎、狄已遠攘，少人注意。故戰國時代人，多言蠻、夷，少言戎、狄也。而「貉」字尤爲到戰國時始見通用。惟韓奕一詩，既言「因時百蠻」，又云「其追其貉」，亦復以「蠻、貉」代替「戎、狄」，在詩三百篇中，特爲變例，今則無可詳說矣。至於「閩」字，不僅詩經、左傳中少見，即孟、荀、管、墨諸書中亦未有。周官究是一部極晚出之書，亦卽此而可決矣。

小戴記檀弓篇：「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孟子梁惠王篇亦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淮南子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此處之「象人」，正是孔子所嘆爲不仁無後者所用之俑人也。作周官者，自本晚周風氣，將「鸞車象人」明定於葬制，殆并孔子之言而忘之矣。若謂周官書係周公作，豈始作俑而當無後者，孔子亦以斥周公乎？

又地官閭師：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禱，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注：

皆所以恥不勉。

其實周官此條乃襲孟子而誤。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並非凡不蠶者皆不准衣帛也。又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並非凡不樹者皆不得用槨也。又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

臣等謹詳周禮，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莫曉其旨。

隋書音樂志載牛弘、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議，亦謂：

周禮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

是皆根本懷疑周官之不可信者。而唐會要載開元八年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有云：

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後儒因此多說周官無商，乃無商調，非無商聲。所以無商調，則因周以木德王，商金聲，避金克木之嫌。至於律管乖次，也有說明。然據今論之，五德終始，乃秦一統後始有齊人奏上，謂是鄒衍所著，其前固未有。且周官書亦未采及五德終始之說，則此處不當據以為說。此外復有一問題，為歷來諸儒所未經注意者，卽音樂能致物怪鬼神之理論是也。春秋以前，似絕未見此等說

十年。依齊氏推算，寶公年還需增十年始合。謂寶公獻書年已二百五十歲，其事頗難信。若依桓譚百八十歲之說，孟子遊梁，寶公大約已四十歲。然其時尚不可有周官。至呂不韋著春秋，又八十年，寶公應已百二十歲，其時則周官已成書。大概周官實是魏國人作，寶公則只是魏惠王以後樂人。或者過甚其辭，當其獻書時，寶公尙不到百八十歲，而妄稱上及魏文侯。此正如說鄒衍及見梁惠王、齊宣王也。惟周官大司樂章，則寶公可以有，司馬遷可以見，而摘寫其大意於封禪書，其事不必全可疑。俞氏癸巳類稿謂周官孝文時已在祕府，以校寶公之書，其說亦非不可信。又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正爲周官之書行於魏晉，故寶公得其大司樂章，而河間王收書，亦得周官也。主張今文經學者，必疑史、漢記事全僞，周官一書定是劉歆、王莽僞造，此實難圓之論耳。

且卽以大司樂章所謂必用何種樂舞而後鬼神乃可得而禮者，此亦晚周先秦燕齊方士之緒論也。封禪書載李少君言上：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又亳人謬忌奏祀太一方，曰：

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武帝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此所謂「方」，即「方術」之「方」，感召鬼神，須遵一定之方術，擅其術者，所以見稱為「方士」也。方士初起，亦本儒家禮樂為說。禮樂之能通天地，感鬼神，其甚深妙義，皆闡發於小戴禮書中，此則為儒家言。至如謬忌之祠太一方，即是一種獨擅祕方，非如此則太一之帝不可得而祠。此種祕方，亦可謂是一種祭祀之禮。儒家與方士之相通，當從此着眼。而周官大司樂章，其實亦只是一種方術也。謂非如此則鬼神不可得而禮，此非方術而何？惟專從樂舞說之耳。故知秦、漢方士神仙，實與儒生禮樂鬼神，同出一源，史實俱在，正當從此等處闡求之。然則方士者，最先本講禮樂，求以感召鬼神，以希接引。大概與陰陽家言五德方色數度之異相通。其次乃講服食外丹，又進而講修鍊內丹。近人只知服食、修鍊為求仙之兩道，各有祕方；不悟求仙求神最捷、最古之一徑，厥為禮祠鬼神，期感召而得接引。而祭祀之方，在秦皇、漢武時，其重要猶遠在講服食、修鍊兩方之上。其說實興於戰國

